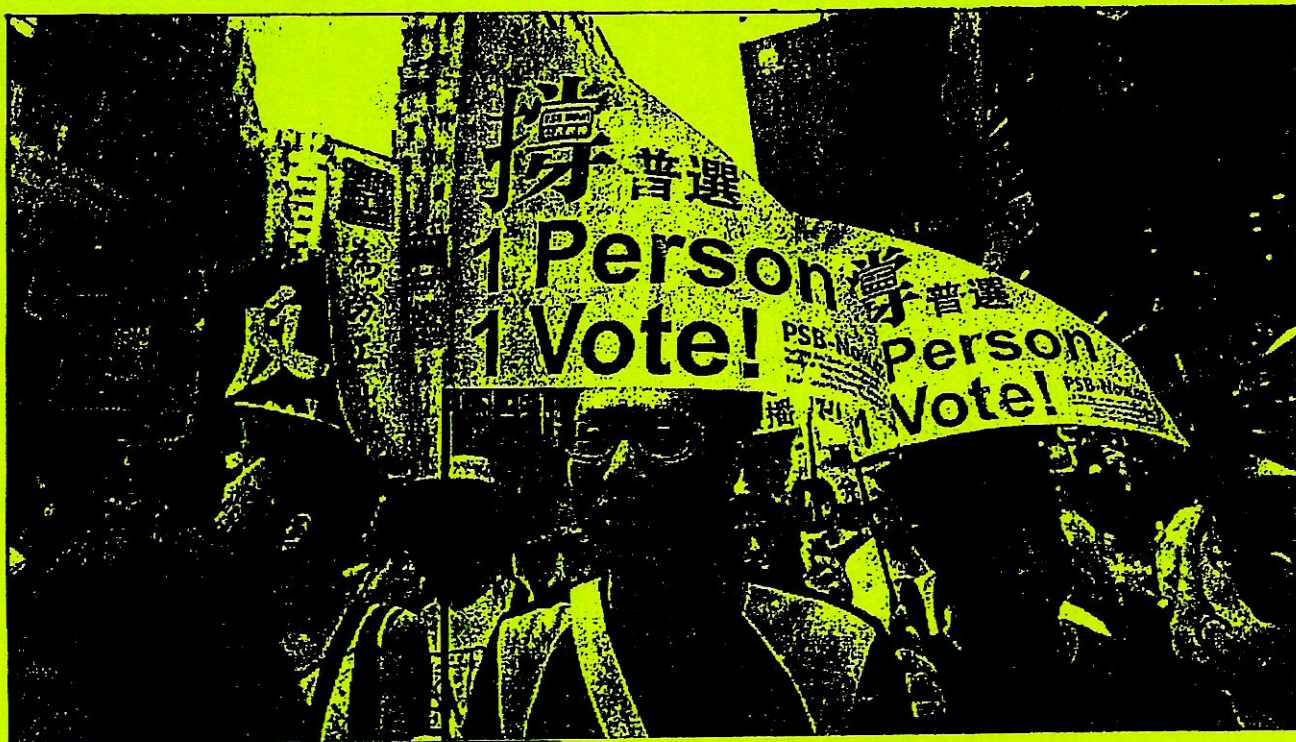




力爭真普選，排拒假普選

評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

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敘利亞

羅莎·盧森堡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重慶托派組織略記

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

梁振英的政改「諮詢」

仲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於十一月訪港，在一個為特區政府高級官員舉辦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題目為：「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為如期實現普選而努力」，驟眼看，還以為中共在「努力」「實現」「普選」！

但在看畢全文後，人們便會發現，李飛先生還不過是中共官僚專制政權下的一名官差，來港的目的，祇不過是宣中共的旨意而已。他講話的要點正是在前面的一句：「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這才是全篇講話要宣示的主旨！

鳥籠裡的民主普選

在普選的議題上，李飛先生指出認識怎麼？理解怎麼呢？他在講話中不斷說明上述的課題，依次如下：「怎麼認識中央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基本立場及其實踐」、「怎麼認識香港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的規定」、「怎麼認識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基本要求」。

在他臨結束講話時，他提出如下的結論：「在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既有中央的權力，也有香港特區的權力，其中，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具有重要的憲制角色……最後，我想用今年年初以來中央領導人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再三重申的“三個堅定不移”來結束今天的講話：中央對2017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李飛先生其實在記者會上，也同樣向全港市民、以至全國人民傳達一個清楚的信息，在涉及中國與香港的任何課題上，特別是與基本法相關的議題，必須要準確地認識，才會準確地理解。他在記者會講話的主要內容完全說明了上述的論點：

一、有關提委會的：《基本法》將特首普選提名權，只授予了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需要採用機構提名是有法律依據的。機構提名要通過一個法律程序，一個反映集體意志的民主程序，將機構裡所有人的意見集體反映出來。民主程序有三個要求：1.所有提委會成員有平等的權利參與提名；2.所有合資格的參選人都可以向提委會爭取提名；3.選出的候選人應體現機構提名。民主形式可以有多种形式，如何體現「集體提名」是未來要討論的問題。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人支持是一般的理解。一定要確定特首普選人數，不能提得太少又不能過多。普選特首候選人具體人數是下一步要討論的問題。

二、有關特首普選：特首必須忠實執行《基本法》並向中央負責，故《基本法》已訂明特首應當「愛國愛港」。真心實意擁護及履行《基本法》就是「愛國愛港」。相信廣大香港市民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按照最終通過的選舉規則，會挑選出中央信任、港人擁護、具管治能力的行政長官。（見香港文匯報 2013-11-24 報導）

無論是在講座或記者會，李飛先生講話中最顯眼的一片空白，就是人民在「怎麼認識這……」、「怎麼認識那……」的過程中是沒有甚麼角色的，有的就祇是要「怎麼認識……」各種各樣的課題，一句話，就是要「認識、理解」中共官僚是「怎麼」說的！

在關乎全民普選的議題上，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竟然沒有面向全体市民的問責，而是淪為宣旨形式的獨腳「秀」，正好反映中共官僚徹頭徹尾的專制面目，難怪引起廣大市民對中共的厭惡及唾棄。

市民大眾這種凡與中國相關的事物的抗拒或疏離感，已經在香港市民間大幅度地擴

散，形成很多「中港矛盾」事件的湧現，這一切一切，都是自九七回歸以還不斷沉澱、日積月累的結果。在過去一年間，隨著梁振英在港的管治失效，同時又搞誇誇其談的「內交」，進一步大幅度向中共官僚政權傾斜，令部分香港市民視之為中共的馬前卒，致令更受市民的憤恨，人人皆望得而株之的局面。

中港矛盾勢必進一步激化

自梁振英上任之後，中港之間的矛盾時有出現，部份固然是兩地市民的生活習慣和意識形態不同，但亦有因兩地政府的政策致令矛盾激化的情況。

2013年1月連續多天，名店D&G禁港人拍照風波爆發，數千人響應網上號召，聚集在尖沙嘴廣東道海港城的D&G外拍照，聲討名店霸權；香港自治運動成員更持龍獅旗到場示威。9月15日，港鐵上水站淪為內地水貨兵團基地，上水居民在facebook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行動延續了一段時間。這些應是兩地市民的生活習慣和意識形態不同做成的矛盾衝突。

但是，另有一些衝突，則是香港特區政府引發出來的。2013年1月，雙非孕婦問題持續困擾港人，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建議公立醫院2013年起停收雙非孕婦；逾千人遊行反雙非。2月，特區政府宣佈粵港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自駕遊）試驗計劃於3月試行，1,500人以步行或踏單車方式遊行反對。4月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獲教育局撥款5.3億元推行，小學最快於新學年推行，被市民及傳媒質疑為「染紅」學校、為中共洗腦大開方便之門。7月初，國教科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曝光，內容吹噓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惹來全城嘩然。同月，9萬市民遊行反對。8月中，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透過報章「放風」，透露政府有意設立容許內地人免簽證入境的「邊境特區」，並將新界東北三個新發展區併入邊境特區，被輿論指為割地賣港。8月底，市民不滿當局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連續10日佔領政府總部，高峯時逾12萬人出席。

反對假諮詢、為實現普選而奮鬥

當然，最重大的衝突應該莫過於行將出籠的特區政府政改方案和民間正在推動的「佔中」行動了。這個將會是一場引致衝突全面升級的對峙行動。當特區政府上下各級官員均異口同聲，說要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來制定普選的方案時，人們已經不禁懷疑，這是中共官僚政權徹頭徹尾施加的箝制，而非面向全港市民的諮詢，這根本就不是其天天掛在唇邊的甚麼讓人民當家作主。諮詢是假的，劃地為牢才是真的。

擺在香港市民面前的就祇有力爭到底。普選是在香港進行的，為甚麼全港市民要受中共官僚政權的擺佈？為甚麼要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來制定普選方案？為甚麼連全民公決也不可以提？這一切一切，都預示了未來數月的衝突將會加劇，而市民也祇有奮起力爭到底、不惜一切反擊中共官僚及其在港的代理人這一途徑，才有望實現真正的普選。

梁振英的政改「諮詢」，從一開始就已經不是以香港市民的意願為依歸的。事實上，明擺著的，也根本不是篩選的問題，更不是公民提名權的問題。中共官僚政權指出的要依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作為公民，連就著如何普選這個議題提出見解、發表政見，也會被政府的官員評定為「不合乎這、不合乎那」，所以便毋須討論云云。這種說法根本就是藐視公民參與政治討論的行徑，亦祇有在香港這樣一處沒有民主普選的地方，才會出現這種荒謬透頂的說法。要奮起反對的，正是這種踐踏我們的權利的一個制度。

反對中共官僚主導的鳥籠假諮詢！

為爭取普及而平等的普選而奮鬥！

2013年12月31日

力爭真普選，排拒假普選

振言

香港回歸10週年時，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列明2017年的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直選產生的辦法」。這樣，便把雙普選拖延在10年之後。

香港政府在2013年12月4日把起草了的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佈，進行政改諮詢。這些辦法仍然把長期實施的不公平辦法沿用下來，這主要表現於選民多區直接選出和功能界別選出的代表各佔一半比例，前者的選民300多萬只得一半議席，而後者則最多只有30多萬選民的間接選舉，連同其他極少數人的功能界別代表，便可佔有立法會的議席一半，而其中有許多人更有兩次投票權。

第二，提名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都操控在建制派和半官方的人員手上，以致令泛民的參選人都會被篩選出去，難以得到公平的提名參選機會。

這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實際情況，完全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第九條規定的原則：「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原可舉行的普選會變成篩選，香港廣大選民的應有選舉、被選權利被剝奪。

有鑒於這種不平等局面會到來，泛民主派提出了公民提名的主張，在得到香港合資格選民1%簽署同意的參選人便可報名參選，以此有助於打破單方面壟斷選舉的不平等情況，能

實現全港市民都有實權依法提出參選人，同時可投票選舉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自己也可接受提名競選。

中港官方力圖以假普選冒充真普選，事先搬出各種嚴苛限制的門檻、框架，提出候任特首的必需條件，以此企圖阻難泛民主派等異己者可能成為特首。

市民們必須堅持實現真普選，排斥假普選，如果官方一意孤行，市民便需要採取各行動去爭取，而佔領中環，便是爭取普選的有效方法之一。

願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努力前進，倘遇有某些不同意見，也應以大局為重，求大同存小異，以顧全大局為主要考慮。這樣才能凝聚力量，務求真普選得以最後勝利！

2013.12.28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0卷第2/3期合刊(總第235期)

2013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應斷當斷、釜底抽薪！（轉載）

長毛(梁國雄) 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人人皆可依法提名他人參選，接受提名競選及投票選舉候選人」。

不及卅字，言簡意賅，凡剝奪上述三種權利者，皆不符「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據此而行之選舉，就是假普選！不管嘴皮耍得如何漂亮，所持理由如何堂皇，都是欺騙人民，權貴唸唸有辭，乃是欺人自欺，出自泛民之口，簡直是自欺欺人！

此所以，林鄭月娥粉墨登場，煞有介事拋出政改諮詢報告，洋洋千言，不在於解釋「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之議，到底如何實現中共政權實行普選之諾，而着墨於強辯這種篩選如何合法合理。一句話，就是凡是符合《基本法》和俯仰人大常委決定的，即使是魚目混珠的假普選，港人都要俯首認命，感恩接受；反之，若是中共政權認為不符合《基本法》，不從人大常委欽定的方案，儘管體現普選原則，大家都須唾面自乾，切勿異想天開！

所謂「政改諮詢」，不外是奴隸主唆使其總管橫刀立馬，為奴隸劃地為牢，宣佈「篩選」就是普選的御旨，讓奴隸們知所遵從，不敢造次！中共權貴專斷氣粗，港官唯唯諾諾，本在意料之中，但以爭取普選為號召的泛民派支吾其辭，委曲求存，卻是萬萬不能，否則萬劫不復！

須知民眾與強權抗爭，一如雞蛋之於高牆，本無必勝錦囊，亦無秘密武器，所以以弱勝強，不過依賴群眾覺醒，及由此引發之偉力，民眾能否組織成千鈞之力，就是成就變革的關鍵所在，古往今來，莫不如此。今日香港普選之爭，已隨着政改諮詢而圖窮匕現，否則，「和平佔中」之公民抗命又從何談起？

現時一向揭櫫於爭取普選的泛民主流派，對所謂「提名委員會」之議若即若離，欲拒還迎，對少數人篩選特首候選人之機關有商有量，無異應斷不斷，自受其亂；以為曲意奉迎，以所謂「有競爭性」為藍本，換取當權者格外施恩，接納泛民代表競選，不過捨本逐末，自貶身價，有若為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

權！有此一說，乃是至今為止，民間共識之「公民提名、不可或缺」呼聲，不但權貴恨之刺骨，視為蛇蠍，泛民主派亦不予堅持，不敢肯定。

其實，泛民主派早該大聲宣佈，以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實行民主自治，乃是港人天經地義的權利。不言而喻，《基本法》既不經香港人民同意，亦非由其代表訂立，本就不應視為金科玉律，凡不符民眾利益，剝奪其基本權利者，早該讓香港人普選之立法機關又或以「全民公投」廢除，以實現其當然之制憲權力。至於人大常委亦無權僭越香港人的自治，其就《基本法》之解釋，只具參考價值，不得凌駕香港立法機關和法院的判決！

無須說，「公民提名、不可或缺」之議，本就不屬值得大驚小怪的創舉，而是一項不得已的迂迴！所爭者，只是由民眾直接提名的候選人，不應也不得由「提名委員會」以「集體提名」為由篩走。至於其他享受特權，由「提名委員會」欽點而獲候選資格者，已是享有優待之特權。如此周折，固然由於群眾羽翼未豐，不足以推倒重來使然，亦是深知一旦一人一票普選，民眾力量藉選票顯示，定必打敗保皇派代表！中共政權堅持「提名委員會」必須行使篩選權，亦是洞悉此一關鍵！

明乎此，「公民提名」之退，不啻逼不得已，泛民主派此刻優悠寡斷，又何異首鼠兩端？只要一日當權者以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為經，用「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為緯，強權之天羅地網只會愈益嚴密，一日泛民主派妄想立足於此而「據理力爭」，無異妄自菲薄，敝帚自珍，磋跎歲月的結果，就是民眾失望，民心散渙，「和平佔中」固然因目標不明而難有進展，至於辭職引發公投更無從談起，重蹈2010年之覆轍，讓民眾抗爭的潛力自行消解，為所謂互諒互讓的談判鳴鑼開道！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相信群眾，相信未來
甘為先鋒，甘苦與共

倒梁倒波，豈有他哉？（轉載）

長毛(梁國雄) 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梁振英三場落區秀剛剛落幕，小圈選舉腐臭中人欲嘔之餘，其惡毒更是包藏禍心，欲蓋彌彰！

一年前，梁振英僭建地窖，以謊圓醜聞遭揭發，復又有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涉騙房津被捕，他的落區親民秀一敗塗地，變作市民怒吼抗議的平台；一年過後，梁振英雖得立法會內小圈當選保皇議員保駕護航，而倖免於受彈劾下台，但所謂「誠信」在事實曝光之前，已是全盤破產。而且，隨著陳茂波這員超級梁粉接任發展局局長後，隱瞞經營劊房在先，在今年七月又被揭以權謀私，囤地自肥，再施「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故伎，憑梁振英及保皇黨死撐而厚顏戀棧，可謂天怒人怨，千人所指，使另一鐵桿梁粉張震遠涉嫌的騙案，成小菜一碟，梁振英依然繼續作秀，除了本身恬不知恥外，更體現了中共政權遏制普選抗爭的黑手何等專橫，何等卑鄙！

眾所周知，在港人反對中共所謂必須參照小圈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來組成提名委員會，以實行篩選2017年特首候選人的憤怒中，中聯辦這個小小奴隸總管，不就三番四次說明中央對當選特首有實質任免權嗎？既然如此，不啻明目張膽，大發淫威在恫嚇港人，無論是選前按他們的方法篩選候選人，抑或選後拒絕委任當選人，都不過是保證當選特首必須符合中共意旨，所不同者，乃是篩選方案一旦得到通過，則可解讀爲「眾望所歸」。在港人唾面自乾中黃袍加身；否則，中共仍可操生殺大權，扼殺港人應有之普選權；接二連三大放厥辭，顛倒黑白而臉不紅，氣不喘，不外針對「和平佔中」運動於未然，用密集洗腦方法，

使民眾猶豫者放棄抗爭，令溫和泛民知難而退！

正因如此，梁振英即使民望頻現負值而成朽木，亦必須自我雕琢，繼續死撐。原因是既然中共自詡擁有絕對任免權，亦於收回香港主權後，先後三次運用小圈選舉這枚橡皮圖章，欽定了三個特首。若果梁振英又繼董建華之後，因民怨而含羞下台，豈非確證所謂「中央」欽點，恰似盲人瞎馬，禍港害民？既然現時的「選舉委員會」一敗塗地；那麼，脫胎於此的

「提名委員會」又有何顏面爲港人越俎代庖？既然形形式式的篩選操弄如此丟人，中共今日裝模作樣，祭起的最終實際任免權，除了強辭奪理之外，尚有何合理說辭，爲其扼殺港人普選結果辯護？

此所以，梁振英的三場秀還得要做；而且還要做得「好好睇睇」，至少不能像去年那樣，適得其反，自招其辱。此所以，在元朗上演的「開鑼戲」不惜撕破臉皮，動用龐大警力威懾鎮壓，更動員黑幫暴力撐場，不惜公然行兇，兵匪一家，來一個黑白恐怖，以爲梁振英繼續造秀開路！

此所以，在此樁醜行引起民憤後，中共各級頭頭不惜「紆尊降貴」，向晉見他們的保安局局長，特別是警務處處長打氣，公開表揚，以示獎勵！正常之下，一個政權自吹自擂，當必以經濟增長，減少赤字，福利增加爲賣點，而絕少表彰國家機器行之有效，鎮壓有功。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隔空放炮，爲禿鷹處長曾偉雄打氣撐

腰，又何異於六四血腥鎮壓之後，鄧小平親自接見「平暴」部隊，譽之為「共和國衛士」？

其實，「官運亨通」的張組長主宰港人命運，本身就是一黨專政下官僚政治的鬧劇。張德江早年留學民不聊生、一黨獨大的北朝鮮進修經濟，單此殊遇，已是可圈可點。鑽營官場，歷任吉林、浙江省委書記，到2002年出任廣東省委書記，政績全無，最為港人熟知者，乃是於2006年以武警、公安清場，將廣州白天鵝賓館住客掃地出門，讓當時訪問之北韓獨裁者金正日包場為行宮！大概張書記感激昔日留學北韓時受到恩德，但濫權若此，不惜動用武裝人員逞淫威，以滿足金氏私慾。既有此前科，難怪他對曾偉雄於中共領導人訪港時遏制示威不遺餘力，以致偏袒「梁粉」動粗對付抗議者，自然擊節讚賞，不惜公然褒獎！

張德江主政廣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遇有特大礦業事故，竟不分皂白，飭令全省停業的官僚作風，不但民怨不輟，亦無緣升官。調任副總理之後一事無成而遭投閒置散，兼任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主任，遭謔為「災難副總」。2011年處理溫州動車巨劫罔顧災情，下令停止搜救行動及火速清場，草菅人命，令人側目！如此庸官，苟非薄熙來奪權失敗而成階下囚，則斷無機會接任薄之重慶市委書記重責，並由此而再上層樓，不但貴為政治局常委及人大委員長，並由此操港澳之生殺大權！

張德江的宦海浮沉，固然可笑，亦屬可悲，不但彰顯一黨專政治國之齷齪，更反映港人身不由己，任由宰割。梁振英崛起而蒙欽點為特首，亦作如是觀，中共高層惡鬥，讓他得以在小圈選舉脫穎而出，亦使這名土共特首為報恩寵，比諸前任兩人更加感恩圖報，言聽計從。上台後急欲設立「五司十四局」以安插黨羽，除為酬庸其死黨之外，就是為急欲來港分

肥的紅色資本鳴鑼開道，並讓一眾梁粉近水樓台，分一杯羹。陳茂波、張震遠等人失德敗行，旁若無人，在在說明小圈選舉確實應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至理！

梁振英一夥濫權自肥，誠信盡失，已成為中共治港的負資產，恍似政治雞肋。近來一輪接見港官，高調撐腰的表演；於港人，乃是嚴辭拒民意，蠱惑民心；於梁某，則是綿裡藏針，最後通牒。此所以，梁振英於民生改善之諾言講多做少，有名無實；但有關優惠、容讓大陸資本輸入，財團進駐的政策，却是劍及履及，應聲而至！甚麼發展新界東北計劃、前海、河套，不過是快馬加鞭，早日還債，所謂首重內交之說，見諸於他近日北上應酬，侍奉大陸高官，不同省委，畢恭畢敬，有若交際之花，就知為求戀棧，他上台後未克完成的「賣港酬庸」，必會逆民意而行。他於上台前的甘辭美願，則會將化為泡影，紓緩富豪不滿，向其示好！另方面，梁振英雖因民望低劣，遭見棄於主持政改把戲之角色，但却不竭在幕後糾集各種力量，為遏制、打擊「和平佔中」充當苦力，不惜撕破臉皮，以兵匪暴力鎮壓示威，不過預演未來齷齪！

奴才不走，暴虐不息，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倒梁倒波，義不容辭，
又豈是無謂無望之舉？

願泛民知之，願諸位察之！

我掙蛋 因我慎思篤行 (轉載自<蘋果日報>2013-12-12論壇版)

陳德章 社會民主連線行政委員

事隔多日，作為當日的行動者，亦作為梁振英英皇書院的校友，我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向大眾作一個正式交代。

我不後悔因為我做了對的事情

這幾天，收到很多很久沒有聯絡的舊同學、長輩等來電和短訊問候，幾乎所有的問候都是圍繞我個人，並沒有絲毫怪責我掙雞蛋的行為：「值得嗎？」「你放棄自己的前途嗎？」「能從這麼好的大學畢業就唔好搞事啦！」「大家英皇仔做咩咁激呀！」

對於大家的關心，我會銘記於心。但無論時光倒流多少次，我依然會投出那兩顆雞蛋，因為我相信我當日的行為是正確的，梁振英才是錯的一方！對於梁振英師兄譴責我的行為「暴力」，我不敢苟同，因為師兄你掌握和維護這體制暴力才是徹頭徹尾的暴力，才應該得到譴責。你知道你捍衛的制度有多暴力嗎？你還記得我們的校訓「慎思篤行」嗎？你知道每年有五千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床位時去世嗎？你知道有很多年輕人不能接受大學教育嗎？你知道退休保障對市民有多重要嗎？你知道香港人不想來屆特首選舉有任何不公平篩選嗎？

作為七百萬市民的首長，卻對以上種種問題視而不見，這才是真正暴力的表現。在你高喊和平理性和譴責我的同時，其實和平一直都沒有存在過，因為你才是這暴力的擁護者，而且從無間斷！掙蛋是向不義體制表達不滿的文化！

梁振英師兄，在很多西方國家，民眾向當權者投擲雞蛋，象徵着無權者向當權者的高牆作出良知的呼喊。向民望及認受性低的政治人物，如師兄閣下，擲雞蛋實屬家常便飯，亦是

對不得民心政治人物的基本考驗。

在不少人眼中，我當日的行為可能很激烈和不合理，但其實這正正反映公義在現有制度不能得到彰顯，我只能透過無權者的抗爭對崩壞的制度表達不滿。我們在傳統思想上被認為不合理的抗爭，只是這制度下必然的副產品，就正如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所說的，「一切責任在於當權者，我們沒有義務和責任為當權者的副產品作出任何解釋。」

我會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繼續抗爭

當日千鈞一髮間的行動，讓我經歷了很多人生從未遇到的事：被幾十人阻擋表達意見、被大批警察押上警車、被套取指模、被警員押着走犯人通道、被警員監視着用犯人廁所、犯人拍照等。其實對於這些我感覺並不好受，但我知道這都是在反抗運動中需面對的代價，同時我亦有被判入獄的心理準備。所以，我並沒有畏懼過，我只會在往後的抗爭路上走得更堅定。我已為我所作的行為和往後的路作好準備，那麼梁振英你準備好為你自己作過的暴行付上代價沒有？請你立即下台平息民憤，這是我和很多香港人卑微的要求，你能答應嗎？

後記：雞蛋誤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我深表歉意。我在此聲明，我針對的是梁振英的政權暴力，並非針對個人或刻意將雞蛋投向曾俊華。藉此，我溫馨提示曾俊華不要再與梁振英狼狽為奸、與民為敵，立即站回人民的一方，這才是真正避免被擲雞蛋的唯一方法。

必須多方面落實有效的扶貧工作

涓滴

梁振英在其競選今屆特首的政綱中，曾列出扶貧是其重點工作，就任後成立了扶貧委員會，他於去年10月17日在立法會發言時表示，政府在扶貧及扶助弱勢社群的工作上有責任，有角色。他要求扶貧委員會制訂貧窮線，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本港首次制定的官方貧窮線，以全港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劃線。港府宣佈的結果是：全港貧窮人有131.2萬人，佔全港人口700多萬的19%左右。扣除政府福利津貼後仍有102萬人，貧窮率為15%。其中在職貧窮有537,000人（156,700戶）。

不少學者，專家對如此制定的貧窮線都表示質疑，認為有可能偏低估算。而據一般經驗，官方對這種估算更可能偏低，以減輕其嚴重性和援助款項。例如，據城市大學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合作，訪問本港約600個家庭，發現一人家庭和六人家庭，貧窮率分別為52%和45%，都大幅高於政府統計。

香港現時的大量貧窮人口，要蝸居在擠迫的劏房、天台屋、籠屋、棺材屋等，許多人所得的政府房屋津貼，還不够付業主或包租人無饜的加租；當局明年度擬加綜援、生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等，又只擬各增約4%，遠追不上物價、租金等的漲幅。港府每年都從賣地和加稅等獲得非常巨額的收入，財政盈餘年年劇增，本來有充足財力幫助廣大市民，尤其是貧窮人士的。但實際上卻表現出非常吝嗇，財政司曾俊華日前主張「應省則省，有備無患」的藉口，反映他不會大量地撥款支助扶貧工作，港府的具體扶貧辦法，仍要等2014年1月特首的施政報告來交待。

樂施會一項調查顯示，兩成在職窮戶缺錢教養子女；許多人要求港府落實低收入家庭生活補貼，把最低工資與通脹掛鉤，保障工資購

買力。有些人要求提供平等教育機會，實行15年免費教育；有些人提議關顧新來港貧戶，支援清貧學生，阻止跨代貧窮，街工促請港府每年撥款約156億元設立「低收入家庭補貼」；還有許多要求建議都是很合時宜，必須港府落實的，在此不擬多舉。但很急需而有效扶貧的，是儘快給予合資格人士得到公屋入住，以及實施長者退休保障，這些都是非常必需的。

公屋供應長期以來特別缺乏，當局的建公屋進度慢而且少，致使迫切需要的申請人士苦等許多年都不能如願。政府建屋目標是公營與私營各半，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進行諮詢，多個政黨建議長策會應調整未來10年的公私營建屋比例6:4，而主張上調為7:3。港府之採行這樣的房屋政策，重要原因是它要特別對大地產商讓步，討好他們，庫房又可從賣地中獲得巨額收入。廣大市民不能得到公屋和廉租屋的幫助，長期捱受房租不斷飆升的痛苦，有收入都要被房租吞食很大部份，而大地產商則從民脂民膏中獲取巨利，最大的地產商李嘉誠財富，得以在彈丸之地的香港，一躍而為亞洲首富，其餘多名大地產商，也位居於富豪榜上。

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結果。據世界銀行報告，現時仍有約12億人極端貧窮，包括4億名兒童，他們每日僅靠不足1.25美元（約10港元）維生。要消滅貧窮就必須消滅不合理資本主義制度，而在香港當前的減貧扶貧工作，就首先必須依靠廣大港人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全力去爭取前面所引述的各種要求和建議，才可能一一加以實現。

2013年12月8日

評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

張開

經濟上更右傾

中共中央日前在18屆3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一方面宣稱：「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另一方面又「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而且，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民間資本可以開設銀行經營。這許多改變，都是開放以前不准入投資的，現在變成可以准入；又開放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這就是讓私有制經濟更多方面發展，壯大力量，從而削弱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國民經濟的力量對比。

同時，《決定》又「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改變了此前由政府全盤操控甚至按計劃決定投資的政策。

《決定》又對外國開放，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推進金融、教育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等等。

這許多改變，再一次證明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在國有財產基礎上全面實行計劃經濟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政治上更收緊

在政治上，《決定》重彈中共過去的陳腔濫調，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但實際上，中共卻實施一黨官僚專政，與自己所宣稱的完全相反，人民被壓制着，應有的民主權利被剝奪，即使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也有名少實，基層選舉都被地方官僚盡力操控（除了數年前廣東省烏坎村民眾行動起來爭取到民主選舉等之外）。雖然這次《決定》也提出要「發展基層民主」，「健全基層民主、議事、公開述職、問責等機制」，反映出這些機制都是不健全、甚至不民主的。但這些改善許諾，卻抵觸着各級官僚幹部的特權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勢將抵制，敷衍塞責，以致政令不能完全如實執行。

《決定》同時提出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強社會組織民主機制建設，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機制」。

這也同樣意味，這些需要「健全」和「加強」的機制，實際上仍是不健全和被削了權的，顯示這些制度機制，雖在表面上已經建立了很久，至今還沒有健全和強化，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權利仍未落實。

一直以來，國家推行城鄉二元化政策，歧視農民為二等公民，不重視和少幫助農村的發展，只顧對農民盡量多取少予，壓低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歧視進城工作和居住的農民，同工不同酬，不能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政治上不民主、不平等、不合理的苛政措施表現。現在的《決定》主張加以改變，健全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形成工農互惠，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

開、公正、規範進行，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同工同酬，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他們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把進城落戶的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此外還有許多要推進、允許的事，不想在此太多引述，總括來說：所有這些主張都是至今沒有做到的。當局今後能否開放民主，讓農民如願以償，《決定》仍無具體承諾，這主要還要靠農民的努力爭取、繼續施加壓力，有如這次迫使當局改變城鄉二元化和改變對三農的歧視一樣。

當局在過去30年來，對於人民的家庭生活也橫加干預，強迫超生的婦女墮胎，超生的判以罰款，僅僅在2012年至今已有24省公佈收取了公開罰款（美其名為社會撫養費）近200億元。在民間的怨憤和反對下，《決定》宣佈放寬為可生育兩孩。過去對於難於以法律入罪判刑或已服滿刑期的人，則施以長期的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決定》現在宣佈廢除前者，改以社區矯正制度代替，雖然這樣改變仍可能有點換湯不換藥，換稱呼而不換侵犯人身自由的性質，但多少仍是讓步的改變，而這也是多年來社會人士普遍而又激烈反對的結果。

不過，儘管有上述的讓步，《決定》仍在加強政治上的壓迫措施，這表現在以下兩事上，其一是：加強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顯示國家將加強鎮壓人民的機器，以保衛官僚的極權統治，確保其安全。對於這個問題，有另文予以評論，在此不重複。其二是：「明確不同文化事業單位功能定位，完善績效考核機制。」「嚴格新聞工作職業資格制度」。配合這項要求的具體措施，就是最新的規定，在內地目前約有25萬持證記者中，專家指將有逾10萬記者，須於明年重新考取資格証，然後才能繼續當記者，而且考試

較以前更嚴，新教材加入《中國夢》等內容，意識形態方面也不乏批判西方新聞自由、要求記者首先服從國家等論點。這次考核的目的是要把許多忠於如實報導客觀事件、不受官方指揮、不替官方專制利用的良心記者篩選出去，使他們沒有記者證而不再享有採訪的自由，使他們難有選擇，被迫要服從，從而收緊內地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決定》這些做法，都暴露它在政治上是不民主，自由尺度更收緊的。

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收緊，表現在不久以前規定「三不能講」，而浙江大學教授吳飛、《中國週刊》總編朱學東本月18日也相繼在微博透露，當局認為部份新聞院校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不力，導致自由主義觀念嚴重，決定由中宣部親自牽頭、重組十大新聞學院。名單包括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等，大致就是2012年內地新聞學院前十強。清華大學副教授賈西津隨後證實，相關通知已經發到這十所教育部直屬高校，並且建議參照「復旦模式」由省級宣傳部派人出任學院院長。（詳見12月19日《蘋果日報》報導）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淪為極權統治的工具。而且，不僅新聞自由要收緊、言論、出版、網絡等自由也要被收緊。

司法制度未有保障

《決定》宣稱要「完善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迫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上述要改正的一直存在的錯誤過失，如能真正做到，將會是起碼的改善。中國當局不尊重人權，使人權得不到保障，是中外公認的事實；例如對不同政見者，甚至對人權律師等，

動輒拘捕迫害、判刑監禁，冤假錯案不斷產生。如果國家真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就必須無條件地釋放所有無辜在囚的異議者和維權律師等，停止對無罪的劉曉波妻子劉霞等的長期非法軟禁……。但實際上，人權並沒有保障，即使在《決定》宣讀並加以通過的時候，已被警方拘留7月的知名維權律師許志永仍被移送至檢察院，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名起訴。但據李志永的辯護律師透露，公安的《起訴意見書》中所指的組織集會，都是許志永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和平等教育權利的，這個新事例是對《決定》所稱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當頭棒喝，又一次證明它這種宣稱是與實際不符的，也公然違反了《決定》所要求的「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發揮律師在司法制度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利方面的重要作用。」

《決定》又要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發揮律師在依法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這許多需要健全完善的事項，也正是長期存在的缺欠，大量律師因為協助含冤受屈的被告作辯論，以伸張正義，或者替不同政見人士橫遭打壓而挺身相助，連自己也受牽連有禍。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苛政，才迫使《決定》要健全，「完善」制度。但這許多承諾能夠兌現多少？在現時的法律和法官都是主要替統治層特權利益服務的制度下，實難樂觀地相信。這就需要律師們和人民一起據理力爭，才可能得儘償所願。

在描述的美景背後

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是蓬勃發展，必然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惡果。《決定》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支付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等等。可是，這許多增加所需的款項，主要不會由國庫支付，而是要由國營，尤其是私營企業支付的，後者勢必出術加以抗拒以保衛本身利益，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因而使得有關《決定》難以充分地具體地實行。

《決定》又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保險養老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但這很難多靠個人的每月供款，而主要需由國庫支付。國家的財政收入年年都有非常鉅額的增加。累積的數字驚人，形成公認的國富民窮局面，當局卻空前大量地撥作給維穩費和國防費，這兩筆費用非常遠地超過公共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教育等的撥款。

官方的各種重大財政支出數字都是有公佈的。正在捱受各種生活困苦的廣大人民，自然是看在眼裏、怒在心頭；對於《決定》所詳述的各種改善許諾，都會視為多少具有畫餅充飢的成份。如以後不予兌現，勢將增加廣大民衆的怨憤，等如火上添油，更加激發起民間的抗爭，增加中共統治的不穩定因素，這正是中共領導層所憂慮的。《決定》一方面雖然發出一些小恩小惠式的改良支票，另方面實質上卻在加緊箝制人民的自由等，準備隨時鎮壓人民的抗爭：這就是《決定》所想要盡的作用。

9/12/2013



爲何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軍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中國自建國以來，一直都有公安部，直屬於國務院，專門負責治安的。現在爲什麼要特別多設這個委員會呢？這等於宣布公安部已不能應付國家的安全情勢，不安全不穩定的威脅嚴重，因而迫使中央要加設這個具有更高權力的機構來應付，有可能在處理安全問題方面，職權高於國務院，會由習近平領導，更有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

中共統治很不穩定，主要是由於其錯誤路線、政策、措施所造成。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雖然經濟蓬勃發展，但帶來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最近南方都市報報道，北京大學社科調查中心統計，家庭收入貧富差距高達234倍；而且官商勾結，官員貪污腐敗，徇私枉法，造成官民對立，社會矛盾尖銳，許多人資本主義意識嚴重，道德淪喪，工廠企業只顧多賺錢致富，不理生產所產生的廢氣，造成嚴重空氣污染，生態環境惡化，大大損害民眾的健康等等。廣大人民蒙受物價樓價日益飆升，工資遠遠追不上高漲的生活程度，以致苦捱生活難、居住難、醫病難、就業難、上學難等痛苦。國家雖有16萬億超過國防費的財政盈餘，卻撥給國家安全的維穩費超過國防費的7千多億元，但民生福利醫療教育等費用則合共只有5百多億元，這樣大的偏重前兩者而太輕視後者，是極不公平、不合理的公共資源分配。再加上對當局大量倒行逆施的非常不滿，便激發起民眾的抗爭，他們有的是以群體行動，其中有反對強拆迫遷，又有反對建立核電廠等的，也有許多人因太不滿憤而在公共場

所進行爆炸，其中最爲海外所知而廣爲報導的，從今年6月到11月便有4宗，由東突族人爭取少數民族自決權以至獨立權的鬥爭，其中就是三中全會召開前在天安門附近的爆炸，死傷許多人（包括吉普車上進行爆炸的三人也同被燒死），而很多的恐怖行動都具有犧牲自己的性質。這些都是中國民間怨憤沸騰的部份爆發事例，顯示出政局的不穩定性。

我們並不贊同個人的恐怖行動，認爲是無效反而會危害無辜人民生命的，應該發動廣大民眾去爭取權益，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對於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爭取民族自決以至分離權，中國在必要時應該仿照前蘇聯時代在列寧領導下容許境內各少數民族有權分離獨立，所以國名也稱爲「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簡稱蘇聯），從而能夠使得蘇聯境內各少數民族盡量融洽相處，減少民族之間的紛爭。

在對外方面，由於中國經濟實力僅次美國，造成其他一些國家比如日本制造出中國威脅論，特別是南海等周邊海域產生的紛爭。這也需要國家安全委員會來考慮、評估、應付。而由於中國外交政策只顧與一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大打交道，親善友好，慷慨地給予他們大量的有利貸款經濟援助，卻極少援助其他國家的工農階級及其政黨，以幫助他們蓬勃發展，直至有力量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國家；從而反過來幫助中國走向同樣正確的道路。這樣的走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才能使中國免於孤立無助。但這條正確道路不會是今天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要走的。這也是中國很不穩定的禍根所在。

2013年12月6日

中國最大的劫難

破謎

袁隆平的憂慮

在一片高談闊論‘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中國雜交水稻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卻憂心忡忡：

“我眼前浮現的分明是一片混亂、人相食、餓殍遍地、流離失所的情景，隨時都可以發生，並且已經不可避免。還有比這更大的危機嗎？沒有。位卑未敢忘憂國，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袁隆平說中國最大的危機就是糧食危機及食物安全：

“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了，或者食物短缺了，那麼就天下大亂了，政治也好、道德也好、經濟也好、良心也好，一切、所謂一切，包括政府，都會在食物危機面前蕩然無存，不足掛齒。”

“中國市場上的食物看起來還很豐富。但哪裡來的？內行人都清楚，這不是自然生長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長的食物。喂豬，正常餵養要一年，而市場上供應的基本上都是三個月長大的激素豬；喂雞，正常要半年，現在市場上的雞肉幾乎都是28天長大的激素雞。還有我們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

“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已經只有80%出頭，中國的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賴進口原料加工。據網上資料，僅去年一年中國的進口黃豆就多達6000萬噸，按中國13億人計算，折合到每個人頭上是一年將近100斤，這是多麼大的數字啊。這裡還不說它是轉基因黃豆，更不說轉基因還對生育能力有害。”

“以前種子都是在各家各戶的農民手中，農民年年留種，這家沒有那家有，是安全的。現在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種子公司購買，種子公司購買的種子只能夠種一季，是不能夠

留種的，否則長出來的是草。種子公司的種子會出問題嗎？只有天知道。但真出問題了，農民哪怕有地也沒有種子下地了，多麼恐怖！更何況，據報導，我們國家的種業公司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資手裡，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

耕地污染

“鎬大米”、“重金屬蔬菜”等事件的曝光，讓土壤污染問題引起廣泛關注。“土壤污染事件頻發，是我國環境容量到達臨界點的表現之一。”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錢冠林指出，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長期性和不易修復等特點，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食物安全。

土壤污染的成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工礦業的“三廢”排放。廢渣經雨水淋溶污染土壤，廢水經河流污染農田，廢氣（包括汽車尾氣）通過大氣沉降在土壤中累積；二是農業面源污染。化肥、農藥、地膜的過度使用，造成污染物在土壤中長期殘留。禽畜飼料中含有銅、鋅、砷等添加劑，長期使用禽畜糞便作為有機肥也可造成土壤污染；三是垃圾圍城、圍村，污染土壤。

環保部2013年發佈的《中國土壤環境保護政策》顯示，我國土壤污染的總體形勢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嚴重，在重污染企業或工業密集區、工礦開採區及周邊地區、城市和城郊地區已經出現了土壤重污染區和“高風險區”。該報告稱，在各類環境要素中，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終受體，大量水、氣污染陸續轉化為土壤污染，損害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然而，由於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滯後性等特徵，其對人類的危害將是災難性的。土壤

中的重金屬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後，具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危害。

錢冠林還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涉及搬遷工礦企業的職工安置，農民經濟受損和群眾健康受損的補償問題等，如不能妥善處理將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2013年12月30日，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關於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主要資料成果的公報》。¹

根據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國務院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世元，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全國耕地13538.5萬公頃，園地1481.2萬公頃、林地25395.0萬公頃、草地28731.4萬公頃。

2009年全國耕地數是20.31億畝，到了2012年，耕地資料是20.27億畝，比以往的18億畝增加了2億畝。王世元稱，約5000萬畝左右的耕地因中、重度污染已不太適宜耕種，明年也要啟動修復。加上一部分耕地因工礦塌陷、地下水超采等已造成地表土層破壞，也不適宜耕種，“適宜穩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18億畝多”。

在1996年到2009年的13年間，全國城鎮用地增加比較快，優質耕地減少得多。13年間，城鎮用地增加4178萬畝，佔用大多是優質耕地。僅東南沿海5省就減少了水田1798萬畝，相當於減掉了福建省全省的水田面積。

從補充耕地的能力和品質看，耕地後備資源嚴重不足。上海、天津、海南、北京可供開墾的未利用土地接近枯竭，江蘇、安徽、浙江、貴州等省也都有限，建設佔用耕地的補充難度很大。

我國耕地形勢嚴峻，人均依然呈下降趨勢。1996年的時候，人均耕地1.59畝，到2009年，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其他因素，下降到1.52畝，明顯低於世界人均耕地3.38畝的水準，且

區域間很不平衡。

為解決土地污染問題，國家每年將拿出幾百個億，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地下水嚴重超采綜合治理的試點。

2012年，財政部與農業部還聯合下發了《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實施方案》。財政部已向農業部撥款8.27億元，由農業部用五年的時間對全國農產品產地的重金屬污染狀況進行調查。

“我們的大氣和水污染治理已經走了將近40年的歷程，但是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幾乎還沒有啟動。”2013年12月8日召開的“2013年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公開表示，基於這一出發點，一旦土壤修復市場打開後會非常大，遠遠超過大氣和水的治理，將是幾十萬億元的市場規模。

不過，有研究顯示，污染土壤修復治理資金需求巨大，如荷蘭2000-2009年土壤污染修復成本為3.35億歐元/年，其中政府投入為1.6億歐元/年。根據歐美等發達國家經驗，土壤保護成本：土地可持續管理成本：場地修復成本，基本上是1：10：100的關係。

又是‘先發展後治理’的邏輯作怪。

中國有著5000年農耕文明的歷史，可惜在短短一百多年推行資本主義現代化，卻使中華民族逐漸陷入生存的絕境。

但願「雜交水稻之父」乃杞人憂天。



¹ 2013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報》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中國地方債務危機

青岩

2013年12月30日，審計署發佈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65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256.49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66504.56億。

中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98129.48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600.72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23110.84億元；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859.17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6655.77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3393.72億元。

此次審計包括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與2011年審計範圍相比，增加了中央和鄉鎮兩級政府。

此前2011年的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占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369.74億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16695.66億元，占15.58%。

與2011年地方債10.7萬億元的規模相比，此次地方債規模增長到約17.9萬億元。到2012年底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為39.43%，低於國際通常使用的60%的負債率控制標準參考值；全國政府外債餘額為4733.58億元，占GDP的比率0.91%，低於國際通常使用的20%的控制標準參考值；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為105.66%，處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債務率控制標準參考值範圍

之內。

審計署新聞發言人陳塵肇表示，從我國經濟發展水準、政府性債務的現狀，以及資產與負債的相互關係看，我國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審計也表明，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較快，部分地方和行業債務負擔較重，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部分地方和單位違規融資、違規使用政府性債務資金。

審計署財政審計司司長袁野指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設、土地收儲、交通運輸、保障性住房、教科文衛、農林水利、生態建設等基礎性、公益性領域，其餘債務資金用於工業、能源等方面。形成了大量優質資產，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但是，袁野分析了政府性債務管理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一是由於財稅體制不夠完善，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地方普遍通過舉債彌補資金缺口。二是一些地方領導幹部政績觀存在偏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投資衝動，盲目舉債發展，加之對地方政府及領導幹部考核機制缺乏債務管理約束，致使部分地方的政府性債務增長較快。違規融資、違規使用債務資金問題仍不同程度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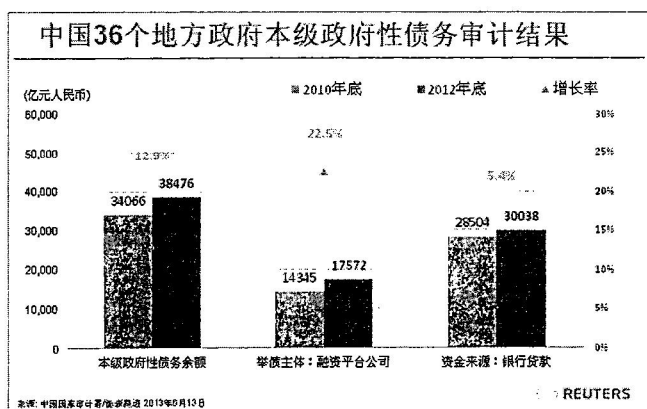
此次審計發現政府性債務管理中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較快，年均增長19.97%；二是部分地方和行業債務負擔較重，有的地區債務率已經超過100%，債務償還壓力較大；三是地方政府性債

務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四是部分地方和單位違規融資、違規使用政府性債務資金等。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還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堅決遏制地方政府追求短期GDP增速的“政績衝動”。地方政府不能搞大躍進，無論是經濟建設、城鎮化建設，不能急於求成，而要量力而行，要保持合理的債務率，不能一口吃個胖子，否則多少錢都不夠花。

中国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一览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年度	政府层级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政府或有债务		合并口径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2012年底	中央	91,377	2,836	21,621	118,834
	地方	96,282	24,871	37,705	158,858
	合计	190,659	27,707	59,326	277,692
2013年6月底	中央	96,129	2,601	23,111	123,841
	地方	108,859	26,656	43,394	178,909
	— 省级	17,781	15,628	18,331	51,940
	— 市级	48,435	7,424	17,044	72,902
	— 县级	39,574	3,485	7,358	60,419
	— 乡镇	3,070	116	461	3,647
	合计	206,989	29,256	66,505	302,750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 中国国家审计署



2013年6月11日，審計署發佈了“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顯示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已接近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12.94%。16地區債務率超100%，債務率最高達

219%，違規為817億元債務提供擔保等問題紛紛浮出水面。

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38475.81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12.94%。

從債務資金來源看，2012年底債務餘額中，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分別占78.07%和12.06%，仍是債務資金的主要來源。從債務率（債務餘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衡量債務規模大小的指標）看，36個地方政府本級中，有24個地區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比2010年下降；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有31個地區債務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0個地區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有16個地區債務率超過100%。

2012年，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部分地方由於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償債壓力加大。2012年底，4個省本級、17個省會城市本級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餘額7746.97億元，而上述地區當年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需償還本息2315.73億元，為當年可支配土地出讓收入的1.25倍。

審計抽查發現，2011年至2012年，地方通過融資和違規集資合計2180.87億元。這些融資方式蘊含新的風險隱患，如BT融資年利率最高達20%。5個省本級和3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有關部門違規為817.67億元的債務舉借提供擔保。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中，仍有8個尚未出臺政府性債務管理規定。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戰分析，“目前，地方政府舉債已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只要有條件、有機會都會這麼做。”他認為導致地方政府大肆舉債的原因如下：一是要幹事，但沒錢。現在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地、縣級政府，其收入和支出嚴重不對稱，要幹事就必須借債。二是考慮到借的是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及國有商業銀行的錢，屬於“政銀”合作，都是國家的，也沒有放在自己腰包，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多借一些。三是寄希望用預期土地收入還債，或者招商引資後還債。其實這樣做風險更大，土地市場會收得越來越緊，房地產市場只會緊不會放。預期不靠譜。四是監督不力。我國財政金融領域的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體制改革遠未到位，監督手段明顯欠缺。

審計署財政審計司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中存在問題和風險隱患。一是債務規模增長較快，有4個省和8個省會城市本級增長率超過20%；二是部分地區和行業債務風險凸顯，債務償還過度依賴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還貸二級公路等；三是一些地方通過信託、BT（建設-移交）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融資問題突出，隱蔽性強、籌資成本高，蘊含新的風險隱患；四是融資平臺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部分融資平臺公司資產品質較差、償債能力不強；五是一些地方還存在違規擔保、違規融資、改變債務資金用途、債務資金閒置等問題。

財經評論人楊國英指出，在近年來基礎設施建設已相對飽和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投資衝動之所以仍難消退，除與“保增長”的政績訴求相關外，還與部分地方政府主政官員的關聯利益有關。眾所周知，在地方政府財政預決算體系仍不健全、招投標仍存在形式或實質的不透明之下，地方政府通過持續舉債，不僅可以

推動相關行政主導型投資，實現“保增長”的短期政績，更可以由此為關聯人的利益輸送提供便利。

丁茂戰則批評，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透支未來。“部分地方政府的領導風險意識差，為官主要考慮當下政績，明天之事明日再說，保不准即將升遷或調整更好崗位走人，並且越是在可見時間裡可能提拔的人，借錢越無所顧忌。傳統政績導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以GDP、城市建設、形象工程為導向的問題普遍存在。如何科學合理地衡量經濟發展的品質，在許多地方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經在2013年7月17日發佈了2013年度對中國宏觀經濟狀況的“年度體檢報告”。其中估算，截至去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達45%以上。報告稱，由於近年信貸激增及非傳統金融迅猛發展，中國地方政府通過預算外融資活動的借貸大幅增長。如果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預算外資金納入廣義政府債務範圍，那麼去年的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45%。雖然這種情況目前仍然可控，但如果金融部門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暴露進一步快速增大，最終出現無序調整的風險就會增加。

引用資料來源：

“中國地方債規模低於預期 專家稱不能掉以輕心”，2013年12月31日，中國新聞網。

“審計署：36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近3.85萬億”，2013年06月11日，新華網。

“IMF：中國廣義政府債占GDP比重超45%”，2013年07月19日，新京報。

“人民日報談地方政府近4萬億債務：只鋪攤子不管還”，2013年06月12日，鳳凰財經。

訪陳獨秀舊居隨感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04年耶誕節期間，我專程趕到墨西哥南部Coyoacan小鎮，參訪托洛茨基展覽館。它是主人公最後幾年生活的故居和遇難地，最近剛得以改建。我在旅墨期間讀完了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在他的紅軍總司令部鐵甲列車上與白衛軍進行生死激戰時寫成的反駁考茨基的文章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小冊子。這次墨西哥之行，確認了我對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我很幸運能繼承這麼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¹

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4周年國慶日，我受重慶有關方面邀請，專程趕到“1929年因參加托派等原因被開除黨籍”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連任了黨的一至五屆最高領導人”²陳獨秀1938年8月-1942年5月最後的生命舊居。舊居位於重慶江津南郊五舉石牆村，四周田園風光、空氣宜人。該建築建於清乾隆、道光年間，複四合院佈局，座南面北，土、石、木結構，挑梁式梁架，歇山式屋頂，四周以條石砌成丈余高的圍牆，總面積3600平方米。新建的前庭，除了“陳獨秀舊居”的橫幅字匾，還有陳獨秀手書的“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對聯，可以感受江津、重慶地方政府對陳獨秀的特殊關照。比起在他鄉被刺殺的俄國革命的領袖，中國革命的領袖在此可以安息了！

陳列館儘量忠實歷史，把“蔣先生”（蔣介石）捐助5千元安葬陳獨秀的記錄也顯示出來。除了對陳獨秀前期貢獻的讚揚，我注意到陳列館也把陳獨秀晚年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

政（列寧主義核心³）的“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作為陳獨秀對民主的貢獻展示出來，不由得引起瞭解那段歷史的人對陳獨秀在當代中國政治復興的聯想⁴。“與時俱進”的陳列館甚至把陳獨秀也作為“反腐敗”的創始人，好像中國共產黨現在才發現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其實，任何近代組織，都應該有“利益衝突回避原則”或“盡職調查”一類的規則。例如，在美國要註冊成立非營利/非政府機構，必須簽署類似的規則。

我們也順便訪問了同在江津的“聶榮臻元帥紀念館”。我在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已經熟悉“兩彈一星”工程的歷史，也讀過他的傳記，但動盪的國際流亡歲月消退了我青年時代與美蘇對抗的愛國主義“三角格局”激情（文革結束後，中國只有核子物理這個唯一的“高科技”能夠與美蘇抗衡）。我又很幸運能繼承這方面的遺產。不過，與聶榮臻過去的榮耀相比，陳獨秀同時還代表著中國政治（民主、人權）發展的未來。

2013年10月10日



¹ 趙京：“墨西哥之旅隨感”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² 引自“陳獨秀舊居陳列館”介紹，表示陳獨秀創立的中國共產黨現在對他的官方定位。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³ 其實也可以由此推斷陳獨秀不是“托派”了。

⁴ 趙京：“陳獨秀：問題、思想以及‘復興’的可能”，2002年1月8日。收入2008年10月1日出版的《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ISBN: 978-0-557-01635-8。

給不相識的朋友們（轉載）

謝山

高牆、鞭子、鎖鐐，

把我們層層隔離，
但能否隔離我們的心？

聽——

嘹亮的歌聲
衝破了陰森的鐵窗，
我知道你還活着，
還在堅強地鬥爭。

讓狡猾的狐狸去嘲笑吧，
讓法利賽人去準備絞索吧。
戴上荊棘的王冠，
背起歷史的十字架。
用沸騰的熱血
澆開革命的鮮花，

讓雄雞的啼聲
喚醒沉睡的奴隸。

再見吧，朋友，
不用悲傷，
不用留戀，
我們的理想
像北極星永照着我們。

會有這一天——
在火熱的戰場上，
在凱旋的盛會裏，
我們佈滿了刀創的手
又將緊緊地握在一起！

1953年元旦

註：1952年12月22日，全國托派被一網打盡，廣州的托派關在黃華路看守所，各囚一室。元旦前夕，何若平聽到解放軍在院子唱《史達林頌》歌，他站在窗口振臂高呼：『打倒史達林！』『史達林是劊子手！』『你們受騙了！』……一下子哄鬧起來，把他拖出去，毒打至深夜，斷了一條腿。第二天，張美德吹口哨，吹的是《國際歌》，還有中外名曲。吹得悅耳、準確、動聽，響澈監倉。謝山大受鼓舞，寫此一詩。

我是一顆渺小的水滴（轉載）

謝山

我是一顆渺小的水滴，
我是多麼微弱，多麼無力：
微風能把我吹得粉身碎骨，
暖日也會把我炙得窒息，
我聽憑擺弄——變圓變方，變紅變黑，
讓那清澈的胸腸填滿了混濁的砂礫，
我只有忍受，我只有忍受——
因為我只是一顆渺小無力的水滴。

我不會永遠是一顆渺小無力的水滴，
我將是溶合在汪洋大海裏的一顆水滴。
我渴望着海——
我渴望着奔騰怒嘯的海：
烈日絲毫不能灼傷我們的皮膚，
風暴只會激起怒濤的咆哮澎湃，
任那滾滾的泥沙不斷瘋狂地向我們襲擊，
然而它們只會沉入海底，永遠在海底歎息。
我們要衝毀山嶽，讓千萬年來的沙漠開始啜吸到生命的水源，
我們每一滴水滴都滋養着沿海的人民，分擔着他們的歡樂悲哀。
在皎潔的月夜裏，我們會奔躍着閃出茫茫無垠的銀光，
那時，你會聽到我的歌聲，這歌聲是多麼暢快——
因為我不只是一顆渺小無力的水滴，
而是溶在汪洋大海裏的一顆水滴。

1963年冬至

怒風下的聖誕（來論）

陳中禧

怒風威脅流離失所的人
呼嘯不息如干戈劍擊
如原野奔豹
嘶殺奪命拆骨追魂
億萬眾生被吞噬
疲乏絕望縈迴
忽見天兵高唱勝利之序曲
宣告神子已降臨

創子手星散
失去靈魂的人不再垂頭
忿怒的敲打樂逐出元兇
干戈止息命蹇變易
以馬內利屬於尋找祂的人

聖嬰不慕佳形美容
切斷歷史欲望之根
新枝茂展信望與愛
和平寧靜喜悅感恩
以馬內利屬於尋找祂的人

陳中禧於2013時近聖誕，清晨被怒號之北風吵醒

又到聖誕

我城受西方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影響甚深。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我便正式接觸基督教義。但“聖誕節”這名稱，則在四五歲時便聽聞，因為當時父親是廣州培英中學的校友，長兄及三姊則是香港培英中學的學生。每逢聖誕，他們都熱衷參加學校或校友會舉辦的聖誕慶祝會。我因年紀太少不能晚睡，故每年必乖乖在家等候他們所稱“聖誕老人”的禮物。而真的在平安夜睡醒後，必有糖果禮物等待著我。如是聖誕對我而言，是十分歡欣的日子。

到了小五，在聖公會基信小學唸書，知道耶穌降生之事，也開始在每年十二月興奮地與兄姊在家佈置聖誕，感受一下歡樂的氣氛。後在培道中學肄業，於佈道會中決志，從此更重視聖誕，

務將佳音傳播。故學唱優美的聖詩，到處報佳音是最要緊的事情。

中六畢業，申請專上學院升學時，向上主祈求，入讀那一系以預備自己傳佳音？最後得感動為中文系。原因之一是看見當時教會派發給未信者的福音單張，內容千篇一律，設計也追不上時代，無法吸引讀者，深入人心。於是決志寫好的單張去傳福音。

讀大三那年，創辦<<突破>>雜誌的重要人物之一的蘇恩佩姐姐蒞臨浸會學院基督徒團契，分享<<突破>>異象。我被她的見解及言詞深深感動，於是參加了兩屆突破寫作營，認識不少志同道合者。在寫作營中獲益不淺的，除親炙名作家朱西寧及余光中等外，更明白傳福音必先要“進到人群中”；而文字工作則是福音鬆土，福音前哨；以文化感染之力去預備人心，接受福音。文字工作的功能異於教會；也異於教會或機構不同方式的佈道會，旨在短期內叫人決志，繼而入教，以求可見的人數增長。

蘇姐姐另一令我終身難忘的話，是“基督徒要有屬靈的透視力”。當時不明所言，但人老了，便漸漸明白。這話的合意是不但別人追求什麼，不需追隨；住豪宅，開名車；身分地位，功名利祿；這一切主在世時已學會超然；而祂的死與復活，更叫你看到永生的意義與萬事萬物的因由。憑主給你的信心，學會憐憫，同情，寬恕，包容，接納。如是每一天，你便看見別人看不見，看不透的事理，也能實踐主耶穌獨特的教導，改變以往的人生觀與處事方式。

今天我城的聖誕節，不但表面歡樂如昔，更從極度璀璨的燈色煙花，美酒佳餚之中，瞥見鼓吹消費的社會已腐敗至極。基督徒如何不與世同流合污？如何有“屬靈的透視力”去喚醒人心，回歸聖誕的主人-耶穌基督的真理；抗衡消費，向關心身心靈有需要的人的真聖誕進發???願我們時刻儆醒，一起努力！

陳中禧有感於20.12.2013，24.12修訂

颱風海燕/約蘭達： 每個新生猛烈風暴的內在肇因是化石燃料業和資本主義 亞歷山大·A·科斯塔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超級颱風海燕（也稱為“約蘭達”）襲擊菲律賓的12天后，死亡人數達到4000人左右，該數目還在繼續增長，該颱風持續風速達每小時310公里（每小時195英里），陣風達到每小時375公里（每小時235英里）。它的強度達到“5級”，按照目前颶風的衡量標準，這是最強烈的風暴。[1] 然而，對於如此強烈的颱風，如果在正式的衡量標準上再加多一個級別的話，那麼海燕肯定會被歸為“6級”。海燕是公認的襲擊人類聚居地空前強烈的一個風暴。伴隨著極端強風，暴風海潮立刻引起大量的破壞和生命損失。數以萬計的人成為難民；許多人現在變成了孤兒和寡鰥者。

海燕可能只是即將到來的暴風的一個前兆

“當你讓氣候變暖時，你基本上是在提高颶風的速度上限”——克里·A·伊曼紐爾，大氣科學家，麻省理工學院

颱風（太平洋），颶風（大西洋）是本質上相同的現象：熱帶氣旋。這些氣象系統形成於溫暖的海洋水面，空氣受熱上升，在洋面形成低壓。由於地球的自轉，當低壓條件出現時，空氣不是像吸塵器那樣被簡單的吸進。相反，風偏轉，開始順時針旋轉（在南半球）或逆時針旋轉（在北半球）。當空氣速度增加時，蒸發也加強，使大量的水進入大氣。上升運動把水汽送上高空層，在那裡凝聚，產生雲層。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來自一個溫暖洋面的水分子，從蒸汽轉變成液體，會釋放它們所含的大量能量（“潛熱”）。其結果是，空氣進一步受熱，加速向上趨動。這個過程提升了低壓系統，使得風旋轉加強，轉而又加速蒸發，如此交互作用。從而產生颱風和颶風，我們的氣候科學家們稱之為“正回饋”。如果條件有利，這些怪物會成為持久和強大的風暴，它們的食物就是溫暖的海水。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洋面溫度上升會發生什麼情況... 而它們已經上升了，升了很多。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最近的第五次評估報告（AR5），自1970年代以來，洋面升溫的平均速率，超過每十年十分之一攝氏度。這毫不奇怪，因為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的累積影響，造成地球的能量失衡，其額外熱量的93%滯留在海洋。事實上，在世界海洋700米的上空，熱能以137 TW（萬億瓦）的速率累積。同世界各地的我們這個物種所生產的全部電能相比，這個能量大60倍左右！[2] 這個能量必須以某種方式釋放出來！而風暴只不過是氣候系統解決這個物理動盪的一個有效手段，把這種存儲的能量大量的轉入海洋（因全球氣候變暖變得更大），轉移進到大氣中。颱風海燕可能只是未來氣候的一個先兆而已。

此外，已經知道，暖化引起海水擴大，海平面上升。其對全球平均海平面的人為影響已經明顯，加上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最近幾年，菲律賓周圍的洋面以每十年約10釐米的速度上升，正如IPCC的第五次評估報告表明的那樣。由於海洋面的持續上升，沿海地區的所有風暴的影響趨於擴大。

我們能說全球氣候變暖是這些風暴的肇因嗎？

有時候人們會說：“大風暴總是有的”。事實上，1961至1990年（這個時間段，是世界氣象組織通常用作為“當前”氣候的參照時段）有10個非常強大的大西洋颶風（或“級別5”），而且自從19世紀以來，就有致命風暴肆虐菲律賓的報告（如1867年的安吉那颱風，造成約1800人喪生）。

然而，在目前，全球海洋表面溫度，平均比1961-1990的中間值高近0.4°C，比150年前可能高0.6°C。根據簡單的物理學，每十分之一度的

指數式增加，會讓溫暖的海水出現蒸汽[3]。另外，由於相同的物理原因，大氣中水蒸氣含量在40年內增加了3.5%。

如果全球變暖是指水變熱以及大氣中有更多的水蒸氣，那麼結論就是，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更暖的世界中，現在這個世界更容易產生大規模的像颱風海燕那般的風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許多氣候科學家不接受舊說法的原因，因為這個說法簡單地認為“沒有一個單獨的風暴是全球變暖造成的”。這是一個半真半錯或者更糟糕的說法。如果全球氣候變暖為大風暴提供了額外的燃料，那麼目前所有的風暴都已經有了人類的指紋，每一次風暴都可能比它在較涼水域上形成的風暴更強。作為一個整體，它們甚至不能被看作是“自然現象”了！

對於這種類型的“概率因果關係”有大量的類比。經典的一個是下注於一個已裝入的賭場骰子，它一旦滾動時，其結果可能不清楚，但多次重複後，當骰子的數字出現率已經不再有均等的機會時，可能會出現一個驚人的效果。描繪變暖大氣和海洋的另一種比擬是使用類固醇或興奮劑的運動員。在上述任何物質影響下的一個足球運動員，肯定都會讓他/她的整體性能改變。要把某一特定的踢或跑，同他/她的血液中這些物質的存在作連接可能是困難的，但以此無視他們在全域上發揮的作用，則是犬儒主義。這正是氣候變化否認者的作為是在幫助化石燃料行業的原因。相反，認為全球變暖已經助長更強的風暴，則是科學合理的！

在400ppm大氣二氧化碳的情況下，化石燃料業必須對更大的災難承擔責任

目前全球變暖是由地球大氣中積累的溫室氣體造成的，IPCC報告已經正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還有大量的科學論文舉出了明確的證據。我們接近400ppm的二氧化碳的年度平均值，該值遠高於氣候科學建議的“安全極限”[4]，這個時候，人類對地球能量失衡所做的，主要就是排放這些氣體，給我們的能量，相當於每秒17顆廣島原子彈的爆炸。這部分顯著的不平衡把海洋加熱，尤其是加熱其上部[5]。

由於化石燃料是最主要溫室氣體（CO₂）排放的主要來源，所以有理由說，石油和煤炭公司其實應對熱帶氣旋的強化負責。於是，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當全球變暖及暖洋同更極端事件，同更強的颶風和颱風的關聯的物理機制明明白白時，我們是否要讓他們一直藏身在氣候科學的不確定性（因為觀測網路和計算模型工具仍然有局限）的背後？有大量證據向我們表明，一個更暖的世界會生出可怕的風暴，颱風海燕是一系列毀滅性災難中的第一個；在如此情況下，我們仍然要讓化石燃料公司逍遙法外嗎？

大氣中多餘二氧化碳的影響無處不在。因此，今天在地球大氣層，連帶在氣候系統的其他部分裡面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化石燃料企業有關，因為它們把廢氣排到大氣中[6]。此外，在工業革命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水準以外，即使不是一個進一步的人為排放量，也已經能夠把世界加熱至少額外的十分之一攝氏度。它也能長期保持深海溫暖，可能會持續許多世紀或幾千年，結果讓海平面大為上升。這兩個因素（暖水，推動熱帶氣旋與強風；更多的降水和升高的海平面，擴大風暴潮），已經擴大了颱風颶風的登陸造成的災難影響，特別是對貧困弱勢者的影響。

但是，由於排放量繼續年復一年的增加，二氧化碳的累積更多，其趨勢是超越其他的界限，遠超出350ppm。相對於前工業化時代，除了提供超過2°C的暖化以外，越過450ppm就像是走在流沙。如果有一些一定強度的“正回饋”出現，那麼全球變暖就可能自我維持下去。這包括“水蒸氣回饋”（大氣越熱，水蒸汽越多，這就能夠持續下去，但是如果蒸汽本身就是一種溫室氣體，它在大氣中出現的增強，會讓大氣本身和其下面進一步升溫），而“冰反射回饋”（世界越熱，冰融越多，因為海冰是一個光滑的表面，會反映大部分的陽光，防止其滲透到海洋內部，被海洋吸收，減少進一步變暖，等等，也即氣候變暖產生冰融化，而冰融化有促進氣候變暖）；“凍土層的回饋”（凍土中含有有機物質，因為全球變暖而解凍，它暴露而分解，釋放甲烷和二氧化碳到大氣中，從而增強了溫室效應，提供額外的變暖，進一步讓凍土解凍）等；其它回饋涉及到打破像熱帶森林那

樣的土地生物群落的穩定性，釋放目前以籠形物存儲在海洋底部的甲烷等。

也許在北極[7]和北極海冰（整理得很好的科學文獻，包括IPCC AR5）發現的高濃度甲烷的解體還不是氣候變化不可逆轉的完整指標。但這些事實至少應該被視為嚴肅的警報，觸發這些回饋可能最終導致地球氣候系統不穩定，失控，螺旋變化的風險。因此，我們只能同意菲律賓代表團耶布·薩諾（Yeb Saño）先生在華沙第19屆締約方大會（COP19）會議上的說法，即氣候危機是“瘋狂”的。

從瘋狂到整個地獄？

“我的哲學就是賺錢。惟有賺錢，是我想要做的。”——雷克斯·蒂勒森 埃克森美孚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據最近的估計，大約有7.3至11萬億噸碳儲存在化石燃料中（不僅包括傳統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還包括油砂，葉岩氣等非傳統資源），正如全球能源評估（GEA, Global Energy Assessment）報告指出的那樣[8]。

如果所有的化石燃料燃燒，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詹姆斯·漢森博士及其合作者，在“皇家學會哲學彙刊”發表了一文[9]，據該文說，許多區域可能變得根本無法居住。根據以往特殊溫暖氣候的證據（如約56百萬年前，古新世-始新世最熱（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時期，和42百萬年前的中始新世氣候最適宜時期（the Mid-Eocene Climatic Optimum））和模型，它們說明“如此規模的全球變暖將使大部分的地球不適於人類居住。人體產生的大約100瓦代謝熱量必須釋出，才能保持核心體溫在37°C左右，這意味著持續的濕球溫度超過35°C會導致致命的高熱。如今，整個地球表面的夏季溫差很大，但受濕度的影響，濕球溫度更局限集中，多在26-27°C左右，最高約31°C。10-12°C的升溫將把當今世界大多數人口置於一個濕球溫度35°C以上的地區。”

如果我們燃燒了超過7萬億噸如煤，石油和

天然氣那樣的碳儲存化石，這種極端的情況是我們可以達到的。對於那些可能懷疑這種情況的人，我們的鄰近行星，平均溫度高於460°C的金星，會提醒我們，失控的溫室效應可能會產生一個地獄，其中錫和鉛是液體，沒有水，沒有複雜生命（至少我們知道的生命）的機會，並覆蓋著濃密的主要是二氧化碳的大氣，還有厚厚的硫酸雲。

但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之前，我們可能面臨的問題是，鑒於極端事件的預期變化（不僅是熱帶氣旋，還有洪水，山體滑坡，熱海浪，森林火災，暴風雪——確實，在更暖的地球，它們變得更加劇烈，即使在冬季乾旱中，它也帶有更多的大氣水汽，等），數百萬甚或是數十億人可能束手無策。對於最弱勢群體，根本不可能應對比我們當前面臨的情況大得多的暖化。菲律賓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其最貧窮者，要應付目前的風暴，已經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除非世界上的統治階級旨在擴大氣候難民和屍袋，否則每十分之一攝氏度都事關重大！

人們必須控制化石燃料，讓它們原封不動

“我們很可能會把其他公司視作合作者，而不是敵人...當我們與地球的競爭時，我們彼此之間就沒有那麼多競爭。這也許是對待它的一個健康方式。”——喬治·柯克蘭，尼日利亞雪佛龍常務董事

“‘現實性’或‘非現實性’在既定的情況中是勢力關係的問題，它只能通過鬥爭來決定。”——托洛茨基，“過渡計劃”

儘管所有的證據都指出氣候變化是一個極其嚴重和緊迫的問題，但各公司依然不打算減少他們的牟利，不打算大幅度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這些公司所佔有化石燃料儲備如果燃燒，能夠把氣候系統推向到一個無法回頭的地步。題為“不可燃燒的碳，2013”的報告[10]指出，碳預算為2°C的方案，到2050年有大約5650-8860億英噸（Gt）的二氧化碳。這一數目來自於僅僅154-242英噸（Gt）碳的化石，這比GEA的全球化石燃料儲量估計少得多！那些與

金融體系合併的公司被，跨國機構飾以明亮的色彩[11]，其中只有200家佔有的資源所包含的碳儲量大大超過這個很吃緊的預算額，如果它們燃燒自己已獲認證的儲備，根據題為“不可燃燒的碳，2013”的報告，將相當於排放746噸（Gt）的二氧化碳。事實上，只有一個煤炭公司（俄羅斯 Severstal 股份公司（JSC Severstal））和三個石油公司（盧克公司（Lukoil），埃克森美孚和英國石油），可能產生近261噸的二氧化碳，超過2°C的碳預算估計的上限[12]。投資者希望這筆巨額化石碳被萃取並燃燒，變成利潤。但這同地球氣候的穩定和全球生態系統是衝突的。它破壞了保證我們這個物種（和許多其物種）長期生存的必要物質條件。

因此，只要這些化石燃料儲備保持在私人手裡，維持人類社會的尊嚴，平等和正義的物質客觀條件的機會就變得更加微弱。此外，為了保持完整...保持油在土壤中，保持煤在礦洞中，它們必須成為集體的。

托洛茨基在其“過渡計劃”中，總是由一種緊迫感驅動，因為二戰前夕的經濟危機影響工人階級。他說，“現在的問題是防止無產階級腐爛，士氣低落和毀滅。現在的問題關係到唯一具有創造性的進步階級的生死，以及人類未來的象徵。資本主義本身引發的災難，必然會引起一些需求，如果它無法滿足這些需求，那就讓它滅亡。”

或許關於氣候變化，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保護窮人、工人、青年、婦女、原住民、農民，也即保護變化中的主角，避開毀壞甚至死亡的緊迫性，避開如海燕颱風產生的影響。也許，我們在談論保護全球生物地球化學迴圈和的穩定性，保護食物和水的物質生產條件的穩定性。沒有社會主義可能存在於一個孤立的國家。在一片焦土上，野蠻變得比社會主義更有可能。

注釋

[1]薩菲爾-辛普森(Saffir-Simpson)暴風分級表如下：1級颶風風速在119公里/小時和153公里/小時之間，2級颶風(154-177公里/小時)，3級颶風(178-208公里/小時)，4級颶風(209-251公里/小時)和5級颶風(≥252公里/每小時)。

[2]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的報告，2010年全世界生產的電量為20,2380億千瓦時(<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一年有8760小時，它對應於23億千瓦(kW)或2.3太瓦(TW)。

[3] 特別是“克勞修斯-克拉貝龍方程(Clausius-Clapeyron equation)”表明，當溫度增加時飽和蒸汽壓力也增加（幾乎成倍的增加）。

[4] Hansen等(2008)：大氣中二氧化碳的目標：人性的目標應該在哪裡？開放性大氣科學雜誌。(2008年)，第二卷，217-231頁，見<http://arxiv.org/pdf/0804.1126v3.pdf>。

[5] 人為因素造成的地球能量不平衡是2.29 W/m²，如果把地球總表面積乘以這個數字，給了我們3.71022J (1J=1焦耳，國際能量單位)的能量。這方面的一個顯著部分不是保留在氣候系統中，因為隨著地球變暖，它發射更多的紅外線。無論如何，實際上約1/4是存儲在海洋（根據IPCC的第五次評估報告，為0.71 W/m²，能通量）。

[6] 在海洋中，除了氣候變暖，大氣中多餘的二氧化碳也引起快速的酸化，對於海洋生物具有潛在的災難性後果，因為依賴碳酸鈣固化的生物不能生長在酸性環境（實際上，當海洋酸化超過某一點時，碳酸鈣形式之一的霏石會飽和，許多生命形式的骨架，往往會溶解）中。

[7] 專家估計，“由於中緯度和北極濕地的氣候變暖，在2003-2007年，濕地甲烷排放量上升7%”(A·A·布魯姆，P·I·帕爾默，A·弗雷澤，D·S·雷伊；C·弗蘭肯伯格，2010：從甲烷和重力衛星資料推斷甲烷產生的大規模控制，科學，327卷，322-325頁。

[8] 2012全球能源評估：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T·B·約翰森等編輯)。拉克森堡，奧地利應用系統分析國際學院。

[9] J·漢森，M·ki 佐藤，G·羅素，和P·卡熱卡，2013：氣候敏感性，海平面，以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英國皇家學會哲學期刊A，371，20120294，doi:10.1098/rsta.2012.0294。

[10] 見於<http://carbontracker.live.kiln.it/U...>

[11] 參見以下連結：<http://www.tni.org/article/dirty-mo...>

[12] 根據不可燃碳資訊2013，使用這些資料，還有更多的計算：<https://s3.amazonaws.com/s3.350.org...>

關於中東政治伊斯蘭的三種說法

法魯克·蘇勒利亞

一個俄國猶太人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產主義，不過他的努力得到英國總參謀部情報部門的協助，後者在1919年成功的獲得伊斯蘭大教法長謝赫·穆罕默德·巴希特的反布爾什維主義追殺令。其結果同它的預期截然相反。一些報紙抨擊追殺令，捍衛布爾什維克。

政治伊斯蘭，也被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法語intégrisme），關於它的驚人崛起，出現了許多說法。然而，當談到“伊斯蘭主義”政治經濟學時，談到伊斯蘭主義者成功攫獲國家權力（沙特，伊朗，蘇丹，阿富汗）的後果時，經常發現這些說法的欠缺。在這樣的說法中，不是理直氣壯地強調帝國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勾結，就是指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或左派的失敗。

例如，喬姆斯基在與黎巴嫩知識份子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對話時，呼籲政治伊斯蘭“主要對世界的動盪勢力做反應”。關於“當今世界動盪的主要來源”，阿查和喬姆斯基強調“是美國政府的行為”（喬姆斯基和阿查2007年：27）。許多左派也同樣強調這一點。

然而，與喬姆斯基和阿查的看法不同，這樣的論點---在左翼圈中流行---不能解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原教旨主義者無法邁步前進的原因，而當時的“動盪勢力”在中東甚至比後來更加活躍。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意思彷彿是，一旦“動盪勢力”停止擴散動盪，基地組織就將放下武器。然而，無論是否有任何勢力擴散動盪，伊斯蘭主義者追求的是聖戰，直到大審判日。

近年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的論點被右翼最常應用到中東政治伊斯蘭上。但在亨廷頓之前很久，在1964年，伯納德·路易斯就主張說，阿拉伯對華盛頓的敵意不是由美國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合作所造成的。他認為蘇聯逃脫了這種敵意，儘管她支持建立以色列。路易斯認為，

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解釋，也即“如果我們認為中東目前的不滿，並非政府或國家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正如吉邦（Gibbon）所謂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大辯論’，自中世紀以來，一直在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進行”（雅可布 2004年：9）。

亨廷頓在一篇外交政策文章中誇大了“文明衝突”說法，而本·拉登引人注目的出現，強化了這一論斷。根據雅可布的說法，“‘文明衝突’論點的問題...就在於它巧舌如簧，撇開那些分明具體的不公平。對於冷戰時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以及最近的伊斯蘭主義者），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是反美情緒的真正原因，而不僅僅掩蓋更深的反感”（雅可布 2004：9-10）。

韓禮德把政治伊斯蘭的興起歸於“國家特性”。他認為，在如伊朗，阿爾及利亞，埃及，土耳其這樣的國家，政治伊斯蘭“採取了反抗政府的形式”，一個‘強烈現代化的政府受到社會政治反對派運動的挑戰’。但是‘在政府非常脆弱的國家，基地組織出現並持續其存在’。他援引阿富汗和葉門較大的北部這兩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反抗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而是反對政府的歷史性缺乏’（韓禮德 2002年a：41）。

最近，巴基斯坦已經成為基地組織的避難所，在那裡的“政府歷史性的缺席”是沒有道理的。此外，在共產黨執政時，儘管有美國的干預，政府法令幾乎已經行使在整個阿富汗。人們看到，在阿富汗和葉門，因為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干預，政府垮臺了。還有原教旨主義者的綏靖政策。此外，僅僅無政府狀態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除非我們分析原教旨主義者建立的另一種社會，這個社會提供本應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

巴博（Barber）指出一個全球性的條件，就是‘一個由通信，資訊，娛樂，商務綁在一起的

麥當勞世界’逐漸構成。從而，抵抗它的有效形式只有聖戰者所具有的前現代苦行精神，這些聖戰者已在全球穆斯林中間獲得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巴博 2000:21-6）。

巴博的說法聽起來漂亮，但中東已被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力量滲透了超過一個世紀。巴博的論點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僅僅在過去的三十年出現了宗教右翼的崛起，不僅在中東，而且在全球化本身的心臟地帶美國，也出現了基督教右翼爆炸性發展。

但是，為了避免‘項狄’式的討論（‘項狄傳’這部書的英雄直到整本書過了一半尚未誕生），讓我們先來定義政治伊斯蘭這個詞。

瞭解政治伊斯蘭

根據定義，“原教旨主義意味著回歸到伊斯蘭根源，在有些情況下，那意味著挑戰數百年來對那些來源的學術解釋”（西門特 1997:62）。

阿查喜歡“原教旨主義”這個詞，他說，““原教旨主義”這個術語通常不僅指宗教經文的字面解釋，也指社會和政府實行這些教義，以及每個人都遵循這些規則的願望...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不僅僅涉及到伊斯蘭教。還有 猶太原教旨主義，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天主教，基督教等等”（喬姆斯基和阿查 2007年：34）。韓禮德認為，通過觀察它的反面即“現代主義”，可以部分地理解“原教旨主義”（韓禮德 2002年 a：53）。

檢視這些定義，就可以理解下面三種敘述。現代第一個原教旨主義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況，可代表所有這些敘述。

1.帝國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母親

1957年1月5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授權他承諾給任何願意承認共產主義威脅的海灣國家，增加軍事和經濟援助，甚至提供美國的直接保護。兩個月後，國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會通過了舉世皆知的艾森豪主義決議。該主義實際上也針對阿拉伯民族主義（雅可布 2004:1-2）。為了不讓中東落入共產主義，華盛頓轉向了政治伊斯蘭。

為了控制這個方向的任何運動，華盛頓探索扶持沙特國王以抗衡納賽爾的可能性。由於該國王的反共性，他成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沙特也樂意幫忙。他訪問了伊拉克。這兩個君主同意忘記過往的敵意，反對納賽爾（馬達維 2002:116）。當他1957年1月訪問美國時，艾森豪超規格地前往機場迎接沙特國王。作為回報，沙特延長達蘭基地的免費租賃五年（韓禮德 2002年b：54）。美國向反布林什維主義的政治伊斯蘭的求愛，這同前英國殖民主義是一致的。

一個俄國猶太人約瑟夫·羅森塔爾，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產主義，他的努力卻獲得了英國總參謀部情報部門的協助，因為後者成功地在1919年8月獲得了伊斯蘭大教法長謝赫·穆罕默德·巴希特（Shaikh Muhammad Bakhit）的反布林什維主義追殺令。其結果同它的預期截然相反。一些報紙，像費邊主義者薩拉馬·穆薩的喉舌‘社群（Ahali）’報，和民族主義的‘尼羅河穀（Wadi-en-Nil）’報，抨擊追殺令，捍衛布爾什維克（巴塔圖（Batatu） 2004:374-377）。

同樣，在伊拉克，在1948年的瓦哈比運動（the Wathbah）和1952年的起義後，多年來動盪不安，這期間，伊拉克共產黨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宗教被用來遏止共產主義前進的步伐。顯然，其動機來自英國人勢力的代表。在一封日期注明為1949年4月20日的給伊拉克秘密員警的信中，一個情報官員寫道，“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單單被我們所謂的‘員警方法’完全根除”。在雷（Ray）建議的‘糾正’的方法中，就有他所謂的“宗教方法。”

顯然，為尋求一致---1953年10月6日---英國駐伊拉克大使約翰·特勞特貝克爵士，直接與主要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 教法權威闡述人），卡史夫·烏爾-嘎塔（Kashif ul-Ghata）接觸。這位大使極力勸說這個教長：“同共產主義的鬥爭

依賴於宗教學者和宗教領袖的覺醒”(巴塔圖 (Batatu) 2004年:694)。

艾森豪的學說首先在約旦受到考驗，因為在那裡國王侯賽因殘酷鎮壓了民族主義者，而穆斯林兄弟會是站在君主一邊的。那以後，約旦公民的自由被剝奪。然而，艾森豪則叫好，讚揚侯賽因的“英勇鬥爭，剔除其國家和政府的顛覆分子”(雅可布 2004年:135)。

此前，在1951年，伊朗議會已投票決定，把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國有化。不久，國有化的主要建築師穆罕默德·摩薩德當選總理。艾森豪政府懷疑摩薩德與莫斯科的關係。因此，他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變推翻(雅可布 2004:29-30)。

像往常一樣，阿亞圖拉·卡桑尼 (Ayatollah Khashani) 站在政變策劃者一邊。對卡桑尼的合作服務，中情局在伊朗的行動組付給阿亞圖拉1萬美元(金策 2003:157-178)。

這些歷史文獻至少部分地有助於解釋，帝國主義是如何培養了哈馬斯，真主黨，邁赫迪民兵，基地組織和伊朗的阿亞圖拉。例如，愛德華·薩德指出：“唯一不用巴勒斯坦資金而設立的巴勒斯坦大學是加沙的伊斯蘭(哈馬斯)大學，是以色列開建的，目的是在起義中破壞巴解組織”(薩德 1997年，第三十九頁)。

對此，亞西爾·阿拉法特曾經給予了肯定，“哈馬斯是以色列的創作，[伊扎克]沙米爾任首相時，提供金錢，其中還有700多個機構，學校，大學和清真寺”(納波萊奧尼 (Napoleoni) 2003:70)。

真主黨的崛起，通常歸因於伊朗。根據阿查的看法，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是，以色列“很刻意地解除了所有具有多元宗教成員之世俗意識形態的團隊---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或其他人的武裝。而他們並沒有解除地方自治團體的武裝，無論是什葉派還是德魯茲人，更何況他們的基督教盟友”(喬姆斯基和阿查 2007:29)。

人們也知道，在這裡應該有基地組織的空間。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間諜機構共同合力，武裝訓練和資助基地組織，以對抗在阿富汗的紅軍。

2.上校們和共產黨人

在20世紀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震動了中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民族主義者在埃及嘗到了首場勝利。1952年7月23日，自由派軍官們在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政變中奪取了政府的控制權。君主制被廢除。他們承諾杜絕腐敗，迫使英國從埃及撤軍，恢復國家的尊嚴。穆罕默德·納吉布是官方的領導者，但上校賈邁勒·納賽爾掌握實權。杜魯門政府對這個改變激情滿懷，認為新政府不會在該地區掀起反英情緒。1954年後期，納賽爾成為公開的領袖，他的泛阿拉伯哲學(反猶太復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社會公正和中立)於1956年最終成形(雅可布 2004:26-34)。他引進了土地改革，於1958年與敘利亞結盟，並於1958年首先支持伊拉克革命(阿里 2002，第95-107頁)，而1941年至1958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極大地加強了伊拉克政府的財政力量。其結果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經濟自主，無須依賴社會，加強了其專制潛力。同時，石油收入使得政府危險地依賴於石油公司(巴塔圖 2004:34)。

在20世紀40年代，共產主義成為伊拉克生活的一個因素。在20世紀50年代，即使是右翼的獨立政黨也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發牢騷(Batatu 2004:465-466)。

1958年7月14日，自由軍官在凱西姆的帶領下，奪取了政權，並宣佈成立伊拉克共和國。革命後不久，派系的鬥爭，一場反對開羅的宣傳戰爆發。以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 (Abdul Salam Aref) 為首的納賽爾分子，試圖發動政變。親凱西姆部隊，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挫敗了政變。十月，復興黨人企圖暗殺凱西姆(阿里 2004:71-80)。凱西姆現在依賴共產黨人，進行了一些社會經濟改革。

進行了土地的改革（1959-61年），限制所有權（3,000地主擁有56%的土地）。對收入超過20,000第納爾的富人所得稅的徵收上調（40%~60%）。引進了遺產稅和繼承稅。引進了租金控制。調整了工作時間。一萬個住房項目被引入了巴格達（後來被命名為薩達姆城）。1963年，阿里夫和復興黨人發動政變奪取權力。凱西姆被處決。復興黨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詆毀和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阿里 2004:82-88）。

復興黨被薩拉姆（Salam）拋棄，但他們在1968年發動政變重獲政權。那個時候，復興黨在敘利亞已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然而，在敘利亞，復興黨派別內鬥不斷，直到1970年11月，阿薩德控制了敘利亞，使得復興黨創始人蜜雪兒·阿菲拉克（Michel Aflaq）逃離該國（阿里 2004:109-110）。復興黨作為一個世俗的民族主義政黨成立於1943年，創立人是蜜雪兒·阿菲拉克和薩拉赫·比塔爾（Salah Bitar），兩人均為敘利亞人（阿里 2002:111）。

一上臺，伊拉克復興黨就鎮壓共產黨人，什葉派，庫爾德人以及每一個可能的反對者。1990年，復興黨的伊拉克入侵了另一個鄰國科威特，導致聯合國制裁，結果削弱了伊拉克的經濟。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同伊朗的戰爭已經破壞了伊拉克經濟（阿里 2004:103-143）。

復興黨規則被證明是伊拉克阿拉伯人的一個噩夢。在後薩達姆時期，舉行選舉時，什葉派原教旨主義者輕鬆贏得選舉，因為薩達姆已經清除了每一個世俗反對派。清真寺是唯一可進行秘密活動的中心。這證明復興黨無法團結伊拉克和敘利亞。因此，他們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幾乎不可信（阿里 2004:112）。

伊拉克的情況同埃及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並無不同，在後者那裡，民族主義者也在當權。在1958年2月，敘利亞和埃及宣佈結成聯邦。葉門和黎巴嫩也表示有興趣加入。但聯邦夢突然終結（阿里 2002:106-112），粉碎了阿拉伯民族團結的夢想。在土地改革方面，在1952年公佈了一些措施。所有權被限制在300費丹（*feddan*，埃及面積單位，等於1.038英畝）。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十幾年後的今天，只有兩百萬農民獲益，因為只有10%的被徵收土地可分配。至於工人，在1952年對罷工的鎮壓，已經設立了1952年以後的方向。在賽義德·古特伯之前很久，已有兩個工會領袖因組織罷工而被處以絞刑（1952年）（2002 阿里：96）。

然而，捲入葉門反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活動，這是自殺性的，這極大地促使了埃及在1967年同以色列閃電戰的失敗，並給了納賽爾政治最後一擊。

隨著納賽爾的去世，安華·薩達特（Anwar Sadaat）上臺，他遇刺後，則由胡斯尼·穆巴拉克繼任。於是納賽爾時代的改革回頭，由納賽爾獲得的民主自由還有待恢復。

巴塔圖（2004:461）對伊拉克民族主義者的觀察，適用於整個中東：

“取消人民自行組織政黨和工會的憲法權利，等於取出了民族運動的心臟。無視群眾的力量，你就不能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較力。”

3.石油美元之聖戰

據納波萊奧尼的看法，“伊斯蘭組織，其中許多都是武裝團體，他們所獲資金範圍從50億美元至160億美元，單是沙特政府，每年通過宗教的傳道工作就捐贈100億美元”（納波萊奧尼 2003:123）。

沙特的資金遠遠超出中東地區。例如，在巴基斯坦，拉什卡-托（LeT）地區是沙特慷慨捐助的主要受益者，“它有一個龐大的社會服務網路，含有20個伊斯蘭機構，140中學，8所宗教學校和一個30多萬美元醫療隊，這個醫療隊包括流動診所，救護車服務和血庫”（米爾：147）。LeT的總部，建築費高達5千萬盧比，包括“一個服裝廠，一個鐵鑄造廠，一個木工廠，一個游泳池和三個住宅區”（米爾：147）。誰買單？LeT的負責人說，一個“沙特商人艾哈邁德，捐獻了1千萬盧比”，而“另一沙特酋長捐贈了數百萬，在LeT總部建設達娃示範學校”。（米爾：148）

關於沙特政權，希洛說：“舉世皆知，它用巨大的財政支持阿富汗遊擊隊同喀布爾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戰鬥。人們普遍不知道的是：它用現金補貼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尼和馬爾代夫群島的右翼團體。多年來，它資助厄立特里亞武裝分子反對埃塞俄比亞的馬克思主義政權。而在非阿拉伯的非洲，沙特資助喀麥隆，乍得，加蓬，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和烏干達。在中美洲，它資助尼加拉瓜反對左派的遊擊隊”（希洛 2002:147）。

在維持伊斯蘭組織方面，沙特人並不孤單。伊朗對真主黨的支持，在媒體上有報導。盛產石油的酋長國，科威特，僅在1990年就共同資助哈馬斯6,000萬元，縱容哈馬斯對抗巴解組織（克佩爾 2000:157）。哈馬斯獲得沙特的慷慨捐資，也獲得伊朗的資助。據納波萊奧尼說：“在被占領土的哈馬斯預算估計為7000萬美元，其中約85%來自國外，其餘的由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但它仍然收到每年約為2-3千萬美元的捐款，這些款來自伊朗，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各種特設的捐款（2002年4月，在沙烏地阿拉伯，一個長期的電視節目為處在佔領區圍困下的巴勒斯坦人募集了1.5億美元），越來越多的錢是通過巴勒斯坦僑民，沙烏地阿拉伯私人捐助者和其他海灣石油國家募集到的。

1998年，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被以色列人釋放後，開始了四個月之旅的阿拉伯國家首都之行。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募集捐款超過3億美元”（納波萊奧尼 2003:71）。

石油美元也為穆斯林世界數百萬工人帶來就業機會。舉個巴基斯坦的例子，“在1983年這一年，由海灣移民寄回家的錢達3600萬美元，而巴基斯坦的外援總共才3.75億美元”（克佩爾 2000:71）。

埃及是另一個依賴海灣國家匯款的穆斯林國家。有一時間，300萬埃及工人在海灣國家工作，寄回家的錢達40億美元（希洛 2002:85）。

通過這一過程，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在沙特短期合同聘用期間，接觸保守的伊斯蘭觀點”

（希洛 2002:87）。雖然這些工作，為該地區統治者暫時緩解了人口迅速增長的威脅，但這種緩解是有附加條件的。出口勞動力到海灣的國家必須向瓦哈比主義（Wahhabism）開放大門，而瓦哈比主義則是扮裝成清真寺，宗教學校，血庫和慈善機構以及投資公司和銀行來到的。在某些國家，如蘇丹和埃及，來自海灣的“伊斯蘭銀行”，極大地促進了政治伊斯蘭的崛起。

成立於1977年的埃及費薩爾伊斯蘭銀行，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其執行董事是一位沙特王子。據克佩爾說：“在埃及，這些機構起初受到當權者的鼓勵，因為當權者在其中看到了機會，可讓他們贏得虔誠的中產階級的支持。他們的理由是，如果這個階級把它的錢放在伊斯蘭銀行，獲得可觀的利潤，它就不太可能加入伊斯蘭主義者領導的激進反對派。相反，中產階級的成員將經濟一體化，並會發現，延續讓他們致富的政治制度，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

但在1988年，埃及政府呼籲停止這一過程中，他們擔心這將使伊斯蘭運動取得鬥爭基金，協助穆斯林兄弟會財務獨立。因此，在新聞報紙界發起了一個反對銀行的運動，而同樣的報紙，過去一篇篇的廣告宣傳他們，宣傳對董事總經理們的訪談以及利於他們的教令”（克佩爾 2000:279-80）。1993年沙特出錢給穆巴拉克政府，條件是鼓勵埃及社會的伊斯蘭化。一個沙特組織，al-Rayan公司，給埃及女學生每個月15埃鎊（約合5美元）的零花錢，讓她們戴面紗（納波萊奧尼 2003:119）。

1980-85年，整個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投資經歷了一個可觀的擴張，導致幾百個伊斯蘭投資公司的創立，提供了約25%的年回報率（克佩爾 2000:279-80）。

納波萊奧尼指出：另外兩家銀行，“巴拉卡特是索馬里的國際金融集團，在40個國家有分行，包括美國分行。

直到2001年9月其資金被美國當局凍結以前，每一年，美國支行至少匯出了5億美元的國際利潤給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交換中心。

這些收入中，本·拉登的網路接收了足足5%，相當於約2500萬美元。Al-Taqwa是一家與伊斯蘭團體有緊密聯繫的銀行。它於1987年成立於拿索（Nassau），資本為5000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最重要的股東之一，是科威特的穆斯林兄弟革命黨（Muslim brotherhood al-Islah）。在其他活動中，它資助埃及市政選舉中的伊斯蘭候選人的政治運動。該銀行在30多個國家運作”。（納波萊奧尼 2003:160）

沙烏地阿拉伯的案例

在1902年1月，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不僅從對手-拉希德氏族手中扳回利雅德，還第三次重新建立沙特王朝（霍頓和約翰 1981:1-7）。

誠然，騎駱駝的沙烏地人已經成為一個闊佬家族，他們對於18世紀傳教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創立的復古主義邪教，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的承諾，並沒有被忘記。來自烏艾那（Uyayna）的綠洲城鎮的信仰復興主義狂熱分子，伊本·瓦哈蔔痛苦地看到阿拉伯陷入腐敗，他得出結論，解決的辦法，是回歸純粹伊斯蘭教，如有必要，強迫回歸（拉齊 1984:59）。

如果伊本·沙特不討好弟兄會（Ikhwan）的軍隊，目前的沙特政府就不容易出現。開始於1912年（霍頓和約翰1981:69），弟兄會（Ikhwan）是貝都因人，他們接受了瓦哈比主義的基本教義，放棄他們的生活，居住在伊本·沙特建造的棲居地（Hijrah）。弟兄會（Ikhwan）鞭打所有那些被發現怠惰他們宗教職責的人（2002 馬達維：57-59）。

不過，在擊敗沙特的對手方面，英國的津貼也發揮了關鍵作用（2002 馬達維：43）。當伊本·沙特征服了所有的對手，弟兄會（Ikhwan）開始成了一個挑戰。到1926年，全國各地有多達一百個弟兄會（Ikhwan）的定居點，能夠動員50000到60000名武裝人員，他們確實是一個威脅。因此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在一系列戰鬥

中，弟兄會（Ikhwan）受到挫敗。再次，由英國提供的機動交通工具，被證明極為有助於征服弟兄會（Ikhwan）（韓禮德 2002年b：57）。英國皇家空軍也起了作用（馬達維 2002：69）。

有了這些勝利，伊本·沙特在1932年9月22日宣佈成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馬達維 2002:71）。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第一次在現代歷史上建立了自身的國家。伊斯蘭清教徒一旦控制國家，他們就公然當眾處決了40,000人，施行了350,000例斷肢刑罰：這些發生在一個僅有四百萬人的國家（昂格爾 2004：68）。1945年2月14日，羅斯福和伊本·沙特之間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議，本次會議期間，啟動了石油交換安全的關係（昂格爾 2004:3）。

1953年11月9日，伊本·沙特去世。王儲沙特的加冕典禮順利。（馬達維 2002:76-109）。然而，1954年，在軍隊有一個孤立的兵變。1955年，共產主義風格的小冊子被發現流通于哈薩。甚至在利雅德王宮牆上發現反君主制的口號。1956年，國家石油公司工人舉行三天的罷工。罷工被無情地粉碎，200人被捕，3個活動分子被打死（霍頓和約翰 1981：183-88）。這些都是在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緊緊吸引住阿拉伯想像力的日子裡發生的。沙烏地阿拉伯也不例外。

1956年9月，在蘇伊士戰爭前夕，納賽爾訪問利雅德（馬達維200:116），數千人起來歡迎他。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國王沙特的石油首次勉強地被用作為一個武器。這是沙特國王的最後一個重大決定。到1958年3月，在美國的壓力下，權力轉給費薩爾王子（韓禮德 2002年b：55）。

費薩爾引入了一些社會改革。廢除了奴隸制。女孩的教育得到了加強。1965年引進了電視。然而，費薩爾有意防止武裝部隊變強（韓禮德 2002年b：56）。

沙特王朝由於納賽爾主義而黯然失色，加上國庫空虛而跛腳，一直處於阿拉伯世界的邊緣，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然而，阿拉伯-以色列六日戰爭，證明是一個里程碑，標誌著民族

主義者的衰微，預示著原教旨主義的崛起。

有兩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民族主義者所進行的有意義的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失敗。其次，一個前所未聞的石油美元的衝擊。1965年至1975年，沙特國內生產總值從104億裡亞爾上升到1645.3億裡亞爾（馬達維 2003:120）。

沙烏地阿拉伯賺的錢比它能消化的更多，這使得費薩爾大手大腳地增加政府的支出，刺激商業活動和讓商人受益。中產階級在該制度中看到了機會。石油美元並不只是在改造沙漠的社會和建築風貌，新興的億萬富翁還在加強與全球資本的新紐帶。

由於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石油美元滾滾而來，大約八萬四千‘高淨值’沙特人投資了驚人的8600億美元在美國公司裡（昂格爾 2004:28）。德克薩斯州的布希家族從沙特人的投資（昂格爾 2004:295-98）中發大財。石油讓沙特人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一個新角色。在1973年阿以戰爭期間，石油武器的使用，增強了沙特人作為阿拉伯事業捍衛者的形象。然而，它惹惱了華盛頓。基辛格1975年1月威脅，如果石油禁運，讓“工業化世界面臨一些實際的扼殺行為”，就要使用武力（霍頓和約翰 1981:373）。

這種美沙摩擦是暫時的。實際證明，它給了反思的機會。而且，1974年3月，沙特威脅要退出歐佩克，這在保持油價低廉方面起了關鍵作用（2002 馬達維：141），表明沙特忠於帝國主義。

1975年3月25日，費薩爾被殺。他的兄弟哈立德成為國王。當他登基時，經濟很好。到1975年，人均收入為6806美元（**原文\$6,806 million 有誤，似應為\$6,806！---譯注**）。第二發展規劃預計的開支是個令人驚歎的數字，為141億美元（**原文\$141,000，似應為\$141,000 million，即前面的 million 應該在這裡！---譯注**）（霍頓和約翰 1981:390-96）。在1975年至1982年哈立德統治時期，伊斯蘭外表和富有之間的矛盾開始明顯。兩個事件標誌著它。米沙爾（Mishaal），是一個王子，他同情人穆哈娜（Muhalla）私奔了。他們逃離沙烏地阿拉伯時被抓。兩個都被

斬首了。1979年11月20日大清真寺被由居海曼·賓·穆罕默德·尤台比（Juhaiman bin Muhammad Utaibi）領導的武裝人員劫持為人質。他內兄阿卜杜拉·卡塔尼用麥克風宣佈，他就是預期的救世主。這幕奪取了數百人生命的血腥劇，結束于居海曼匪幫投降或被殲滅的12月5日（霍頓和約翰 1981:511-26）。

從地區來看，沙特人作為美國的盟友，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他們大方地資助伊拉克對伊朗作戰。沙特財政援助高達257億美元（馬達維 2002:157）。

他們資助聖戰者在阿富汗同紅軍作戰。在20世紀80年代，法赫德接任死去的哈立德。然而，他卻沒有那麼幸運。油價下跌。緊縮時期到來。1985年，電力和天然氣價格分別提高了70%，這是1972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通沙特人抱怨漲價。此外，人口以0.36%的速度暴增讓國王感到壓力。企業人力沙烏地化政策（Saudisation）開始了。伊斯蘭教被遺忘了。非法移民工人被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在1985年至1986年，有30萬人被趕走（馬達維 2002:150-52）。

社會和經濟的分化開始出現。富有的精英圍繞皇室，部落貴族組成密切的圈子，這是一個商業上成功的受過教育沙特人階層。中產階級青年正在失業和沮喪。有些人回應奧薩馬（馬達維 2002:154）。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超過50000美軍趕到那裡，導致緊張的爭論。核心問題是：沙特人能否用非穆斯林的幫助去反對穆斯林。這樣的政府可以是伊斯蘭的嗎？麥加大學的博士薩法爾·夏瓦裡（Safar al-Hawali）的錄音講話和利雅德大學的薩爾曼·阿達（Salman al Awdah）的演講開始獲得大量聽眾。1990年11月6日，在利雅德有45名婦女違反駕駛禁令。木塔瓦稱她們為“共產妓女。”烏裡瑪指責認為，這一行為的原因是美國軍隊的出現帶來了西方文化。與本·拉登有關的團體，建議暨改革委員會（ARC），作為真正的反對派挑戰而出現。1996年，在利雅德和阿廓巴（Al-Khobar）塔樓

的美軍附近，有炸彈爆炸，殺死美國人。

2000年，一架沙特客機在飛往倫敦的途中被兩個沙特人劫持。他們的要求是學校醫院和福利（馬達維 2002:165-85）。在20世紀50年代消除了世俗反對派，沙特現在面臨他們縱容過並在繼續縱容的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狂熱分子。這些狂熱分子指出，沙特腐敗了，並考慮要把整個社會進一步的伊斯蘭化，作為解決一切弊病的辦法。然而，對該國的一個半官方描述是這樣的（亞馬尼 1997:20）：“現今的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之一。沒有貨幣管制，沒有社會主義教條。重點放在私營部門，其影響力受到鼓勵而日益增長。這也許是由於盛行於該王國的至高無上的伊斯蘭教教義造成的。伊斯蘭教規定，所有的財富都屬於上帝，而個人是一個代理，託管了該財富的一部分，然後由他或她使用它。”

沙特式自由市場是的最佳者在傳媒行業裡，借用斯熱貝尼（Sreberny）（2000：63）的說法，實在是“米老鼠，辣妹和可蘭經碰撞”。依照可資使用的頻道來說，隨著第一次海灣戰爭，產生了電視革命。斯熱貝尼說，海灣戰爭（1990）帶來的美國有線新聞網每日24小時報導，獲得了熱切的觀眾，給該區域的媒體行業帶來了變革的壓力。沙特的王室成員並不是先驅者，但卻是推出私人電視頻道的最早者之一。總部位於倫敦的中東廣播公司（MEBC，後為MBC），和總部位於羅馬的軌道電視公司（Orbit）是首批漫步中東電波的私人頻道。軌道電視（Orbit），有加密服務，需要一個解碼器，自從它顯示“教條之終結”以來，拉低了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阿拉伯語頻道的收視率（斯熱貝尼（Sreberny） 2000：63-71）。同樣，電視劇‘老闆’（Al Ra'is（*the Boss*））也被取消了。但黎巴嫩-衛視（LBC-Sat）播出了‘明星學院’，而沙特王子塔拉勒（Talal）擁有黎巴嫩-衛視（LBC-Sat）的股權（克萊蒂 2008年：189-99）。沙烏地阿拉伯是埃及電視電影最重要的消費者，因此，埃及電影毫不猶豫地觸及到沙特國家的敏感問題（哈菲茲 1994：8-9）。

“在沙特資助的節目中，‘飲料’或親吻可能不會

出現。一位埃及評論家稱之為“阿拉伯文化的貝都因化（Beduinization）”。媒體文化的另一方面是文化的聖戰化（Jihadification）。真主黨的烽火電視臺（Al-Manar TV）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聖戰組織和沙拉菲組織的主機既運行電視頻道也運行網站。反過來，聖戰的媒體化虛擬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美元加油推動的。

結論

很難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政治伊斯蘭定義。儘管有定義上的複雜性，但人們會同意，如果必要，伊斯蘭主義者會強行執行他們的計畫。他們在過去三十年的崛起，應歸功於一系列因素，不過很少超出本文的觀點範圍，我們只有在歷史背景下，才可以分析這種現象。

同樣，重要的是瞭解政治伊斯蘭的政治經濟學。顯而易見的是，當左翼或民族替代品可行時，伊斯蘭主義就被邊緣化。他們填補了左翼或民族主義者在中東留下的真空。在他們的崛起中，公開和隱蔽的帝國主義援助或干預，幫助了伊斯蘭主義者獲得了目前的狀況。此外，帝國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並不衝突。它只是原教旨主義的一部分，華盛頓及其盟友反對的是走‘歪’或失控。奧薩馬/哈馬斯/真主黨構成一個‘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案例。沙特同美國的關係仍然熱絡。因此，“文明衝突”的說法難以經得起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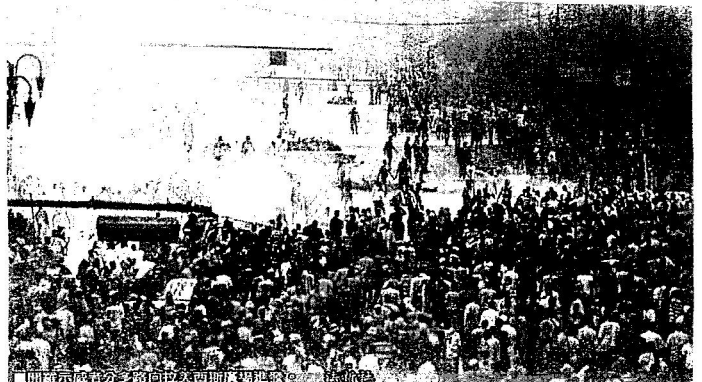
‘網上觀點’44期，2011年4月1日：
<http://www.viewpointonline.net/thre...>

（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前曾出現在‘視點’雜誌和其他地方）

參考書目

T.阿里（Ali, T）（2002），原教旨主義的衝突。
倫敦：Verso出版社

- T.阿里 (Ali, T) (2004), 布希在巴比倫, 倫敦: Verso出版社
- 本傑明·巴博 (Barber, Benjamin) (2000), 聖戰對麥當勞, 在F.J.萊希納 (F. J. Lechner) 和J.勃利 (J. Boli) 編輯的‘全球化解讀’, 牛津和瑪律登: 布萊克韋爾 (Blackwell) (21-26頁)
- H.巴塔圖 (Batatu, H) (2004), 舊社會階級和伊拉克的革命運動。 倫敦: 薩騎 (Saqi) 出版社
- N.喬姆斯基 (Chomsky, N) 和G. 阿查 (Achcar, G) (2007), 險惡的權力, 倫敦: Paradigm 出版社
- J.西門特 (Ciment, J) (1997), 阿爾及利亞, 原教旨主義的挑戰。 紐約: 文件事實 (Facts on File) 出版社
- K.哈菲茲 () (2001), 大眾傳媒, 政治和社會。 紐約: 漢普頓出版社
- F.韓禮德 (Halliday, F) (2002年a), 震撼世界的2小時。 倫敦: 薩騎 (Saqi) 出版社
- F.韓禮德 (Halliday, F) (2002年b), 無蘇丹的阿拉伯。 倫敦: 薩騎 (Saqi) 出版社
- D. 希洛 (Hiro, D) (2002), 沒有結束的戰爭。 倫敦: 勞特利奇 (Routledge) 出版社
- 霍頓, D (Holden, D) 和約翰, R (Johns, R) (1981) 沙特之家。 倫敦: 西季威克 & 傑克遜 (Sidgwick & Jackson) 出版社
- G. 克佩爾 (Kepel, G) (2002), 聖戰。 倫敦/紐約: I B Tauris出版社
- S.金策 (Kinzer, S) (2003), 所有的沙阿男人。 新澤西州: 威利 (Wiley) 出版社
- M. 克萊蒂 (Kraidy, M) (2008) 阿拉伯世界的現實電視與政治。 P. 查柯拉瓦提 (P.Chakravartty) 和Y.趙 (Y.Zhao) 編輯的‘全球傳播’: 邁向跨國政治經濟學。 勞曼和利特爾菲爾德出版社 (Rowman and Littlefields) (189-199頁)
- R.拉齊 (Lacy, R) (1984), 沙烏地王國 (Saudiernas Rike), Askild & Kanekull Forlag AB 出版社
- 馬達維, 拉希德 (Madawi, Al-Rasheed) (2002) 沙烏地阿拉伯史。 劍橋大學出版社
- A.米爾 (Mir, A) (2008), 聖戰旗飄揚。 拉合爾: 馬沙爾 (Mashal) 出版社
- L.納波萊奧尼 (Napoleoni, L) (2003), 現代聖戰。 倫敦: 冥王星出版社
- E.薩德 (Said, E) (1997) 覆蓋伊斯蘭教。 紐約: 葡萄酒 (Vintage) 出版社
- A.斯熱貝尼 (Sreberny, A) (2000), 電視, 性別和中東民主化。 詹姆斯·柯倫 (James Curran) 和明 (Myung) 編輯的‘去西化媒體研究’。 倫敦/紐約: Routledge出版社
- C.昂格爾 (Unger, C) (2004), 沙特的布希大廈之宮。 紐約: 斯克瑞布納 (Scribner) 出版社
- S.雅可布 (Yaqub, S) (2004), 遏制阿拉伯民族主義。 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社
- H.亞馬尼 (Yamani, H) (1997), 做一個沙特人。 倫敦: 劍鋒 (Janus) 出版社



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敘利亞

吉伯特·阿查卡，特理·康威

社會主義抵抗運動成員特理·康威9月份在倫敦對“人民的願望”一書的作者吉伯特·阿查卡的採訪。

TC（特理·康威）：在集中談論敘利亞之前，你能先總體評估一下阿拉伯起義的目前形勢嗎？

GA（吉伯特·阿查卡）：現在發生的事情，證實了我們當初的看法，也就是2010年12月在突尼斯開始的事情，並不是媒體所謂的‘春天’，是短暫的政治變革階段，在這個期間，某一個獨裁者被推翻，為一個溫和的議會民主制開闢道路，就此而已。起義被形容成一個“臉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是這些“顏色革命”中的另一個。我從一開始就堅信，這是對現實的一個歪曲。在2011年開始展開的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中，如果不是幾十年，也會發展很多很多年，如果考慮到它的地理範圍，就更是如此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到目前為止，我們見到的只是這個過程的開始階段。在一些國家，他們設法越過推翻現有政府的最初階段，這是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的情況 --- 這三個國家的政權被起義推翻。你可以看到，這些國家仍然動盪不穩定，這是革命時期的通常狀態。

那些急於相信阿拉伯起義已經結束或胎死腹中的人，專注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蘭勢力在選舉中的初步勝利。對這樣的災難預言者，我要強調的事實是，這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選舉是在專制政權被推翻後不久就舉行的，它只反映出這些國家有組織的力量的平衡。我認為，如果考慮革命進程的真正根源，那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掌權時期不會持續很長時間。

長期革命過程的根源在於該地區的社會現實，其現實特徵是停滯了幾十年的發展 --- 相當高的失業率，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幾十年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高。這些是暴亂的真正

原因，只要這些原因不解決，這一過程就會繼續下去。任何新政府，如果沒有解決這些根本問題，都將失敗。穆斯林兄弟的失敗，是可以預見的：在我的書“人民的願望”中，我認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失敗不可避免，當然，該書是埃及的莫爾西被推翻之前寫的。

關於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我也是這樣寫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強烈的抗議運動，政府的未來成了問題。

因此，像歷史上的任何革命過程一樣，整個地區的革命進程會有起伏，有前進和後退的時期 --- 有時會出現含糊不清的期間。目前，整個過程中最曖昧的事件，是埃及最近的情況，在那裡我們看到了6月30日反對莫爾西的浩大的群眾運動，這是一個非常先進的群眾運動的民主經驗，它要求撤銷當選總統，因為後者背叛了他對人民所做的承諾。但是，同時，這裡也有曖昧不清的地方，有軍事政變，還有廣泛的幻想，認為軍隊可以發揮進步的作用，存有這種幻想的包括大部分左派以及自由主義者。

TC（特理·康威）：那麼，在這個地區的整體框架下，你如何分析今天敘利亞的情況？

GA（吉伯特·阿查卡）：毫無疑問，2011年在敘利亞開始的，是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革命進程的一部分。它是同一現象的一部分，推動的基本原因是一樣的 --- 發展停滯，失業，特別是青年失業。敘利亞絕對沒有例外 --- 事實上，它是該地區的社會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案例之一。這是由於阿薩德父子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特別是十幾年前在他父親去世後上臺的那個兒子造成的。

敘利亞這個國家，在過去的十年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貧困，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貧困水準不斷上升，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國家貧困線以下，而失業率上升不止。在起義前夕，官方低

估的整體失業數字為15%，有超過三分之一的15-24歲之間的年輕人失業。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的背景下，一個非常腐敗的政權——在那裡，巴沙爾·阿薩德的表弟是全國首富，人們普遍認為，他控制一半以上的經濟。而這只是統治家族的一個成員——其所有成員都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這個家族的行為就像一個真正的黑手黨，統治了這個國家幾十年。

這個情況，以及敘利亞政權是該區域最為專制的政權，兩相結合，成了暴亂的深切根源。同阿薩德的敘利亞相比，穆巴拉克的埃及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一盞明燈！

所以毫不奇怪，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葉門等國之後，敘利亞也進入運動。對於那些像我這樣熟悉敘利亞政權特性的人，同樣毫不奇怪的是，通過群眾示威運動，不可能在敘利亞達到突尼斯和埃及的結果。

這個政權獨特之處是阿薩德的父親重新塑造組建了國家機器，特別是它的堅硬核心——軍隊——為自身創建了總統衛隊。軍隊，特別是其精銳部隊，以各種方式同政權本身捆綁在一起，最突出的捆綁方式是通過宗派主義。即使是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敘利亞的人，現在都知道是該國的政權基礎是一個少數民族——約為人口10%的阿拉維族。

由於軍隊是完全忠於政權的，所以任何認為僅僅通過群眾示威就能推翻政權的想法（在運動開始時有很多幻想）是虛假的幻想。在一定意義上，起義變成一場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除了內戰，沒有辦法推翻具有這種性質的政權。

在革命的歷史上，和平革命實際上是例外，而不是規律。大多數革命，如果它們不是像中國革命那樣隨著內戰開始，就會像法國，俄羅斯等那樣，革命非常迅速地導致內戰。

這表示，敘利亞政權並非唯一一個面臨敘利亞起義的反革命政權，不過它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第二個反革命政權由海灣君主國構成，這是整個地區反動派的主要堡壘。這些君主政權以他們可能採取的唯一方式對阿拉伯起義做出反應，尤其是在他們的教父美帝國主義的立場，是不作為一個反對起義的反革命力量進行干預的時候，更是如此。因此，他們試圖擴大選舉，恢復運動。對於海灣君主國，這意味著努力把社會民主革命轉換成有領導的運動，領導者是對他們的思想沒有威脅的力量。這就輪到了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它獲得的大力支持，來自卡塔爾酋長國以及各種薩里菲派（Salafists）——從“溫和派”到聖戰者——還有沙特王國或海灣國家裡各種瓦哈比-沙拉菲教派網路的支援。

這些君主制盡了最大努力來幫助促進敘利亞起義出現符合他們利益的結果，即把民主革命——這將是對他們的威脅——轉變成宗教戰爭。在這裡，他們和第一反革命——也就是政權之間有一個真實的結合。

像該地區其他地方一樣，開始時，在敘利亞只是年輕人通過社交媒體網路組織領導的示威，具有明確的社會民主和反宗派需求，是非常勇敢的運動。但從一開始，當局政權就聲稱，他們是由“基地”組織領導的，酷似卡達非在利比亞的表演，這兩種情況，都是要給西方一個資訊。他們對華盛頓說：“別搞錯了——我們是你的朋友，我們同共同的敵人戰鬥，我們是同‘基地’組織戰鬥，所以你不應該反對我們，而應支持我們”。敘利亞政權做的，還不止發動一場宣傳戰——把監獄內的聖戰者放出來，促進起義內部這個支派的發展。敘利亞反對派有一個很普遍的看法，認為，“基地”組織受到政府的滲透和操縱。實際上，這並非一個牽強的觀點——有一定程度的捲入參與，這是肯定的，只是沒有人知道它捲入的程度。

然後，還第三個反革命力量在反對敘利亞起義：就是美國——我還要加上以色列。美國是在完全意義上的反革命，而敘利亞反革命是

相對該地區其他國家而言的。華盛頓不希望任何國家被拆除。它希望它所謂的“有序過渡”，政權轉手，但要在國家結構基本連續的框架內。在華盛頓和倫敦，他們不斷談論‘伊拉克教訓’，並解釋說，他們肢解復興黨政府是個錯誤。“我們應該保留那個政府，只要剔除薩達姆·侯賽因就行了，如果我們那樣做了，就不會遇到這麼多麻煩。”

你可能會問：那麼利比亞怎麼樣？好吧，在卡達非倒臺之前，我寫了一個長文，指出北約在利比亞的干預，是企圖加大對起義的控制，以便在他們與卡達非的兒子賽義夫·伊斯蘭談判時，引導控制起義，因為賽義夫·伊斯蘭被西方視為統治家族裡的好人。他們希望他能使他的父親下臺，讓他掌權，這將非常適合華盛頓，倫敦，巴黎等國的意思。當然，但利比亞起義超越了這點，因為黎波里的起義導致了整個政權的崩潰。

對於敘利亞，華盛頓說得很清楚 --- 即使在最近的化學武器危機時 --- “我們不希望推翻政權，我們想要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奧巴馬所謂的一年前的“葉門的解決方案”。在葉門發生了什麼呢？起義後一年，總統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滿臉笑容地移交政權給副總統，自那時以來，留在該國家，仍然牽線控制許多木偶。這只是一個嘲弄，對該國真正的激進勢力是個挫敗。這也是為什麼在葉門事情遠未結束，只是在西方這裡，你聽不到關於它的新聞。運動在葉門仍在繼續，就像在巴林和該地區其它地方一樣。

美國希望給敘利亞的，正是這種解決方案。它不希望像它在利比亞那樣，進行軍事干預。最近的惱怒是因為華盛頓感到壓力，其‘信譽’危在旦夕後，因為奧巴馬設立了他關於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但是，即使他們在考慮打擊行動時，他們也解釋說，他們的打擊將是非常有限的，不會影響各個勢力的平衡。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個長文報告說，以色列的希望完全一樣：不會改變敘利亞內部力量平衡的有限打擊。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西方列強不會給任何人以大力支持 --- 尤其是軍事支持，因為他們對相互對立的任何勢力都沒有信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登蒲賽寫的：‘敘利亞今天不是要在雙方之間作選擇，而是在許多派別裡選擇一個。我的看法是，我們選擇一派，必須做好準備，當力量平衡有利於他們時，他們必須促進他們和我們的利益。現在，他們不是這樣的。’

TC（特理·康威）：談到反革命勢力時，你沒有提到俄羅斯。在這種情況下，把它形容為第四極勢力是準確的嗎？

GA（吉伯特·阿查卡）：我沒有提到他們，因為他們顯然是阿薩德政權的關鍵支撐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普京的俄羅斯是第一極力量，而不是第四極。

TC（特理·康威）：他們供應武器給阿薩德，這樣的參與不僅有重要的物質影響，還有重要的思想影響，迷惑一些期望支持起義的人，不是這樣的嗎？

GA（吉伯特·阿查卡）：說到底，敘利亞起義的支持者很少。即使在那些應該對革命者友好的人中間，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敵意，那些人受到敘利亞政權和莫斯科宣傳的影響，敘利亞政權把整個起義描繪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聖戰。而且有些人認為俄羅斯仍然是蘇聯，即使在其政治和社會方面，美國都比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更進步：俄羅斯有的是一個專制政府，野蠻資本主義，實行13%均一所得稅(flat income tax)，強盜大亨，等等。有大量的根據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非反帝的國家。

至於那些相信敘利亞政權是“反帝”的人，他們恰恰忽略了這一政權的歷史及其純粹機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在1976年，阿薩德的敘利亞干預鎮壓了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左派的抵抗，防止他們戰勝黎巴嫩極右派。在1983-1985年期間，發動或支持對黎巴嫩巴勒斯坦難民營戰爭。1991年，在美國的指揮下，敘利亞政權參與了

伊拉克的戰爭，它是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的一部分，從1990年代到2004年，敘利亞政權是黎巴嫩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哈裡裡政府的保護者；這些年來，在以色列的所有邊界中，它同敘利亞的邊境最安靜和最安全的。所以，把敘利亞政權描述為“反帝”的，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一個非常機會主義的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它會不猶豫地換邊站和改變結盟關係。

TC（特理·康威）：你能說一說關於敘利亞反對派勢力內部的平衡關係嗎？

GA（吉伯特·阿查卡）：我一些可信的朋友，訪問過反對派控制的所有領域，根據這些朋友的報告，兩個“基地”組織的團體只代表不超過10%的戰士，而薩里菲派（Salafists）大概占30%左右。這讓大部分的力量，活動在敘利亞自由軍（FSA）的旗幟下，雖然其中一部分也是有伊斯蘭傾向的。造成這個結果的事實是，為敘利亞反政府勢力提供資金的主要來源基於海灣地區的伊斯蘭，從君主政權到各種宗教網路。這裡談論的是武裝組織——至於民眾的抵抗，他們絕大多數人對任何形式的伊斯蘭國家都不感興趣，只是有民主社會的願望，起義開始時，這就是其目標。

TC（特理·康威）：你能談談抵抗運動是如何組織的，其主要訴求是什麼嗎？

GA（吉伯特·阿查卡）：阻力非常龐雜。在起義的頭幾個月，原來的領導人，其實在該地區到處都有，大多是通過互聯網聯絡起來的年輕人。他們通過地方協調委員會（LCCs）組織起來，並闡述了一個進步的綱領：民主，反教派和世俗化。總體上是一套清晰進步的要求，如果你是左派的話，你就不能不支持它。

第二階段是組成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在國外。這是同利比亞主要不同的地方，在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在該國內部成立，並被大部分利比亞起義力量承認為合法的，但即使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在那裡，也有一些問題。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在國外形成，對於起義本身沒有真正的領導作用，只是有聯繫而已。它是在土耳其和卡塔爾的干涉下創立的。酋長國資助SNC，特別是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後者仍然是流亡中的官方反對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在這同一個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裡，你可以找到屬於敘利亞左派的人，如從敘利亞共產黨分裂出去的人民民主黨的人。而地方協調委員會（LCCs）自己在SNC裡有代表，其反對派的領導作用得到確認。這裡從左翼的角度，又可以同意SNC的綱領——是民主的，反教派和廣泛世俗化的。當然，我們可以說，其社會性是不足夠的，但是這並不是一個激進的左派領導，是可以肯定的。

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現在已經被敘利亞全國聯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取代。基本上它仍然是一個聯合的力量，其範圍類似於參與埃及和突尼斯起義的力量。人們不應該忘記，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薩里菲派（Salafists），同自由派和左派一同起義。然後隨著鬥爭的軍事化，起義從2011年秋季開始突變成一場內戰，我們已經看到強硬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出現了，包括兩個“基地”組織旗幟下的不同組織，還有沙拉菲組織。這兩個“基地”組織的分支中，一個組織的戰士主要來自敘利亞境外，一個則主要是敘利亞人，它們之間的關係緊張。在敘利亞自由軍（FSA），正式反對派武裝，以及“基地”組織組之間的衝突在增加。

令人欣慰的是，強硬的聖戰者正遭到主流反對派越來越多的排斥，但要知道，後者不可以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他們同政權力量的極不相稱，已經夠麻煩了。不幸的是，武裝鬥爭中沒有左派的存在。激進左派在敘利亞是很邊緣化的。而更廣泛的左派沒有試過在敘利亞自由軍（FSA）內單獨成立組織。

TC（特理·康威）：反對派如何回應政府把他們描繪成宗教派別的企圖？

GA（吉伯特·阿查卡）：他們回應的方式有多種——通過聲明和文告，示威中的橫幅標語，在他們的星期五運動中使用阿拉維派或基督教的名字，或者歷史上的德魯茲形象，等等。

事實是，沒有可能比較，是政權及其shabbihas——它的民兵，犯下了最大眾的宗教屠殺——進行的宗教殺戮，還是反政府勢力進行的宗教殺戮。後者大多是聖戰者犯下的，我認為這些人是另一種反革命力量。當然也有政治意識不良者對政權的殘暴性所作的野蠻宗教反應。是啊，你能指望什麼呢？這不是面臨這個政權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組成的軍隊，它是人民起義，並沒有能教育人民的政治領導。因此，面對政權的大規模宗派之爭，部分反對派做出宗派行動的反應。在黎巴嫩內戰中，有相同的宗派殺戮，雙方更加勢均力敵——如果有一個標準，那麼每個人都應該同樣拒絕黎巴嫩內戰的雙方。

當然，我們應該譴責一切宗派行為的發生——他們實際受到反對派和敘利亞自由軍（FSA）的譴責。但我們不應該落入陷阱，忽略政府的大規模宗教屠殺和反政府勢力犯下的宗教殺戮規模之間的差異。

TC（特理·康威）：同庫爾德人的鬥爭是什麼關係？

GA（吉伯特·阿查卡）：在開始時，政府和反對派兩方都拉攏庫爾德人。政府這樣做，因為它不希望庫爾德人參加起義，起義者這樣做，是因為想要得到他們的支持。敘利亞全國聯盟（SNC）在其綱領中，有對少數民族權利的承認——不到承認其自決權利的程度——但那甚至不是敘利亞庫爾德人一致的要求，當然我會強烈捍衛這一權利。

敘利亞的庫爾德運動抓住了機會，控制了庫爾德地區。敘利亞庫爾德人的主導力量同庫爾德工人黨（PKK）有聯繫，庫爾德工人黨（PKK）在土耳其控制的庫爾德人區域占主導地位，多

年來建立了與敘利亞政權的聯繫。但庫爾德人沒有直接參與內戰，他們正忙於控制自己的區域，建立事實上的自主權，就如在伊拉克所發生的情況。我很難想像他們未來會失去這個——所以這是他們的成就。今後，他們都會同內戰保持一段距離，避免與聖戰者發生衝突。

TC（特理·康威）：你如何形容敘利亞自由軍（FSA）控制區的情況呢？那裡的人道主義情況顯然是一場災難，但你如何從政治上看它呢？

GA（吉伯特·阿查卡）：對，那裡的人道主義情況絕對是駭人聽聞的。在許多反對派接管的地方，擺脫了復興黨政府，我們已經看到了地方民主委員會的建立，做了某種形式的選舉。這肯定是積極的，當一個地方政權消失而試圖組織什麼東西來取代它的時候，這也是正常的。人們不應該把這樣的委員會描述為“蘇維埃”或類似的東西——這是完全膚淺的。這些組織可以代表未來一種有意義的潛勢，但目前，它們只是自我組織的措施，目的是取代由地方政府機構的崩潰而產生的權力真空。

TC（特理·康威）：關於敘利亞左派應該如何做，你能總結一下嗎？

GA（吉伯特·阿查卡）：出來聲援敘利亞的起義，不要害怕，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相信人民自決的權利，如果我們相信人民有自由選舉他們想要的人的權利，那麼即使起義是由伊斯蘭勢力領導的，這也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就像加沙和哈馬斯，或伊拉克抵抗運動的例子，我想提醒的人們，敘利亞的一切遠比伊斯蘭的控制走得更遠。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認為，表達對敘利亞革命的支持，建立與敘利亞反對派中進步力量的聯繫，對抗政府以及莫斯科的宣傳，譴責華盛頓和西方同謀在敘利亞犯下危害人類罪，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主義抵抗運動

美國對阿根廷的裁決偏袒“禿鷲基金”： 違法 and 非法債務故事的新一頁

紐約上訴法院的最近裁決宣佈，阿根廷必須全數支付其拒不退步的債權人，這表明，直到阿根廷拒付其違法 and 非法債務以前，它將繼續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騷擾。

案件涉及的禿鷲基金，在2001年以面值20%的價格，購買阿根廷債券，然後拒絕履行2005年達成的、2010年重又提出的交換報價協議，卻寧願在紐約法院起訴阿根廷。政府保證債券合約中提到的紐約司法管轄範圍給他們這樣做的權力，包括放棄任何主權豁免的索賠或最有利的債權人地位。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基什內爾期間，這是阿根廷主權債務發放的一個標準條件。

受限於自身的行動，政府對裁決的反應，僅限於確認自己的還債承諾，並試圖討好美國的司法體系和國際金融部門。它急忙向議會提出一個法案，要同7%的強硬債券持有人重新談判，談判的條件同2005年和2010年的相同，把導致這些報價的重組債券的還債辦公室遷移到阿根廷，因此，如果根據紐約的裁決，阿根廷資產被查封或扣押的話，這樣才能保證還債的可能性。

公共部門借款以償還現有債務的能力已經達到了極限（阿根廷中央銀行BCRA，全國社會保障局ANSES，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等），政府可能會覺得有必要回歸到國際資本市場，繼續為其債務再融資。這給世界強權提供了手段，迫使我國100%地償付強硬投資者和巴黎俱樂部債務。

就像紐約強硬債權人的情況一樣，債權人顯然會試圖最大化其收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府提議的，以相同於2005/10年的條件作交換的辦法，對於債權人不是一個虛幻縹緲的交易。雖然最初的協議減少了43.3%的量，差異的產生，是由於在幾年內，還債支付依賴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按這種方式本身，總數估計為400億美元中的150億美元，已經償還。對此，還必須加上利率，貨幣調整債券和回購協議。

這個巨大的流出，部分地解釋了該國正在經歷的財政不平衡及其所採取的調整措施，但在官方削減債務的立場之外，公共債務仍然是我們經濟中的最重要元素。總統最近承認，自2003年以來，已償付近1740億美元。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數字顯示，如果不用償還債務，就沒有必要對外借款或需要外國投資，那些資金將可以保證82%的物價指數化退休金（indexed retirement benefits）。資源是有的，只是必須重新分配它們。

但總統沒有說的是，債務總額從2002年的1442.12億美元，增加至2090億美元，而在同一時間還償還了近1740億美元債務。這些數字表明，這個債務是一個巨大的騙局，一個徵用阿根廷工作者的生產資源的系統。它的起源是違法的，是非法的，它已經償還過幾次了。

第一項緊急措施，是應該立即暫停債務支付，獲得必需的時間進行債務審核，這將突顯債務是違法 and 非法的。為此，可以模仿厄瓜多爾的例子，2007年在厄瓜多爾開始了象徵性的處理過程，當時總統拉斐爾·科雷亞依據法令N° 472創立了該國公共債務的審計，由一個特別委員會（CAIC）執行，確定了外債的違法，非法和腐敗生出的部分。在我們的國家，我們有阿勒簡杜·奧爾莫斯在“奧爾莫斯”案件中的寶貴貢獻，這個案例證明了1976年至1982年期間外債的非法性，確定了獨裁政權簽約償還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非法和欺詐債務的責任。通過定期重組，這筆債務一直持續到今天，成了巴黎俱樂部索賠的組成部分。

20世紀70年代以來，債務也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偏好的統治工具，用以強推其自由主義方案。在過去的35年，拒付債務是一個法律程式，它允許經濟轉型，有利於國際資本主義強推的生產攫取的經濟模式。

出於這些原因，我們呼籲審計公共債務，離開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建設一個新的區域金融架構（南方銀行Bank of the South，蘇克雷SUCRE，ALBA銀行ALBA Bank），這是構建反資本主義項目以便滿足人民需求的必要步驟。

沒有其他的辦法。就像亞歷杭德羅·奧爾莫斯說的：“要麼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反對那些債務，要麼我們反對人民的利益而服務於債務。”

CADTM

翻譯：邁克·科洛裡可夫斯基和查理斯·拉·瓦

銀行暴政：從威尼斯共和國到馬里奧·德拉基和高盛 埃里克·杜桑

從12世紀到14世紀初，出現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聖殿騎士，成了強大的銀行家們，參與了金融十字軍。在14世紀初，他們是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的主要債權人。菲力浦四世面對扼制其資源的債務負擔，他把聖殿騎士團妖魔化，指責他們的許多罪行，從而消除他的債權人和債務 [1]。

他們的團隊被取締，頭領被處死，資產被查封。他們的軍隊（15000人，其中有1500名騎士），他們遺產及其借給統治者的錢未能讓他們免於政府規定的影響，該規定要消除其主要的債權人。

在同一時期（11-14世紀），威尼斯銀行家們也資助十字軍東征，把錢借給了強大的歐洲，但是他們操縱得比聖殿騎士團更靈巧。在威尼斯，他們通過資助威尼斯共和國而控制了政府。他們資助包括賽普勒斯，優卑亞島（內格羅蓬特）和克里特島在內的威尼斯城邦轉型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他們運用聰明的策略，獲得他們的財富和債務的持久償還：他們決定驅使威尼斯國家向他們所擁有的銀行舉債。當他們成了銀行的所有者和國家統治者時，是他們設置了貸款合同的條款。

當菲力浦四世有興趣在肉體上擺脫他的債權人而讓自己免于債務負擔時，威尼斯政府以現金償還銀行家的債務。後者提出了建立公共債務的議題，讓債務可能在銀行之間流通。這是朝著建立金融市場的一步[2]。這種類型的貸款，是我們在21世紀所知道的主要形式的國家債務的先導。

菲力浦四世粉碎聖殿騎士團後七個世紀的今天，歐洲的銀行家們，就像他們的威尼斯或熱那亞的先輩那樣，對於政府，顯然沒有任何的擔心。

民族國家和現代歐洲聯盟的原型國家可能比13至16世紀的威尼斯 - 或吉諾維斯 - 共和國更複雜精細，但對於統治階級的權力行使來

說，他們只不過是單純的機關組織而已，在1%控制99%的情況下，前高盛歐洲區的執行董事德拉吉負責歐洲央行。私人銀行家們在政府和行政部門的關鍵崗位上安置他們代表或盟友。歐盟委員會成員都非常關注維護私營金融利益，銀行對歐洲議會議員，監管機構和法官的遊說確實是非常有效的。

少數資本主義大銀行近年來佔據了舞臺中心，這一點並不能掩飾主要的工商業私人公司，利用和濫用他們與政府機構的緊密聯繫，其巧妙的程度不下於銀行家。國家，政府，銀行，工商企業，以及主要私營公司傳播集團之間利益交叉，錯綜複雜，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之一，現在和過去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只要資本主義成為生產的制勝模式和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主要私人團體及其盟友的代表就會立刻行使權力。

回望歷史，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推出的新政和第2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似乎是一個例外，當時統治階級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限制，對工人階級做了真正的讓步。大資本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對政府控制。70年代末開始，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他們丟棄了謹慎做法。

20世紀80年代把完全不羈的統治階級置於聚光燈下，肆無忌憚地頌揚利欲，鼓吹對人民和自然進行全力以赴的剝削。臭名昭著的柴契爾夫人說，“沒有其他選擇”，這個標記通過對權利和社會成果的暴力攻擊，至今仍然加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層面上。德拉吉，默克爾，貝盧斯科尼（義大利大資本家）和何塞·曼努埃爾·巴羅佐已經成為延續柴契爾計畫的象徵人物。社會主義政府的積極同道（從施羅德到奧朗德，經過布雷爾，布朗，帕潘德里歐，薩派特羅，蘇格拉底，萊塔，狄如婆和其他幾個人），已經表明他們服從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就像大西洋另一邊的奧巴馬一樣。正如

美國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所說的：“這是一場階級戰爭，而我的階級是贏家”。

因為公共債務系統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運作，所以它是永久性的機制，把人民生產的財富轉移給資產階級。2007-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強化了這一機制，因為各大銀行的虧損和債務轉化成了公共債務。在非常大的規模上，政府把銀行的損失社會化，所以銀行可以繼續賺錢，可以把錢重新分配給他們的資本主義業主。

政府領導是大銀行的直接盟友，使用他們的權力和公款為後者服務。在各大銀行和政府之間存在恒定的旋轉門。財政部長和經濟或總理直接從各大銀行來，或者離職後去到他們那裡，這個數目自2008年以來不斷上升。

要把經濟留在私營部門手中，銀行界太重要了。銀行必須在社會化（這意味著徵用它們），並置於公民控制（銀行職員，客戶，協會和地方公共利益有關方面的代表）下，因為它必須服從公共服務的指導[3]，其活動產生的收入必須用於公共利益。

救助銀行的公共債務合同，肯定是不合法的，必須放棄。必須用公民審計確定其它不正當或非法的債務，在群眾運動中發揮作用，以便讓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可以初具規模。

銀行的社會化或非法債務的取消必須是一個更廣泛計畫的一部分[4]。

就像威尼斯共和國的情況，如今在歐洲聯盟和這個星球上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裡，政府悄悄地運作於主要的私人銀行，乖乖地償還公共債務。拒還非法債務，銀行社會化和其他重要措施，將是人民自己作為歷史主角的運動的結果。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忠實於被壓迫者的政府，就像默克爾，奧巴馬和奧朗德的政府是大私營企業和政府那樣。這樣的一個人民政府必須進入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型私人產業，發展尊重自然限制的共同利益。這個政府還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根本決裂，摒棄一切形式的壓迫。一個真實的革命是必要的。

瑪麗·拉伽塔翻譯

注釋

[1]見大衛·格拉貝（David Graeber），債務，第一個5000年，Melvillehouse Brooklyn出版社，紐約，2011年，453頁；湯瑪斯·莫雷爾（Thomas Morel），弗朗索瓦·魯芬（François Ruffin），銀行萬歲！（Vive la Banqueroute!），巴黎，Fakir版，2013年。

[2]費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物質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經濟與資本（économie et capitalisme），XVE-XVIIIe系列，巴黎，阿爾芒科林，1979；大衛·格拉貝（David Graeber），債務，第一個5000年，埃德。Melvillehouse Brooklyn出版社，紐約，2011年，453頁。

[3]銀行業必須完全公有化，除了一個小規模的合作行業，它可以共存和協作。

[4]見達明·米勒（Damien Millet）和埃裡克·杜桑（Eric Toussaint），<http://cadtm.org/Europe-What-emerge...> 2012年 7月 1日的發佈，湯瑪斯·庫特羅特（Thomas Coutrot），派翠克·薩林（Patrick Saurin）和埃裡克·杜桑（Éric Toussaint），<http://cadtm.org/Cancelling-debt-or...,published> 2nd November 2013; <http://cadtm.org/What-to-do-about-t...>



探索新社會主義的切·格瓦拉 邁克爾·洛伊

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始人，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192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然，我們不希望拉丁美洲社會主義是一個模仿或複製。它必須是一個英勇無畏的創造。我們必須以自己的現實，用自己的語言，創造發展出印地安-美洲的社會主義。這是新一代人應擔當的任務。”[1] 他的警告未能引起注意。在同一年，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墮入斯大林模式的陰影，竭力仿效蘇聯的官僚意識形態及其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近半個世紀。

我們不知道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是否讀過馬里亞特吉的文章。可能已經讀過，因為他的同伴希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的幾年，曾借給他馬里亞特吉的著作。無論是哪種情況，他的政治思想和實踐，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可以說已經有意要避開東歐對蘇聯模式的硬性模仿而導致的僵局。

格瓦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是一個嘗試，是要“勇敢的創造”某種新東西，探索---斷斷續續地摸索--- 出一個獨特的社會主義模式，在許多方面，它同“現實存在的”官僚荒誕體系是絕然反對的。

從1959年到1967年，格瓦拉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越來越疏遠了自己關於蘇聯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初幻想，離開了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在1965年寫給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嚴厲地批評了“思想尾巴主義”(ideological tailism)，在古巴，這個思想尾巴主義見諸於馬克思主義手冊這一類蘇聯出版物。這些手冊，這些“蘇聯磚塊”，用他的話來說，“有不讓你思索的缺點：黨已經為你做好了，你必須去消化它。”[2]

更明確地，特別是在他1963年以後的作品中，他拒絕“模仿和複製”，他尋找一個替代模式，試圖制定另外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更徹底，更平等，更和睦，而且更符合共產主義道德。

未竟之旅

1967年10月格瓦拉的死亡，中斷了獨立的政治成熟和智慧的發展過程。他的工作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是一個包辦一切答案的思想系統。對於許多問題，如制訂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等等，他的想法仍然是不完整的。

[3]

超越具體的經濟問題，尋求一條新的道路，這背後的動力，是這樣的信念，即：競爭是相互殘殺的戰爭，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特點，在那個世界中，“人人相食”，如果社會主義不能實實在在地提供一個文明，一套社會倫理，一個同狹隘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不受約束的利己主義和競爭完全對立的社會模型，那麼社會主義就是毫無意義的，因而無法得勝的。

格瓦拉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離不開一定的道德價值，這同斯大林、赫魯雪夫和他們繼任者的“經濟主義”的觀念正好相反，那些人考慮的是“生產力的發展”。1963年7月，在記者讓·丹尼爾的一個著名採訪中，格瓦拉已經對“現實社會主義”發出了隱含的批判：“對於沒有共產主義道德的經濟社會主義，我不感興趣。我們在與貧困作鬥爭，但同時有異端出現...。如果共產主義脫離了思想，那它可能只是一個分配的方法，但它不再是一個革命性的道德。”[4]

如果社會主義聲稱反對資本主義，卻站在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資本主義立場上，用資本主義的武器——商品形式、競爭、自我中心

的個人主義——同它鬥爭，那麼這是註定要失敗的。不能說，格瓦拉預計到了蘇聯的解體，但在某種程度上，他有直覺感到，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容忍差異，沒有體現出新的價值觀，只是試圖模仿它的對手，沒有雄心而只求“趕上和超越”帝國主義大都市的生產，這樣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

對於格瓦拉，社會主義代表了一個新社會的歷史規劃，它的基礎價值觀念是平等，團結，集體主義，革命利他主義，自由討論和群眾參與。他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評，就像他作為一個領導者的實踐，就像他對古巴經驗的思考，其靈感來自這個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給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概念。[5]

有三件事情具體表達了格瓦拉的這一願望及其對新道路的探索：關於經濟管理方法的討論，差異的自由表達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民主理念。第一個顯然佔據了格瓦拉思想的中心位置，而另外兩個，是密切相關的，尚未有多大的發展，還有一些漏洞和矛盾。但是，它們不斷地出現在他的關心和他的政治實踐中。

新人類

埃內斯托·格瓦拉在他著名的1965年2月的“阿爾及爾講話”中，呼籲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杜絕其同西方的剝削性國家的合作陰謀”，因為他們對從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民族所施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換關係。按格瓦拉的看法，社會主義，“不僅是在建設中的或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內，而且對全世界所有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如果在意識上沒有一個對人性的新兄弟般態度的變化，就不會存在。”[6]

格瓦拉在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中，分析了應用于東歐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型，他拒絕了聲稱“用資本主義自己的偶像征服資本主義”的概念。“認為社會主義能通過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陰暗工具（作為經濟細胞的商品，盈利，作為經濟杠杆的個人物質利益，

等等）的幫助而實現，那是白日做夢，會導入一個死胡同...。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有必要在建設新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建立新的人類。”[7]

從東歐國家引進的模型有一個重大危險，就是社會不平等的增加和技術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在這個報酬分配系統中，“賺取更多的總是董事們。只要看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近提出的方案，看看分配給董事管理的比重，或更多的董事管理的薪酬。”[8]

基本上，辯論點的一方是“經濟主義”的觀點，認為經濟領域是獨立的系統，有自己的規律，如價值律或市場規律；辯論點的另一方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概念，認為有關生產重點，價格等的經濟決定是由社會，道德和政治標準控制的。

格瓦拉的經濟提案——反對市場力量的計劃，預算財務制度，集體或“道德”的激勵機制——試圖找到符合這些標準的社會主義建設典範，因此，與蘇聯模式不同。應該說，對於斯大林官僚系統的性質，格瓦拉並沒有成功地得出一個清晰的概念。在我看來，在追溯蘇聯經驗的問題和局限性時，他錯誤地把它們歸於新經濟政策（NEP），而不是斯大林主義的暴政。[9]

討論的自由

在1963年至1964年的經濟討論中，一個重要的值得一提的政治面是，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民眾不同意見的表達是正常的，或在革命中某種民主多元化是合法的。

這個問題隱含在經濟辯論中。格瓦拉從未明晰或系統地述說過它，他肯定也沒有把它與經濟計劃的民主問題聯繫起來。但在20世紀60年代，對於革命陣營內部的自由討論，他曾多次表態支持，傾向於尊重多數人的意見。

在他的行為上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例子，這個例子同古巴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關，他完全不同意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分析（他曾在多個

場合嚴厲地批評他們）。1961年，格瓦拉在同北美左翼知識份子莫里斯·澤特林的討論中，譴責古巴警方破壞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印刷板的行為，說它是個“錯誤”，“不應該這樣做。”

幾年後不久，於1965年即將離開古巴前，他設法從監獄中釋放古巴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人羅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亞（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他用兄弟般的問候語送別他：“阿科斯塔，人們不能用拳打腳踢殺死思想。”[10]

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一些蘇聯人對“托洛茨基主義”指控的回答，見於他在1964年給工業部同志們的報告：

“在這方面，我認為，或者我們有能力用論據摧毀相反的意見，或者我們應該讓他們來表達出來...。用強力摧毀意見是不可能的，這將阻止智力的任何自由發展。在托洛茨基的思想裡有很多是有價值的，雖然在我看來，他的基本觀念是錯誤的，他後來的行動也錯了。”[11]

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格瓦拉對表達自由的最明確的捍衛，對斯大林主義獨裁最直接的批評表現在藝術領域。在他著名的論文“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Socialism and Man in Cuba）（1965）中，他譴責了蘇聯式的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唯一藝術形式的強行做法：“是一種供官員們瞭解的‘藝術’。”他強調，通過這種方法，“真正的藝術探尋完蛋了”，一個“緊箍咒”加在“一個誕生中的人類的藝術表現方式上...。”[12]

社會主義民主

雖然格瓦拉從來沒有設法擬定民主在社會主義過渡期的作用的最後理論——或許這是他工作中的主要缺失——但他拒絕了在20世紀對社會主義造成嚴重傷害的專制和獨裁觀念。1966年有關蘇聯的政治經濟手冊的一些重要注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解包含了這樣的直率說法：“斯大林的重大歷史罪行是貶低共產主義教育，設立了不受約束的權威崇拜。”[13]

主要的局限在於他關於民主與計劃兩者關係的思想，存在不足。他捍衛計劃經濟，反對市場分類的論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新自由主義“市場宗教”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它更加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但他們避開了關鍵性的政治問題：誰做計劃？誰決定經濟計劃的主要選項？誰決定生產和消費的輕重緩急次序？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如果沒有（1）政治多元化，（2）輕重緩急次序的自由討論，以及（3）人們在各種經濟主張和供討論的論壇之間做選擇的自由——那麼，計劃不可避免地會化為一個滿足“專制集團過度需求”的官僚主義和威權制度（前蘇聯的歷史就是充分的證明）。

換句話說，經濟社會主義過渡期的問題，同政治制度的性質是分不開的。還有，古巴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表明，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缺乏，有負面的影響，雖然古巴已經設法避免了最嚴重的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畸變，而這些畸變在其他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卻發生了。

這個爭論，同革命制度的問題有關。格瓦拉拒絕資產階級的民主，儘管他極力反對官僚主義和主張平等主義，但是，他遠未形成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民主願景。

在“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一文中，他承認，革命的國家可能會犯錯誤，從而在群眾中激起了消極的反應，迫使國家作出修正（他所引用的例子是：1961年至1962年，阿尼巴爾·埃斯卡蘭特領導下的黨的宗派政策）。但是，他指出，“很明顯，這種機制不足以保證一連串明智的措施。需要與人民群眾有更有效的連接...。”

在文章的開始，他似乎很滿意領導和群眾之間有一個模糊的“辯證統一”。但幾頁後，他

承認，行使有效的民主控制這個問題遠未解決：“這革命制度尚未實現。我們正在尋找一些新的東西...”[14]

未發表的著作

我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格瓦拉已經遠離了蘇聯模式，他拒絕了“模仿和複製”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但是，他一部分優秀的後期著作，特別是他對1963年版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手冊的批評意見，仍然未公佈。

只是到了2006年，這些批評才在古巴出版。[15] 這些文章寫於1965年至1966年，當時他呆在坦桑尼亞和布拉格，正是他在剛果的任務失敗後，臨行玻利維亞以前。四十年來，這個檔案一直是“隱而不現的”，只不過在蘇聯完結後，允許一些古巴研究人員參考，並作了一些筆記。現在，在這些文章寫成約40年後才決定在古巴發表，同期還有其他未知檔案。

為什麼格瓦拉的筆記不能早些發表呢？或許，人們可以理解的是，蘇聯垮臺前，可能有一些（壞的）外交上的原因，要把它們隱藏起來。但1991年後，這些筆記代表什麼樣的“危險”呢？是誰決定把它們鎖在抽屜裡的呢？是誰終於開了“綠燈”讓這些筆記出版呢？

無論如何，這個材料終於提供給了有興趣的讀者，這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它記錄了他知識份子的獨立性，記錄了他遠離蘇聯模式的“現實社會主義”，記錄了他探索一個徹底替代方案的努力。在前面的討論中，格瓦拉堅決認為，計劃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是關鍵因素，因為它把“人類從他的經濟狀態中解放出來。”但應該由誰來做計劃呢？

在1963年至1964年的辯論中，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正是在這裡，在這些寫於1965年到1966年的重要筆記裡，人們發現了新的見解。有一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表明，格瓦拉最後的政治思想接近社會主義民主的理念，即民主的計劃過程，由人民自己，由工人，

“群眾”--- 用他的術語說--- 制定主要的經濟決策：

“照顧人民利益，由群眾作經濟決策，同這個經濟計劃觀念相矛盾的是，我們有了一個安慰劑，即決定人們的共同命運的只有經濟因素。這是一種機械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群眾必須能夠主導自己的命運，決定積累和消費的生產比例。經濟技術必須運作在這樣的認識範圍內，而群眾的覺悟必須確保它能得以執行。”[16]

可以認為，這些筆記代表了格瓦拉尋求替代蘇聯（斯大林主義）模式之努力的一個重要階段。1967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玻利維亞幫兇的刺殺子彈，打斷了這項工作，使一個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和一個新的共產主義民主的“勇敢的創造”夭折了。

文章2009首次出版於“中流砥柱”（Against the Current）142期，2009年9-10月

▶ 生於巴西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邁克爾·洛伊，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和第四國際的成員。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國際學院（IIR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的研究員，前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的研究主任。他寫了許多書，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放神學》、《祖國或地球母親？》、《眾神之戰：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他是《國際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作者之一（另一作者是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他也是2007年第一屆巴黎國際生態社會主義會議的組織者之一。

註釋：

[1]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周年紀念和平衡”，思想與政治，Amauta 叢書，1971年：249頁。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1894-1930

年)是拉丁美洲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聞名於世是因為其1928年的著作，關於秘魯現實的七篇解說文(奧斯丁：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1971年)。

[2] 格瓦拉給古巴朋友的信(1965年)。這封信是尚未發表的格瓦拉文件之一。卡洛斯·塔夫拉達把它引用在他的文章“切·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裡，另一類南方，III，第2期(1996)：168頁。也見於同一作者的‘切·格瓦拉：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經濟與政治’(探路出版社，1992年)和‘古巴，過渡?’(L'Harmattan出版社，2001年)。

[3] 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正確地指出，“...在格瓦拉不完全的思想中，甚至有一些積極的方面。偉大的思想家在思索，指出一些問題和一些方法，提出了一些可能性，並要求他的同志們思索，學習，並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然而人們一旦真的要運用他的思想，把它獨斷化，把它變成一個投機的堡壘或口號的插座，是不可能的。”“格瓦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彭薩·埃爾車(哈瓦那：美洲研究中心，編輯何塞·馬蒂，第二卷，1989年)：30頁。也可以參見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車，切·格瓦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哈瓦那：美洲之家獎，1989年)。

[4] 快報 7月25日，1963年，9頁。

[5] 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是猶太裔德國哲學家，于1938年流亡到美國。1949年，他成了萊比錫卡爾·馬克大學(Karl Marx University in Leipzig)的教授，1961年旅居西方後，在圖賓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任教授。從‘烏托邦精神’(1918)到‘希望的原則’(1954-1959)，這個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把世俗救贖的一面復歸給社會主義。

[6]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1957-1967文集，第2卷(巴黎：弗朗索瓦·馬斯伯樂出版社，1971年)：574頁。

[7] 格瓦拉，文集，第2卷，371-372頁。

[8]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計劃與人”，1957-1967文集，第6卷[未編輯文本](巴黎：馬斯佩羅，1972年)：90頁。

[9] 在格瓦拉1966年所寫的有關政治經濟的文章裡，這個概念是很清楚的。卡洛斯·塔夫拉達在“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中，引用了一些摘要。珍妮特·哈貝爾(Janette Habel)正確地指出，格瓦拉“太多強調對斯大林主義畸變的經濟批判，過於重視市場關係，卻沒有足夠批判蘇聯政治制度的員警和鎮壓性質。”(J.哈貝爾，前言，M·洛伊，切·格瓦拉筆記(巴黎，Syllepse，1997年)：11頁。

[10] “莫里斯·澤特林的採訪”，R.E.邦那切(R.E. Bonachea)，N.P.巴爾德斯編輯(N.P. Valdes)，‘格瓦拉：埃內斯托·格瓦拉作品選’(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9年)：391頁，以及“同羅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亞(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的談話”，加里坦·滕南特，‘加勒比海隱藏的明珠：古巴托洛茨基主義’(倫敦：豪豬出版社，2000年)：246頁。據羅伯特·阿科斯塔說，格瓦拉告訴他，在未來的一個時候，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版物會在古巴合法化(249頁)。

[11] 切·格瓦拉，“計劃和人”，共產黨宣言雜誌，第7期(1969年12月)：37頁。

[12] 格瓦拉，1957-1967文集，第2卷，379頁。

[13] 胡安·安東尼奧·布蘭科在‘第三個千年(Tercer Milenio)：後現代主義的另一版本(una visión alternativa de la posmodernidad)’中引用，(哈瓦那：中心菲力克斯·瓦雷拉中心(Centro Felix Varela)，1996年)：56頁。

[14] 格瓦拉，1957-1967文集，第2卷，369，375頁。

[15] 塔夫拉達，“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173頁。

[16]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政治經濟注解(哈瓦那：海洋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編輯部)2006，132-133頁。

羅莎·盧森堡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尼斯特·曼德爾著 瓦爾·格雷厄姆和弗雷德·勒普拉翻譯

羅莎·盧森堡在革命運動歷史的真正地位仍有待確定。斯大林巨型獨石雕的解體意味著，很多人在承認她的優點時，他們會趕緊補充說，“她屬於1914年以前的時代” [1]

以這種方式把她分門別類的那些作家，用本質上是主觀的標準處理工人運動歷史，是自設障礙。按這種方式，羅莎的優點是——根據有關作者的奇想——她不妥協的捍衛馬克思主義，反對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她深深執著於群眾行動和自發性的原則，甚或她捍衛工人民主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暴行”。

當我們用客觀的標準處理工人運動歷史，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金科玉律於馬克思主義本身時，困難立刻消失：在最終的分析中，是物質的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相反。為了解釋國際勞工運動思想中已經出現的修改，包括使馬克思主義本身變得豐富或貧瘠的一系列貢獻，我們必須從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開始。照此方法，羅莎在1914年前（如果不是1919年前）工人運動演變中的角色，仍然是一致的，並不顯現支離破碎的樣子。只有通過這樣的方法，而不是陳述歷史和專門研究的實證方法，才能充分顯示羅莎理論和實踐活動的至關重要性。

危機中“久經考驗的策略”

三十年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所謂“久經考驗的策略”，已完全主宰了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事實上，除了巴黎公社光輝的特立獨行，和國際工人運動某些（主要是無政府主義的）分支的經驗以外，階級鬥爭的歷史已蓋上了社會民主黨郵戳達半世紀之久。其影響力是如此突出，即使是像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那樣的人，儘管

他們在實踐中在全國範圍內打破了這一傳統，仍然繼續把德國模式宗教式地作為一種普世適用的模式。

“久經考驗的策略”有了第一等的血統。在其生命的最後十五年，儘管動盪不安，[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成為它的鬥士，甚至在他的“政治遺囑”裏使它成為一個真正的行動，這個“政治遺囑”就是：他在1895年為德文新版的馬克思的《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導言》。1895年和1914年之間，來自這個“導言”最有名的摘錄無數次地被歐洲各種語言引用。1918年至1929年，社會民主黨遵循的就是這條道路，當是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和社會民主黨本身的危機結合在一起，把這個無結果的實習終結掉：

發生在德國的利用選舉，贏得所有我們可獲得的職位的例子，到處被模仿。各個地方，自發發動的攻擊已退居後臺...走向投票箱的兩百萬選民，再加上他們背後年輕的男女非選民...形成數量最多，最密集的群眾，是國際無產階級部隊決定性的“威懾力量”。這個群眾已經提供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已記錄的選票...其增長在自發，穩步，勢不可擋地進行，同時又像一個自然過程那樣平靜。針對它，所有政府的干預已證明是無能為力的。甚至今天我們就可以預期有2.25百萬選民。如果這種方式繼續下去，到本世紀末，我們將贏得較大部分的社會中層，小資產階級和小農階級，成長為這塊土地上決定性的力量，所有其他權力將不得不低頭，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保持這樣的增長持續而不中斷，直到它本身超越執政政府體制的控制，不浪費掉這個日益增加的先進保衛戰中的威懾力量，而是要保持它完整不動直到決定性的一天，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恩格

斯選集，禾·漢德森主編，第294-296。我們的重點）。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已可恥地審查了恩格斯的文章，並扭曲了它的意義，移除了這個老戰士和馬克思終身伴侶的言論中一切仍然是根本革命性的話。[3] 但所有這一切都是順手牽羊地做的。以上的引述是真實的。它全面評判“久經考驗的策略”：吸收盡可能多的成員，教育盡可能多的工人，獲得盡可能多的選票，並把新的社會立法寫進法律書（首先，工作周的減少）——一切將會自動地實施：“所有其他力量將向（原文如此）我們低頭”；我們的增長是“不可抗拒的”；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威懾力量完整不動直到決定性的一天”（原文如此）...

比國際社會主義中可敬長輩的祝福更有說服力的是事實的判決。事實把信用給了倍倍爾，王德威爾得，維克托·艾德勒和其他實用主義者，這些樂意沉重緩慢地走這條此後被提升到聖旨地位的道路的人。在每一次選舉中選票增長了。如果有時有意想不到的逆轉（1907年德國“霍坦多特選舉”），接踵而來的會是一個特別輝煌的即刻應答：1912年的國民議會選舉，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工人組織不斷聚集力量，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並成為真正的“反社會”堡壘，促進階級覺悟的持續發展。有工資的提高，有越來越多的保障工人的法例，而且貧窮在下降（即使它並未完全消失）。潮流似乎不可阻擋，不僅其忠實信徒即使是他們的對手也被它弄得暈頭轉向。每次選舉得票都增長。

但一如以往，覺悟落後於現實。這一切“不可阻擋的潮流”的產生，反映了國際資本主義的繁榮，世俗的歐洲“工業後備軍”的減少，顯然是通過移民，以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

家日益增加的超級剝削而達到的。到20世紀初，使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矛盾得以臨時緩解的資源，已開始耗盡。此後，社會矛盾的惡化而不是緩解進入議事日程。等待到的階段，不是一個和平進步的時代，而是一個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鬥爭和內戰的時代。很長時間的改進之後，有二十年的時間，實際工資停滯不前，或甚至下跌。漸進演變的時代處在尾聲；革命的時代即將開始。

在這新時代，“久經考驗的策略”失去了所有的理由；從一個組織的原則，轉化為歐洲勞動階級的死亡陷阱。1914年8月4日之前，絕大多數當代人並沒有把握到這個。甚至列寧，也沒有為了坐落在沙皇帝國西方的國家去理解它；托洛茨基則在猶豫不定。羅莎的長處是，她第一個清楚而系統地把握了西方工人運動戰略和戰術根本改變的必要性，因為面對的是一個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帝國主義時代的曙光初現。[4]

羅莎反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根本原因

當然，新的客觀形勢已被十九世紀末最富有遠見的馬克思主義者部分地掌握。殖民帝國擴展和帝國主義的開始，對這一現象——目前它被表達為大資本的政治擴張，——進行了分析。希爾弗丁已豎立了顯著的豐碑即‘金融資本’。他記錄了卡特爾，信託及壟斷（修正主義者用來說明資本主義會越來越有組織，從而使其矛盾不那麼尖銳；陽光之下真的是沒有新鮮事）的出現。斯圖加特國際會議之後，列寧，波蘭，荷蘭，比利時和義大利的左派更加懷疑，考茨基在向修正主義讓步，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上讓步。選舉的機會主義和這個或那個地區或國家集團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戰術”集團（如在德國巴登集團，比利時工人黨的大多數，法國饒勒斯的追隨者等）遭遇到猛烈開火。然而，這一切的批評仍然是局部的和零散的，最重要的是，“久經考驗的策略”並未取消，以利於一個新的戰略戰術

系統。與此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更多的崇敬。

從1900年至1914年，羅莎是俄羅斯西方唯一按新方向思索的社會主義者。這個特殊的成就，不只是她無可否認的天才，她思路的清晰，和她對社會主義和國際勞工階級事業堅定不移的獻身的結果。最重要的，它可以由歷史和地理亦即是社會的條件加以解釋，她的理論和實踐就是在這些條件下培養和發展起來的。

她作為兩個社會民主黨（德國和波蘭黨）領導人的獨特地位，把她置於瞭解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矛盾趨勢的一個制高點。一方面，有陷入德國越來越突出的官僚事物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在沙皇帝國，鬥爭的新形式和方法在興起。因此，她能夠為工人運動的策略演示同樣大膽的行動，如同托洛茨基為革命遠景所做的一樣。最“先進”的國家不再必須顯示“落後”的東西，他們自己未來的形象。與此相反，“落後”國家（俄羅斯和波蘭）的工人，一直向西方國家顯示必須採用的迫切的戰術修改。

當然，這也為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預見到。早在1896年，帕武斯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份長篇研究，他設想使用“大規模政治罷工”作為武器，打擊用政變壓制普選的威脅。“該研究本身受啟於考茨基提交給蘇黎世社會主義大會第10次會議（1893）的方案，方案討論的是對普選所受威脅的適當反應。[5] 過去恩格斯曾提出同樣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出擊被孤立了起來，而沒有導致戰略或戰術的變化。

羅莎也受惠於對兩個政治危機的深入研究，這兩個危機已經動搖了該世紀結束時的西歐：法國德雷弗斯案件和比利時爭取普選的總罷工（1902）。從這個兩方面的經驗，她產生了對議會愚昧病的深深厭惡。此外，她越來越相信，

在議會以外的行動政治方面，以及在一般的選票至上主義和純粹的經濟打擊方面，如果群眾沒有預先受過良好訓練，“久經考驗的策略”在“決定性時候”會失敗。不過，最重要的是，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使羅莎能夠把她零散的批評，整合成為一個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系統性批判。事後我們可以說，毫無疑問，1905年，標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實質上進步的角色的結束，迎來了長期的波動階段，在這階段中，以前的進步特徵同穩步增強的反動影響日益結合，直到他們把黨帶向1914年8月的災難。

要把握1905年俄國革命的重要性，我們必須緊記，這是巴黎公社時代以來歐洲目擊的首次大規模的革命動亂：就是說，時隔34年！因此，這是完全自然的，即像羅莎那樣的激情革命者，應認真研究革命爆發的每一個細節和其所有特徵，以便為歐洲未來的動盪吸取1905年的重要教訓。在這方面，她只是遵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腳步，對1848年的動盪和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了相同的檢試。

面對社會民主黨的“久經考驗的策略”，為加速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新戰略和新策略的發展，1905年革命的一面，尤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幾十年來，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另一方面，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辯論困陷在一個虛假的分裂中，把少數立即行動的支持者，同那些大規模有組織行動的支持者對立起來，這後者意味著實踐中的“和平”，“法律”工作（在選舉舞臺上或在工會裏）。然而，1905年的革命產生了一組事件，是雙方都不曾預見到的。因為1905年出現了群眾的直接行動，但這些群眾，遠非在一個自發和無組織的清白純樸狀態裏愉快地輾轉，他們正是通過其群眾行動經驗組織自己，為未來更大膽的行動準備自己。

因此，即使革命工團主義者已多年把總罷工“神話”同社會民主黨選舉至上主義對立起來，而且雖然它處在總罷工在歐洲第一次得勝這個非常時刻，列寧和羅莎都把握了這個在西方沒有得到理解的事實：1905年吹響了俄羅斯革命工團主義死亡的喪鐘！他們應該有補充說，——當然，列寧只是1914年後才理解這一點——即俄羅斯革命工團主義的黯然失色只能用這個事實來解釋：遠不是反對大規模罷工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遏制它，俄羅斯和波蘭社會民主黨（或至少他們的最激進的派系）已成為群眾罷工的熱心組織者和宣傳員，並因此最終克服了舊的“漸進行動-革命行動”二難分法。[6]

羅莎被1905年革命的經驗弄得眼花繚亂，這個經驗已在沙皇帝國西方的幾個國家的工人心中敲起共鳴——開始於奧地利，在那裏它激起了贏得普選的總罷工。從而，羅莎在其生命的最後14年，持續努力，向德國無產階級傳導這一根本的教訓：必須放棄漸進性，必須為再次列於議事日程的群眾革命鬥爭做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俄國革命和1918年德國革命的爆發，全都確認了她1905年估計的準確性。

1905年2月1日，她寫道：

但對於國際社會民主黨，俄羅斯無產階級的起義也構成一些新的深刻東西，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每根纖維去感受它。我們所有人，無論我們怎樣自命掌握辯證法，仍然是不可救藥的形而上學者，癡迷於我們對日常經驗到的事物的執著中...只有在革命的火山爆發中，我們才能察覺到，年輕的鼯鼠取得了多麼迅速和驚天動地的結果，並且是多麼愉快地覺察到，它這是在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社會腳下的真正地基。用選舉統計和地區分部的成員去衡量廣大勞工階層的政治成熟性和革命能量，就像用一把尺來量勃朗峰！

5月1日，她續說：

這是主要的把握點：我們必須瞭解和吸收這樣的事實，即一個沙皇帝國革命的現實，將挑起國際階級鬥爭節奏的一個巨大加速，從而即使在“老歐洲”的中心地帶，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面臨革命形勢和全新的戰術問題。

最後，在1905年9月22日耶拿大會上，在對抗像羅伯特·施密特那樣的改革派工團主義者時，她憤怒地呼喊著：

到目前為止，你坐在這裏，聽了很多的發言，談論政治性的群眾罷工。難道它沒有讓你感到，你像是把頭放在手中，並質問自己：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光榮的俄羅斯革命時期？抑或還是在幾十年前呢？每天你可以閱讀評估革命的檔，每天你可以閱讀新聞快報，但你顯然沒有用眼看也沒有用耳聽...難道羅伯特·施密特沒有看到，我們偉大的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言的時刻實際上已到達？演變成爲革命的那一時刻！俄國革命就在我的眼前。如果我們什麼也沒有學到，我們就是傻瓜。[7]

回頭看看，我們知道，她是正確的。沒有1905年經驗，以及它向數以萬計俄羅斯工人幹部提供的巨大革命訓練，1917年的俄國革命勝利會無限的困難，同理，如果1914年前德國工人經歷了准革命的或革命的群眾政治鬥爭，1918-9德國革命的勝利會容易得多。不弄濕腳，你就學不會游泳，沒有革命行動的經驗，群眾就不能獲得革命覺悟。即使1905年和1914年之間的德國，不可能模仿1905年革命，它至少可能完美地全面改造社會民主黨的日常做法，把它導向一個具有更加革命模式的參預和幹部的形成，從而為同資產階級和其國家機器的必然對抗，準備好群眾。拒絕踏上一個新的歷程，和死抱著關於社會主義“無可避免的”勝利，面對工人“平靜和安寧的實

力”，資產階級及其政權“無可避免”的退卻這些越來越虛幻的公式，社民黨領導者在這些決定性年代裏播下龍的牙齒，它們在1914，1919和1933年德國工人收穫慘痛的失敗時，作為武士蹦了出來。

關於群眾罷工的辯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必須檢查1905年在社民黨內部展開的關於群眾罷工的辯論。作為辯論標誌的主要舞臺有：1905年耶拿會議（某種意義上1914年之前最“左”的會議，顯然是由於俄國革命的壓力）；1906年曼海姆會議；同一年兩個小冊子的出版發行，一個是考茨基的，一個是羅莎的，談的都是“群眾罷工”問題，1910年羅莎和考茨基之間的辯論；最後是考茨基和潘那廓克的辯論。[8]

或許有點大綱式的，我們可以復述辯論的要點，內容如下。幾十年來，把普遍總罷工的思想作為“普遍愚蠢性”（"Generalstreik ist Generalunsinn"）來打擊，其藉口是，在這樣的罷工可能獲得成功之前，必須先組織廣大勞動者。雖然社民黨領導人被1902-3比利時總罷工震撼，但對其“寂靜無為”觀念的任何修訂，都只是以一個非常猶豫的方式進行的。[9] 在1905年耶拿會議上，工會領袖和社民黨領導人間爆發了激烈衝突，當時工會領導人走得如此遠，以至於建議總罷工支持者應啓程前往俄羅斯或波蘭，立即把他們的想法付諸實踐。[10]雖然不願意，但精力勃勃地，倍倍爾進入講臺攻擊工會領袖，承認群眾政治罷工“原則上”的可能性。然而，耶拿會議和曼海姆會議期間有一妥協敲定了。在曼海姆會議（1906年）上中央機構恢復了和平。此後，在他們權衡所有的“組織”，可用資金，“力量平衡”等問題後，認為只有工會首領們是“有資格”“宣佈”罷工行動，包括群眾政治罷工的人。在俄羅斯一項實際革命的事與願違的干預以後，德國社民黨領導人鬆了一口氣，回到了熟悉而走順了

的道路，即“久經考驗的策略”之路。

這整個過程中，羅莎當然焦躁不安。她只是在等待最適當的時刻，為她的新戰略戰術，作出決定性的出擊。1910年普魯士國會選舉帶來了曙光，當時普選動員已經展開。人民群眾要求行動，在數以千計的工人和激進分子的幫助下，羅莎舉辦了十幾次群眾集會。警方對會議的禁止導致衝突，最後，在柏林特拉撲投公園組織了一個200000人的中心示威。但社民黨的領導，如同討厭鼠疫一樣討厭這些“動亂”，並專注於為1912年的選舉準備盡可能最好的選舉參預。結果，動員被扼殺在搖籃中，這一次是考茨基自己，這個“正統”衛士，拿起了棍棒，並且領導了該組織對左派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他製作了無數的書卷氣的文章和小冊子，這些東西，除了顯示對群眾運動動態的把握完全失敗以外，別無其他。[11]

乍眼看來，聯盟的轉折發生了。在世紀之交，羅莎和考茨基（左派和中間派）已被封鎖，被倍倍爾和辛格周圍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少數派的黨機構封鎖了。1906年曼海姆會議上，工會機構走向修正主義陣營，而倍倍爾-考茨基-羅莎聯盟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因此，我們應如何評估這個聯盟系統的突然逆轉，就發生在四年（1906年至1910年）的時間內？事實上，問題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決然不同於外表。倍倍爾和黨機構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迷戀，在1900年和在1910年，都是一樣的。他們從根本上是保守的，也就是說，是工人運動本身心臟裏的現狀支持者（儘管不必失去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甚至激情，但把這些降級到一個遙遠將來的地步）。伯恩斯坦和修正主義者揚言要破壞“久經考驗的策略”（也即日常改革實踐），社會主義的宣傳，群眾的社會主義希望和信仰，黨的統一，以及群眾和黨之間的團結的微妙平衡。出於這個原因，倍倍爾和黨機構反對他；為了本質上保守的目的，以便不掀翻蘋果購物車。

然而，1905年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對德國本身階級關係的影響，加劇了工人運動心臟的緊張。當耶拿會議後出現分裂的可能性時，倍倍爾，埃伯特和謝德曼劇均表明，他們屬意於組織機構的統一，更甚於團結激進工人——他們就是這樣解釋“組織的首要性”的。從這一刻起，整個黨的機構同左派破裂，因為現在是左派要求拋棄“久經考驗的策略”，不僅在理論上而且——恐怖中的恐怖——在實踐中拋棄它。木已成舟。

唯一留下的暫時問題，是考茨基的立場。他會不會在黨機構的一邊反對左派，或與左派一道反對黨機構？1905年的革命後，他暫時傾斜向左派，但一個重要事件，決定了他的命運。1908年考茨基寫了他的《權力之路》。在這本小冊子裏，他細緻研究了自從恩格斯1895的著名序言以來，尚未解答的問題。贏得大多數職工群眾走向社會主義（以“久經考驗的策略”手段）後，如何再轉向取得政治權力本身呢？他的方式溫和而且並不意味著任何有系統的革命動員。沒有提出廢除君主制的問題（反倒是，他溫和地提到“帝國及其組成體制的民主化”）。但即使這樣，在這本為小心眼的，保守和官僚化的“黨的執行委員會”所寫的小冊子中，有太多的“危險階段”。“革命”的可能性被提到，它甚至假設性地提出，“任何人都不能天真地想像我們將默默而和平地從一個軍國主義國家...走向民主”。這引起“危險階段的產生”。它甚至可能“挑起一個法律訴訟”。因此，黨的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小冊子丟回到紙漿。[12]

一場悲喜劇隨後發生，決定了作為革命家和理論家的考茨基的命運。他求助於黨的控制委員會，後者是贊同他的。但是，倍倍爾無動於衷。考茨基然後同意向黨檢查，並削弱自己的文字。他檢查了任何可能有爭議性的地方，從而使文章變得完全緩和，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像一個沒有性格實力的完全懦弱的個人。甚至在這次事件可

以看出，他與羅莎未來破裂的種子，他的中心主義，在1910至1912年的辯論中，他作為一個黨員幹部的作用，1914年他的基本投降協定，等等。

這不是偶然的，對考茨基的嚴峻考驗，就像對所有中間派一樣，是權力鬥爭以及把革命整合成為一個立足於日常改革程式的戰略的問題。效果上，對國際社會民主黨而言，這是1905年以來的決定性問題。

第一稿‘權力之路’的分析表明，甚至在官僚利斧落下以前，中間路線的要素已經出現了。雖然考茨基敏感地分析了導致越來越多階級矛盾（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縮減的經濟擴張，等）的那些因素，其基本哲學仍然是“久經考驗的策略”的東西：工業化和資本的集中在為我們工作，我們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除非一些意外發生...這是考茨基的推理。把被動的宿命論丟棄，這個想法，只在那些情況下被採納，也即“我們的敵人犯下一個愚蠢的錯誤”——政變或世界大戰的時候。畢竟，自1896年以來，帕武斯首次提出這個問題後，事情沒有絲毫進展。

在考茨基的權力之路上，革命罷工和群眾運動爆發，沒有重要性。甚至俄國革命，它的爆發只是表明，它開啓了一個東方革命時代（這是正確的），並且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東方的革命時期會對西方的條件有深刻影響（也是正確的），而且無疑會加深資產階級社會的緊張和增加其不穩定性。製造不穩定性的俄羅斯動盪的客觀影響，和對西歐無產階級群眾活動的革命影響，兩者之間並沒有連接。政治主動，主觀因素，活躍元素——這些完全被忘記了。“等待你的敵人的錯誤，無須準備，只要單純的組織手段，小心地把主動留給敵人”——一言以蔽之，這是考茨基中心智慧的總和！稍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有更為深刻論述——一直到1934年，其災難性的失敗並沒有在世界上爆發！

這場關鍵辯論每一個方面都清楚顯示了羅莎的高明。考茨基用死記硬背的枯燥統計數字推斷出理論，即所謂“革命永遠不會過早爆發”，羅莎提出了對不成熟條件的深刻認識，每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在其出生的陣痛中知道：

... ..這些無產階級的“早熟”進展本身構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們將為最後的勝利創造政治條件，因為除非它在長期頑強的鬥爭戰火中鍛煉，無產階級不能達到完成最後翻身的政治成熟程度。 [13]

早在1900年羅莎就這樣寫道，正是在這裏，她開始形成革命勝利的主觀必要條件理論的第一要素，而考茨基仍癡迷於測試單純的客觀條件，否定羅莎所提出的問題的存在！以她對群眾生活和願望的深切同情，她對群眾情緒和群眾運動動力學的敏感，羅莎能夠早在1910年辯論時就能夠提出，20世紀無產階級戰略的關鍵問題：期待群眾鬥爭性的不間斷的崛起是徒勞的，以及這個事實，即如果他們因缺乏結果和缺乏領導而感到氣餒的話，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4]

當考茨基斷言，“能停止所有工廠”的總罷工的成功，取決於所有工人的初步組織，他把“組織第一”推到荒謬的地步。歷史已經表明，在這次辯論中，他是錯誤的和羅莎是正確的。我們已經知道，許多總罷工已經成功地癱瘓了一個現代國家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儘管事實上只有少數的工人組織了起來。68年5月只不過是老經驗的最新確認罷了。

羅莎是否犯了“自發性理論”（遠未證明的說法）錯誤，這當然不能從她對革命動盪期間群眾自發主動性的必然性（在這一點上，她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的判斷上來衡量，無論是這樣一些錯覺，即以爲這些自發主動性，便足以取得革命的勝利，或者這些主動性自己會產生組織導致革命

勝利，都不能用來作此衡量。她從來沒有犯過今天常見於自發主義者的幼稚誤解。

在羅莎的架構裏，給“群眾政治罷工”這樣一個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在她看來，它是為未來的革命衝突教育和準備群眾的基本手段（還要更好的是：教育他們，並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通過自我活動完善其教育）。雖然她並沒有擬定一個含有過渡要求的戰略，但她曾從過去的經驗總結了以下結論：必須同選舉鬥爭，經濟罷工和“社會主義”抽象宣傳的日常實踐決裂。她的群眾政治罷工是擺脫這些不好做法的基本手段。

對抗國家機器，提高群眾政治覺悟，革命的學徒...這一切都從一個清晰的革命觀察角度看到，該觀察預見到一個相對較短時間內的革命危機。如果說是列寧基於對俄國革命的信念創立了布爾什維主義，如果說是他1914年8月4日以後才把這個觀念擴展到歐洲其餘地區，那麼是羅莎，緊接著1905年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後，在西方本身同樣的革命緊迫性的基礎上，首先在構思社會主義戰略的區別上做出貢獻。

當考茨基反對羅莎說，“有組織群眾的自發運動永遠是不可預知的”，因而對於一個“革命黨”是危險的，他透露出一種自命不凡小官吏的心態，想像一個“革命”將根據一項仔細製作的時間表運行。羅莎千百次正確地強調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革命黨，比如1905年俄羅斯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其本身的傑出，正是在於它有能力理解和把握在這不可避免和健康的群眾自發性中，什麼是進步的，以便利用其能量於革命目標，這些目標已制定並體現在其組織裏。[15] 那使得斯大林官僚機構中所有的頑固保守主義者再次挖掘出對羅莎毫無根據的指控，說她對1905年革命的進程分析，“過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而“沒有足夠的黨的角色”。 [16]

事實上，她有一個關於角色作用的現實觀察——不幸的預言——工人運動的官僚主義可以引發革命危機，她在1905年9月耶拿會議上講話中是這樣說的：“以前的革命，特別是1848年的那些革命已表明，在革命過程中，不是群眾必須受控制，而是議會，必須阻止他們背叛群眾。”[17]

1906年至1910年的痛苦經歷後，1910年她甚至更精確的回到同一主題：“如果革命形勢全面開花，如果一波一波的鬥爭是非常先進的，那麼黨的領導人就會發現剎車無用，群眾會把站在風暴路上的這些領導人一把推開。有一天這可能發生在德國。但按社會民主黨的利益，我不相信有需要或希望走到這一步。”[18]

羅莎·盧森堡工作的一致性

在羅莎的“宏偉設計”中——引導的社會民主黨放棄“久經考驗的策略”，並為她判斷迫在眉睫的革命鬥爭做準備——她的全部活動具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一致性。

她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只是符合其對自發理論的關注，儘管這些關注是真實的。[19] 她的目標是全面揭示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德國社會，日益惡化的矛盾的主要原因。同樣地，國際主義不單單是一個或多或少柏拉圖式的作宣傳用的主題思想，而是具有兩個要求的一個功能：日益增加的國際化罷工，並裝備工人階級反對即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國際社會民主黨裏，羅莎為之奮鬥二十年的國際主義運動，由一個革命的觀念和戰略的選擇指導，就像她的“群眾政治罷工”和對帝國主義的深刻分析的運動那樣。

她的反軍國主義和反君主專制運動也是這樣。同一種廣為持有的信念相反，有時甚至是同情她的評論家也重複說，[20]羅莎的反軍國主義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運動，不僅是她的“仇恨”（或她對戰爭的“恐懼”）作用，而且是準確瞭解必須搗破資產階級國家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早在1899年她在《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寫道：

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和統治以及資產階級集中在軍國主義裏。同樣，社會民主黨是唯一的為原則反對軍國主義的政黨。因此，這一反對軍國主義的原則鬥爭，具有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性質。放棄同軍國主義制度的鬥爭，只會導致在實踐中放棄同現有社會秩序的鬥爭。 [21]

在改革或革命一年後，在她對服義務兵役的評論中，她簡潔地重複，如果這為武裝群眾準備物質基礎，它做到這點，是“在現代軍國主義的幌子下，現代軍國主義以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方式顯示軍國主義國家對人民的統治，其國家的階級性質”。這些清晰的方式顯示了巨大的鴻溝橫隔在她和伯恩斯坦的漫談，以及考茨基關於“民主化[原文如此！]帝國的律師言語之間”。

因此，我們可以立即明白，當她看到那些指責她用“冒險戰術” [22] “冒工人流血的危險”的真正改革派自己，1914年8月後，在一個大1000倍的規模上，不是為自己的事業，卻是為了他們剝削者而流淌工人們的鮮血時，可怕的憤怒必會發生在羅莎身上。這憤慨激起她對德國社民黨的痛苦判決：“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臭屍體”；“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大和最臭名昭著的罪犯”。[23]

那麼什麼是歷史對羅莎·盧森堡的結論呢？她完全錯在既讚賞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又讚賞孟什維克。她同時反對列寧的“高度集中”，而容忍自己的地下波蘭工人黨裏列昂·喬基斯謝思的鐵腕政權。[24]她過於傾向由先鋒隊消化社會主義學說，從而低估了需要促使工人階級的幹部能夠真正指導那廣大的群眾，使他們在革命的時候

政治化和進入歷史舞臺。出於同樣的原因，1907年後，德國社民黨內部，她沒有去努力建設一個傾向，或一個有組織的左派分枝（成立一個新黨，當然是不可能的，除非通過表明其歷史範圍的背叛，把社民黨領導的奸詐大白於群眾）。青年斯巴達克同盟，以及後來的德國共產黨（kpd）要為這個失敗付出可怕的代價，使用十年時間干預建立一個真正的領導班子；他們被迫在革命的中間承擔這一任務。

然而，所有這些領域都屬於偉大門爭，該鬥爭主導了她的生活。羅莎實際上住在德國，這樣一來，她越來越鄙薄和不信任社會民主黨機器，對於這部機器裏的趨炎附勢者和職員的罪行，她察覺得比列寧更早更清楚。直到1914年，列寧才接納羅莎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結論。那以後，他才斷定悲劇的根本的歷史教訓——僅僅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對於勝利是完全不夠的。所需要的是一個組織，它的方案和日常對階級鬥爭的干預，將確保在革命的當天，黨會成為無產階級的動力，而不是官僚劊子手。而不是直到1918年，羅莎才反過來達到了列寧的結論。當時，她抓住了建立一個革命先鋒組織的需要，並且堅定相信，對群眾創造力，或其自發地放棄社會民主黨官僚的能力有無限的信心，是不足夠的，社會民主黨官僚最終把他們的反革命色彩染在旗杆上。

總括而言，當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欠了羅莎盧·森堡很多很多。她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確定並開始解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戰術中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在帝國主義心臟地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由范·格雷厄姆和馮檢·勒普拉翻譯于法文。歐尼斯特·曼德爾是第四國際一個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和長期的領導人。他死於1995年。

注釋：

[1] 這是JP Nettl特別的判斷，他寫了羅莎的目前最為完整的傳記（羅莎盧·森堡，倫敦，1966年）。Nettl把部分事件的豐富細節和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判斷，同無產階級的策略，群眾運動和革命的觀點的一般問題的完全缺乏理解結合了起來：正是這些問題，讓羅莎畢生專注於它們。

[2] 因此，在19世紀90年代當戰爭的危險第一次出現時，恩格斯斷言，一旦發生戰爭，社會民主黨將被迫取得權力，並表示擔心，這可能是會災難性地結束。在同一封給倍倍爾的信中，他表示深信，“到本世紀末，我們將獲得政權”（給倍倍爾的信，1891年10月24日）。在以往的一封信（1891年5月1日）他攻擊倍倍爾檢查‘哥達綱領批判’出版的計畫和譴責對黨內批評和討論自由的攻擊（八月，致倍倍爾，弗里德里奇·恩格斯，Mouton & Co., 1965年，第417，465頁）。

[3] 1895年4月1日，恩格斯寫信給考茨基：“我看到‘導言’的摘錄今天出現在Vorwärts，沒有通知我就重印，而且在這種方式下，我似乎只不過是一個不計代價的和平的守法者。因此，我全力要求在‘新時代’上刊登未刪節版本的“導言”，消除這種可恥的印象”。

使用法律制裁威脅為藉口，倍倍爾和考茨基拒絕遵守恩格斯自己作刪節並且不遵守再出版一個完整的“導言”。這只是發生1918年通過另一國際-共產國際的斡旋以後。

[4] 在‘結果與展望’（1906年）上，托洛茨基幾乎呼應羅莎的意見，強調社會民主黨越來越保守的特性。但是，由於和解的立場，他採用了關於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派系鬥爭的說法，在1908年他靠近考茨基，在“群眾政治罷工”辯論中支持他反對羅莎。對於羅莎和考茨基在1910年的衝突，列寧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試圖阻止考茨基和孟什維克集團的發展。在他的文章“兩個世界”中，他聲稱，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其中，他列舉的人，不僅有羅莎和考茨基，也有倍倍爾）只是戰術性質上的，而且在最後的分析中分歧是輕微的。他讚揚倍倍爾的“謹慎”，根據‘最好是讓敵人主動發起戰爭’使他的論斷合理化。（工程，第16卷，頁311-16，柏林，Dietz-Verlag出版社出版）

[5] 文章題為“政變和政治群眾罷工”，在新時代首次出版。它轉載于群眾罷工辯論文選，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法蘭克福，1970年，頁46-95）。

[6]早在改革或革命時代，羅莎曾寫道：“伯恩斯坦開始考慮這樣的可能，即爲了歷史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轉型，徵用資產階級議會場所——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通道”。

羅莎對議會主義的批判和對資產階級議會衰落的分析，寫於1900年，至今仍新鮮和切題，1914年前在西歐沒有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文章有這樣的特性。按同樣的風格，羅莎解釋，由於法國工人階級對“Jauressist”議會制幻想，在法國革命工團主義力量越來越強。（她發表於1905年12月5/6日撒克遜工人報的文章——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1卷，頁196）。

[7]，這些語錄來自新時代出版的一篇文章，("Nach dem ersten Akt")，撒克遜報紙（"Im Feuerschmelne der Revolution"）和她在耶拿代表大會的講話（見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二卷，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1955年，第220/1234/5，和244）。

[8]這次辯論一個很好的總結見於安東尼·格魯嫩貝格的‘群眾罷工辯論’的導言（pp.5-44）。

[9]例如，文章“礦工罷工的經驗教訓”("Die Lehren des Bergerbeiterstreik")，見於1903年的新時代。

[10]羅莎·盧森堡，耶拿代表大會演講，1905年9月21日（演講和著作選，第二卷，頁240-1）。

[11]特別見於他的文章“下一步怎麼辦”（新時代，1910），及其“先發制人的防禦性打擊”和“侵略性罷工”之間的區別（區分來源於亨利特·羅蘭-霍斯特的著作‘群眾罷工’），“經濟”和“政治”罷工的區別，“減員戰略”和“推翻戰略”的區別等（群眾罷工辯論，第96-121）。

[12]見‘權力之路’，Editions Anthropos版本（巴黎，1969年），從一篇導言和書信的附錄，可以一窺這個不幸的事。

[13]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第二，第136。

[14]同上，325/6，330頁。摘自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出版的一篇文章，題爲“下一步怎麼辦？”。

[15]只不過是由斯大林分子散佈和今天的自發主義者“無辜”重複著的誹謗，說羅莎把1905年革命“所有的優點”歸因於“無組織群眾”，沒有提及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作用。其他旁證博引不說，這只是其中一個剛好相反的證明：“即使在第一時刻，起義領導權落入機會主義領導人手中，即使起義顯然被各種各樣的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幻想和傳統困擾，起義只不過是巨大政治教育蔓延在俄羅斯工人階級深處的結果，政治教育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男女暗地裏鼓動的...在俄羅斯，如世界其他地區，自由和社會進步事業在覺悟的無產階級手中“。

（1905年2月8日 演講和著作選，第1卷，第216頁）。

[16]參考福利德·厄斯納的‘羅莎傳’，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1951年-尤其50-53頁。

[17]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頁1，頁245。

[18]“理論與實踐”（新時代 1910）轉載於‘群眾罷工辯論’ 頁231。

[19]羅莎她表示，她寫作“政治經濟學導論”時，她偶然碰到一個理論的困難，當時她想說明實現剩餘價值的障礙。因此，她計畫寫“資本積累”。

[20]尤其是，安東尼·格魯嫩貝格在她的‘群眾罷工辯論’導言（第43頁），在那裏她堅持認爲，在制訂征服權力的戰略設想，在提出同資產階級國家力量鬥爭的問題上，潘訥考克同羅莎和考茨基兩者都是截然相反的。

[21]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頁47。

[22]同上，頁245。

[23]關於羅莎向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提交的方案的講話（Der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年，頁194）。尤其是，1918年的停戰協定以後，當德國社民黨領導人企圖利用德國士兵反對波羅的海國家的俄國式革命時，她怒髮衝冠。

[24]最近在波蘭出版的，艾達·維法爾的‘羅莎·盧森堡-利奧·焦基希斯通信’，這無疑將提供重要輔助材料，有助於研究羅莎關於她自己的波蘭黨內部“組織問題”的實際和理論的態度。通信的法語和德語部分的翻譯（by Editions Anthropos an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即將完成。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威·格瓦拉著 莊思譯



信達出版社印行

我是怎樣寫〈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的(轉載)

胡洛卿

清明時節，是對先人的懷念。時間過得很快，謝山逝世十四年了！這十多年來，我常常想着他的一言一行。

謝山常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懷才不遇，坎坷一生，是個不幸之人。可他卻認為：有幸生長在這個千變萬化的偉大時代，看到「滄海桑田三度見」（指：1. 抗日戰爭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推翻蔣介石統治；3. 斯大林主義由盛至衰，蘇聯解體。）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大飽眼福！禍與福是相對的，沒有禍，也無所謂福。所以常說：「生在福中不知福！」

謝山去世前，已被折磨得百病糾纏。莫說高血壓、心臟病、甲亢等頑疾，就是肺病一種也够受了。在「階級鬥爭」的年代，病了得不到休息，手上拿着幾張不同病症的假單，也要「班後學習」。而所謂「學習」，是下班以後，幹幾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這樣的「學習」，比一天正常生產還要辛苦得多。但這不算「上班」，沒有工資，沒有勞保。短短幾個月，把他的身體摧垮了！左肺功能喪失，右肺也不健全。靠這不健全的右肺，供養全身血液，加上其他病症，日子很不好過。能活到七十多歲，是够堅強的了。可一旦失去了他，實難接受。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誰也無力抗拒。在朝思暮想之下，我寫了《謝山小傳》，當初只是寄託哀思而已。後得友人鼓勵，要我補充完善，還主動給我打字。我寫呀寫呀，寫了十多萬字，寫不下去了。初寫的萬餘字，還有點滿足感；後寫的十餘萬字，反而不滿意，不知怎樣寫好謝山這個人物……。

回憶過去，免不了勾起滿腔心事，思潮起伏，難以控制。一些親人出於好心，勸我辛辛

苦苦幾十年，時至今日，應該過幾年安樂的日子，何必自尋煩惱？況且名人傳記多得很，誰來看你這個無名小卒？算了吧！我力排眾議，還是我幹我的。

有時意外的事影響深遠，壞事會變成好事。由於《謝山傳》寫不下去，想赴港求助。不料申請探親無理受阻，大半年未辦成。究其原因，是辦事員故意刁難之故。於是我趁此人不在，另找一位年青人。他照章辦事，給我一紙申請表，我當即填好給他。他問：「單程還是雙程？」我一氣之下，申請單程。心想：單程去港，以後來往自由，不再受此窩囊氣了！結果非常順利（其實是正常的），很快批准了。初來港定居很不習慣——人地生疏，生活程度高，居住面積小，房租貴。但這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不受歧視，辦事公平合理，快捷妥當。我來港時已年過七十，在廣州居住二十年，老人證也未領到。來港不久，只填了一紙申請表丟進郵箱，未幾即寄來了〈長者卡〉，還有一大本指導性的書——各區政府機構、醫院、警署等等所在地、電話號碼，以及規章制度，辦甚麼事找甚麼地方，一目了然。既來之，則安之，很快安定下來，斷斷續續寫《謝山傳》。

2004年，我應邀參加城市大學舉辦的「新來港人士座談會」。當時《謝山傳》寫不下去，像一只小船駛離了岸邊，在江中飄盪，到不了彼岸。在會上發言時，我以〈有志者事竟成〉為題，表示決心要把〈謝山傳〉寫好。後來我想到應該藉此機會把謝詩詞介紹給讀者，於是修修改改，2006年寫成〈詩人謝山〉。

筆者向來對詩詞沒有興趣。謝山每寫詩詞，我是第一個讀者。我看不懂，他給我解釋，

我過後即忘。現在要寫〈詩人謝山〉，實力不從心，只有苦思冥想，盡量從書本及後期留下來的信中找資料。

謝山做事認真細緻，一般詩詞的寫作時間，只寫年月，如加上日期，定有作用。有關東歐劇變等詩的含義，我是根據日期，翻看當時的資料寫成的。我想：「雖不中，不遠矣！」但是更多的詩詞，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照搬，不敢妄加說明。

筆者向來做牛做馬，不會舞文弄墨，所寫的文字，看一次改一次，改來改去，自己也認不出來，找人打字也難。只好學電腦，自行修改。我不懂英文，記憶力差，要學新科技，談何容易。幸得各方相助，老人中心大力支持，電腦出問題了，朋友、社工、義工上門指導，令人感動！在寫《謝山傳》時，也寫了和謝山一起的朋友們。友人看了，認為沒有必要。我刪去了。後來想到：那些朋友已先後去世了，我是那個時代唯一的歷史見證人，應該留下一些史實，於是又把它補了上去。最後定名《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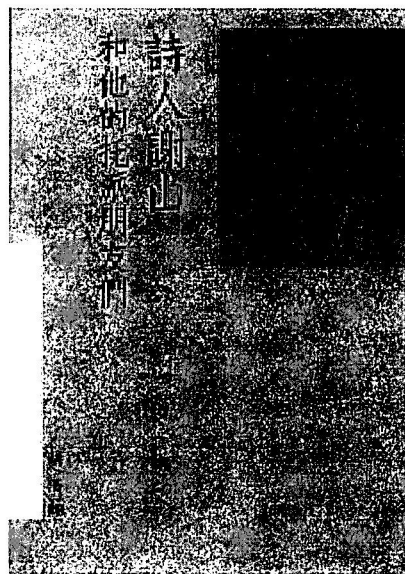
拙作得到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够幸運的。謝山生前自編的〈苦口詩詞草〉，羅孚先生在〈明報·島居新文〉專欄連續撰寫了七篇評論文章。謝山的朋友王凡西老人剪寄給我，並說今人多不懂古詩詞，建議我找人作註，以便吸引更多讀者。我給羅孚先生寫了一封感謝信，並請他箋註。羅先生欣然接受，要我提供資料。可惜我對詩詞一竅不通，不知註釋要些甚麼資料，毫無辦法，只好作罷，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但因此和羅先生有了聯繫，後來把拙作介紹給天地圖書公司，並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得以面見讀者。

得與失是相對的，因為失去了謝山，才想到把他事蹟記錄下來。我不相信命運，但自認這十多年來都碰到好機會。能完成這部十多万字的著作，也是很意外的。我想：如果謝山有幸多活幾年，我不會拿起筆來寫些什麼，更

不會寫書。那時，精力和記憶力都衰退了，給我打字的朋友也老病了，我寫的字，過後自己也認不出來，更沒本事去學電腦。「幸而」謝山去世時，我只有六十多歲。雖然記憶力差，還能回憶過去的點點滴滴，一言一行。有時半夜睡醒，想起甚麼，拿筆記下，以免第二天忘了。如果在大陸，拙作是寫不好的，不能暢所欲言，畏首畏尾。就算寫了，也無法面見廣大讀者。即是說：如果那次探親申請不順利，就不會來港定居，也就沒有《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這本書的出版了。所以受了挫折，不一定是壞事；把壞事變好事，就靠各人的努力與機遇了。現在看來，還應該感謝那位刁難我的幹部呢！他改變了我此後的歷程。

2010年4月

轉載自2010年的《文藝評論》



塞外散記——我的三十多年勞改生涯(轉載)

周履鏘

十多年前，朋友鼓勵我將三十多年的勞改生活寫出來，我一直沒有動筆。

蘇聯亞·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蹲了十一年，寫出了巨著《古拉格群島》，三大卷，一百四十萬字。我在勞改隊的時間等於索爾仁尼琴三倍多，但不能寫出中國勞改隊的全貌，除了我沒有寫作能力之外，由於中國的勞改隊管理制度，犯人不允許串隊的，所以我知道的很有局限。現在我也老了，因此只能以個人的經歷寫一點，而且是分段不連貫的，我取名《塞外散記》，不過是一些散亂的雜記而已。關於三十多年的苦難生活，天寒地凍的苦楚，也不擬多寫。

(一) 勞改隊、勞改犯人

中國解放初期，沒有勞改隊。鎮反時殺人如麻，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說：“鎮反殺了七十萬”。農村土改中被殺被活活打死的人數更無法統計。由於殺人太多，加上犯人的勞動力還有利用的價值，於是學習蘇聯勞改營的經驗，成立勞改隊。

關押犯人的場所，有看守所、監獄、勞改隊。對犯人說來，是希望到勞改隊的，雖然勞動很重很苦，但比之牢房，空氣和陽光是充足的。

公安部有一個局（可能叫十一局）專管勞改工作，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下設勞改局，局以下為勞改支隊，對外稱xx農場、xx工廠，下分大隊、中隊、小隊。勞改局一度歸司法廳，現在勞改局都改稱監獄管理局了。不管歸屬和名稱怎樣變化，都是換湯不換藥。

我和趙養性被押送到勞改隊的時間是1955年4月下旬，我和趙從福州押到南平，和早已從各地來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發一套棉衣褲，告訴將去勞改隊，但沒有說去的地點，大家估計是到蘇北挖河築堤。送到外地勞改的犯人，刑期大都在五至十五年之間，長刑

期及無期死緩的關在監獄，短刑期的留在當地勞改。那時福建對外不通火車，從南平乘汽車到上饒，換乘悶罐火車，載有千人以上犯人的專列走走停停，走了二三天，覺得列車被分組推到船上，然後聽到水流聲，是過長江了。過江後又走了二三天還不停，越來越冷，有人從上端小窗看到長城，原來是過八達嶺要到塞外了。4月底火車停下，下車後只見白茫茫的一片，大家集隊踏雪步行了約一小時到了郊外，一塊用鐵絲網圍成的有十多幢工棚的工地就是我們的勞改隊。按照南平出發時編好的隊組，每小組二十來人，五個小組為一個小隊，一個小隊一百多人住一個工棚，三、四個小隊為一個中隊，共有三個中隊，估計約有一千多犯人。我在第三中隊第三小隊，趙養性在第一中隊第一小隊。

幾天後開會宣佈，當地是內蒙古集寧，也叫平地泉。我們的單位是內蒙古第十四管教支隊第五大隊。允許犯人與家屬通信，位址寫郵政信箱xx號（號碼現在忘記了）。第十四支隊對外稱鐵道部第二築路工程隊，當時的任務是修築集甯到二連的鐵路，第五大隊的任務是建築集寧樞紐站。

原來中蘇之間只有滿洲里一個通道，修築的集二鐵路是第二通道，經由蒙古直通蘇聯，比北京經由中東鐵路到蘇聯近得多。蘇聯鐵路軌距和世界及中國普遍採用的不一致，蘇聯是寬軌，滿洲里是換軌樞紐站。二連到集甯路基也是按蘇聯的寬軌標準修成的，集甯要修換軌樞紐站。工程進行了幾個月突然停下來了。過了好多年後才知道，原來中蘇矛盾露頭，不能讓蘇聯寬軌火車直接開到離北京不遠的集寧，所以改在中蒙邊界二連建樞紐站。

當年勞改隊的幹部都是從部隊轉業的，他們從北方一直打到廣東福建，又押犯人回到北方。這些人大都有北方農民純樸憨厚的性格，但文化水準很低，不能適應城市工作，就將之轉到勞改隊管理犯人。有些人到了南方後還娶

了妻子，也一起把南方的妻子帶來了。那時的管理層幹部人員很精簡，一個小隊一百多犯人只有一個小隊長，一個中隊也只有正副中隊長二人，還有一名文書，是從當地招的文化青年，其實也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我所在的小隊長是從福建帶隊來的，態度比較和善，他的南方妻子很過不慣北方生活，影響小隊長的情緒。他每天把犯人帶到工地，讓大家勞動，他自己只管曬太陽打瞌睡，可到犯人工間休息時，喜歡和犯人東拉西扯。我知道的勞改隊情況有些從他那裡聽來的。

內蒙古有很多勞改農場，一個農場就是一個勞改支隊，還有煤礦、石棉礦、磚瓦廠、機械廠等，聽說有一個單位叫二十四支隊，那麼內蒙至少有二十四個勞改支隊了，所以內蒙可能有二十來萬犯人。內蒙的犯人都是從華東、華南地區來的，以廣東、湖南、福建、浙江人爲多。大部分犯人都是“反革命犯”，我們托派主要革命對象是國民黨，現在把我和他們都當作“反革命”關在一起，心裡覺得很不平，處理托派是不公開的，又不許我們和他人談案情，我就悶聲不響了。後來接觸的日子長了，逐漸瞭解到，原來共產黨用的“反革命犯”的罪名是無所不包的大籬筐，裝有國民黨的黨政軍憲特、有共產黨內的叛徒和反對派、還有宗教人士、聖母軍、一貫道等等。

築鐵路的流動性很強，一段工程結束了就要搬家，我所在的大隊，1955年底從集寧調到包頭修包頭鋼廠的原料專用線包白鐵路，調動時趙養性所在的中隊卻留在集寧，從此以後，我沒有遇到一個托派老朋友，成爲完全孤單的人。1956年修包蘭鐵路，我們從包頭往西一直到了河套地區。因爲經常要搬家，所以我所在的勞改隊都沒有高大的圍牆，只在四周用鐵絲網圍上，估計也沒有通電，因爲我們照明都用油燈。外出勞動，那是遍地放羊式的。說來奇怪，竟沒有逃犯，也許當年那批犯人，大都是經過鎮反後活下來的，嚇怕了膽，能活下來豈敢再逃。不像後來圍牆越修越厚，還加上電網，進出口多重鐵門，獄警越來越多，管理越來越嚴，反而不斷發生越獄暴動事件。

修鐵路人員有鐵道兵、築路工人、民工、勞改犯人。修鐵路路基是遇窪地填土築路堤，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遇小丘挖開修路塹，遇河流建橋，遇高山鑿隧道。最重最苦的工作是築路基土石方工程，犯人就是幹這種重活。當年沒有築路機械，全靠人工，全是肩挑鎬挖，築路堤時如遇到高填方，從取土坑挑一百多斤擔子，爬上堤頂，等於要上到三層樓以上的高度，其苦楚一言難盡。我當年才是二十出頭的青年，雖然從未從事體力勞動，但身體尚好，加上托派思想觀念是重視體力勞動的，所以我咬牙練了幾個月，終於過了勞動關，整日挑一百多斤的重擔，也能承受。修鐵路要掌握一定的規格和品質，進行勞動比賽要丈量完成的勞動工程數量，幹部本身沒有文化，於是從犯人中選稍有文化的人來做這項工作，我被選中了，工作的性質相當於工程施工的領工員。於是我可以有一小半時間從事非體力勞動。也因此，我後來被作爲技術人員調到內蒙東部保安沼農場。

勞改隊不同於看守所和監獄，沒有刑審任務。勞改工作方針是“改造第一，生產第二”，但生產是硬任務，改造的成果是看不見的，所以幹部們對思想改造並不重視，只要完成生產任務，犯人不逃跑就好了。大多數幹部本人對犯人並不兇狠，但他們使用的犯人小組長，大都是改造中的“積極分子”，也就是牢頭。由他們鞭策犯人勞動，有時動粗打犯人，此時幹部莊做看不見，甚至避開。到了晚上，幹部到工棚對犯人訓話，他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說上一頓，就算完成改造任務了。燭光昏暗，犯人閉目欲睡，根本什麼也沒有聽進去。

勞改犯人的勞動，可以概括爲幹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我沒有在礦山等常年性勞動的單位勞改，不知道那裡的情況，我所在的築路和農業勞動都是有季節性的，塞外到了冬天，天寒地凍，凍土層超過一公尺，許多土方工程和農活都無法幹了。在可以施工的季節，每天勞動時間長達十多小時，有時爲了完成任務，組織犯人立功勞動競賽，被逼得疲於奔命。到了冬天，無法施工了，勞動較輕鬆。勞改隊實行大禮拜制，即每兩個星期休息一天，實際上到了農忙季節，有時接連一、二個月不能休息。最苦的是防洪搶險，日夜不停地泡在水中勞動。

至於犯人生活情況，也就是吃的怎樣？北方人的主食基本上是粗糧，犯人更不用說了，

全是粗糧，以玉米為主，副食是沒有油星的菜湯。1957年之前，在築路工程隊，因為要從事重體力勞動，基本上可吃得七八成飽，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所在的農場，憑口糧是無法吃飽的，好在農場自產的瓜菜土豆可以加一點，所以沒有大批犯人餓死的情況。其他地方就不清楚了。

囿於環境，我所知也僅此而已。

（二）“廢物利用”

犯人是一堆“廢物”，原只是作為勞動力使用的。但勞改隊建工廠，設農場，築工程，從設計到施工，都要有技術人員。解放初期，社會技術人才奇缺，於是從犯人中尋找。犯人中不少人是具有高等學歷的，但以學文史政經的為多，他們在國民黨政府中當官做老爺，這些人投入勞改隊毫無用處，只能幹體力勞動。少數學工科的犯人被利用起來了，其中有水利專家，工程師，還有一些在大學學習過理工科。我在中學時理科成績不錯，本來打算讀理工的，到上海聽了彭述之講課後，對社會主義理論發生興趣，放棄學工了。但到福建教書時，因為缺理科教師，我就充數教了幾年數理化，投入勞改隊後，我也就被利用了。

此外還有一類犯人被利用，就是原來是醫師或學醫的，各隊設有醫務室，用來為犯人治病。當時有二位原來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他們不僅為犯人治病，連幹部和幹部家屬都要找他們看病。有時甚至被接到外面給某些領導看病。

這些犯人當然願意被利用，因為不用參加體力勞動，而且吃的是和體力勞動者一樣的口糧，就不餓肚子了。

（三）保安沼

1957年冬，從第十四勞改支隊中，選了犯人中的醫師、工程技術人員、技工三四十人，調到內蒙東北部保安沼勞改農場，我也被選中。那時以後我生活在保安沼地區，直到1987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年退休回到上海，在那裡整整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我能工作的年代，都是在那裡度過的。就身份來說，前二年是勞改犯人，後二十八年是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實際是受管制的人員，當地人把這些人叫做“二勞改”；就工作性質來說，從1957年到1961年約四年時間，從事水利工程設計，之後調到農場辦的子弟中學做代課教員。文化大革命開始，把我趕出學校，到農場辦的造紙廠做造紙機械設計。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又把我調回學校，擔任數學教師，身份仍然是代課教員。先後送走了好幾批學生上了大學，文革前教過的學生，有些已經當上領導了，似乎覺得我還是一個代課教員太過意不去了，到1984年我被批准轉為正式教員。1987年才得以教員身份退休。

因為我在保安沼度過了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那裡有我為之付出辛勞的可有利後代久遠的水利工程，還有許多我教過的學生，至今還有人對我表示懷念。我內心對那個地區還是眷戀的。又因為我的工作關係，知道的情況比一般勞動的犯人多，現在就多寫上幾句。

嫩江是松花江的支流，綽爾河又是嫩江的支流，這條河流一般人並不知曉，其實日本人佔領時期，就對這個地區作過勘測，還曾計畫在綽爾河上游文得根修建小豐滿那樣的水電站。綽爾河下游汛期汪洋一片，千年沉積形成肥沃的沼澤地，這就是“保安沼”。實際上它是一個大區域。解放後內蒙古打算開發這個地區，派水利廳測量隊進行勘測，曾編一個《綽爾河下游右岸灌區設計任務書》。要開發這個地區，首先要沿綽爾河右岸築一條百里長的防洪堤，水利廳沒有勞力，勞改局接下這個工程，成立保安沼勞改農場，開始規模不很大，只開墾了部分不易受水害的地塊，並開始修堤。1956年一場洪水，沖潰了大堤，全場被淹。洪水退後，勞改局決定要複建並擴大規模，派一位元副局長總管這個地區。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到保安沼的。

原有的保安沼農場，有五個犯人大隊，只有耕地四、五萬畝，農場有一個直屬的犯人工程隊，它有木工廠、建築隊、技術室。我去了後，就分到技術室。技術室又分房屋設計組、水利工程設計組，還有一個測量隊。我被分到

水利組，組內有一個犯人過去是水利老工程師，我作他的助手，邊學邊幹。技術組的犯人，完成工作之後，可以自由地學習技術書籍，我利用這有利的條件，自學了大學工科的課程，且應用于工作，尚能夠適應水利設計工作。一年後，原來的工程師調走了，水利組就以我為主。

保安沼地區地形西高東低，沼澤地帶中的小丘就是住人的村落，村名都有北方的色彩，有三馬架、五家子、半拉山、白土崗等，有一個村莊叫“合記公司”，與其他村名很不協調，有些像日本的“株式會社”腔調，後來知道，確是日本人搞的。日本侵佔朝鮮和我國東北，把朝鮮人趕到東北，一些人在保安沼的一塊高地住下，取名“合記公司”。朝鮮人帶來了水稻種植技術，在附近一小塊地區獲得成功，由於當地土地肥沃，產出的大米品質甚佳。因此勞改局計畫在這個地區開發一個大型的種植水稻的農場。工程首先要修復沖潰的防洪堤，提高抗洪標準，我去了之後第一項工作就是參加設計防洪堤和計算土方工程量。大堤保護的區域約五六十萬畝，包括當地的村民土地，勞改農場劃定的區域有土地三十萬畝，可開發水稻田約二十萬畝。堤內修建灌溉渠系，築進水閘將綽爾河水引入灌區，通過各級管道流入田間。利用地形，全部是自流的，也即全部不用人工提水，生產成本就比較低。還在幹渠上修建水電站，防洪堤尾端建泄水閘和揚水站。這些渠系的設計，大都是我參與完成的。經過幾年的建設，耕地面積擴大了數倍，人員越來越多，於是保安沼農場之下設了三個分場，過了幾年，分場都變成獨立的農場，也就是這個地區有了四個勞改支隊。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東北生產優質大米的灌區。

內蒙古東部除了保安沼地區四個支隊外，紮蘭屯等處，還有一些勞改支隊，為便於管理，在保安沼設立內蒙古勞改局東部分局。

每個農場都有學校，有小學初中高中，為了集中辦學力量，後來把高中集合在一起，辦成保安沼高級中學，歸勞改分局直接管理。我最後就是從保安沼高中退休的。

（四）錢慧初萬里尋夫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我在福建被捕，錢慧初在上海被捕，從此夫妻資訊隔斷，可說是生死未蔔。錢慧初雖曾在大公小學聽過課，參加托洛茨基被害紀念會，但她並未參加托派組織，只是一個同情者。1953年秋後釋放，繼續在中學教書，帶著幼兒艱難地生活。1955年我到內蒙古勞改後，允許與家屬通信，才恢復了聯繫，我告訴她被判刑七年，她也就有了可待的日期了，期待我到期後回家團聚。

1959年12月22日，我服刑七年期滿釋放，但不許回家，只能在勞改農場留場就業，當時說可以給假回去探親，但春節時我提出請假，就是不准，沒有任何理由，被專政的物件，只得忍受，錢慧初的期望落空了。到了1961年1月我又要求請假，又是不准，但說可以讓家屬到內蒙住些日子。我將此情寫信告訴錢慧初，她盼夫心切，毅然決定到東北探親。備置了冬裝帶著年幼的兒子冒寒啓程，那時上海還沒有直達北京的火車，到了南京火車站下車，坐馬車到下關，乘輪渡過江，在浦口乘津浦鐵路到天津，換乘火車出山海關到達瀋陽，再換車到四平，最後換乘平齊鐵路到離我所在農場四十裡的江橋車站下車。她上海啓程時曾打電報給我，我到江橋車站接她，當時只有一列晚上到達的火車，一連二晚沒有接到。江橋車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車站，連電燈都沒有，第三天晚上我又去接，火車到了，在漆黑的月臺遠處，一位婦女向人問路，我一聽就是熟悉的妻子的聲音，趕快跑過去，總算接到了母子二人。當晚住在農場的駐江橋轉運站，第二天乘貨運馬車到達農場。農場已經知道我的妻子錢慧初是上海的中學物理教師，當地缺乏師資，有意要我的妻子調來，所以安排我們住場部招待所。

中國古有孟薑女千里尋夫，我沒有計算過上海到大東北有多少路程，我說是“萬里尋夫”可能有些誇張，但至少也有七八千里。且錢慧初換乘了多趟火車和一次輪渡，領著幼兒坐的是火車硬座，其艱難程度不會低於孟薑女尋夫。

保安沼地區盛產大米，農場畜牧養殖業發達，綽爾河淡水魚類豐富，所以可稱塞外“魚米之鄉”。但這一切，生產者犯人是無法享受的，可幹部食堂就能吃得很好。我獲釋就業後，那時這類人不多，就在幹部食堂吃飯，生活得到改善，錢慧初到了之後，也在食堂買飯菜。1961年正值所謂“三年災害時期”，上海生活供應已很困難，母子在農場吃的覺得比在上海還要好。（從1965年四清運動開始，強調階級鬥爭，就不許就業人員在幹部食堂吃飯了，只能在比犯人伙食稍好一點的食堂吃飯。）

一位領導幹部找我談話，詢問了我的妻子的生活情況，表示關懷。接著就動員我把妻子調來農場的學校教書，我當時應付說，讓她回上海後請求調動。幸好我們當年沒有上當，和我一起的一位也是就業人員的工程師，把他在北京當教師的妻子調到農場，她原是北京的模範教師，來了之後深得好評，可到了文革時期，僅因為工資較高，穿著較入時，就被批鬥，被迫自殺了。錢慧初如果那時也調去，恐怕也早十多年被迫而死。

那次錢慧初住了十多天回上海。1961年8月，把我調到農場辦的中學任教。1962年1月我獲准回家探親，到上海與妻子團聚，還回溫州探視年邁的父母，碰到我的姑母周蕙芳，她是周仁生和錢思敬的老同學，她告訴我：趙青音帶著兒子，住在溫州周仁生的父母家中，錢思敬在溫州一個街道工廠勞動，有人看見拉板車。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老朋友的資訊。

1963年7月，錢慧初又領著兒子到東北看我，那次住在學校裡，暑假較長，他們住了五十多天。我被調到學校任代課教員後，就有了寒暑假，北方寒假長，暑假短，之後幾年，都是我寒假過年時回家探親。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把我趕出學校，調到農場辦的造紙廠勞動，去了後碰到的廠長是曾領導我做技術工作的幹部，那時造紙廠要進行擴建，就讓我參加設計工作，這樣，我又邊學邊幹了十年造紙機械設計工作。不過那時正是文革的十年，嚴格控制就業人員的行動，我的請假探親不易獲准，好在錢慧初有假期，那段時期，她三次在暑假到保安治探親，在北方避暑了。1976年她在我處時，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山海關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的鐵路中斷了，學校開學時還回不去，到了九月，她只得從瀋陽繞道承德到北京轉車，錢慧初過去都在天津轉車，沒有去過北京，這次準備在北京玩幾天。到了北京，轉車的旅客一律不許進城，原來正值毛澤東死了，她只得立即返回上海。

文革結束後，我又被調回學校教書，那時以後，錢慧初身體漸差，再也沒有到東北了，直到她1981年去世，都是我回家探親。從1959年我刑滿到1981年慧初去世，我們艱難地兩地奔波，過著牛郎織女式的短暫夫妻團聚，經濟上爲了籌足路費，平時只能省吃儉用。這就是我夫妻兩人苦難的一生。

（五）文化大革命和挖內人黨

這裡所寫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挖內人黨運動中我身受的一些事情，也只是這兩個重大事件中的小鱗爪。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所在的學校也很快波及，首當其衝的是一位語文老師，一次在禮堂開批鬥會，被批鬥的語文老師跪在臺上，我和其他老師及學生坐在台下，會開了一半，一個平時對我很尊敬的學生，突然過來很兇狠地對我說：“周履鏘，出去，你沒有資格參加會議。”我被狼狽地揪了出去。原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央有一個公安六條，共中一條規定，地富反壞四類份子，禁止參加文化大革命。勞改單位的留場就業人員，不管有否公民權，都是專政的對象，都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久把我從學校趕出去，調到離學校二十裡的造紙廠勞動。從此被禁止參加文革，但管理越來越嚴，從原先分散居住，改爲集中居住，住到由於犯人減少而多餘的牢房，圍牆照舊，住的是原來犯人的監舍，只是沒有崗哨，晚上還要學習受訓好幾個小時。但躲過了社會上的鬥、批、改，有人說我們進了文革的避難所，但這卻是苦澀的“避難所”。在整個文革時期，除了“挖內人黨”時受批鬥外，我都是旁觀者。

當時勞改隊的幹部，大都是從部隊轉業的，大隊長以上的幹部都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

八路，文化水準雖低，但人品很好。就是這樣的幹部，文革中也被作為走資派批鬥。不久，公檢法實行軍管，派到保安沼地區的是瀋陽部隊，為首的是一個大家叫他劉政委的團級領導。原來的領導有些繼續受批鬥，大部分都靠邊站了。整個勞改農場，全部實行軍管了，就業人員受到更嚴格的管制。這批進入的軍管人員，除了不懂政策瞎指揮之外，其中有些人的人品也極差，為首的那位劉政委，竟在那幾年姦污了多位女青年，後來只是調回部隊，也沒有聽說處理的下文。

就業人員不准參加文化大革命，但生活檢討會批鬥會也是經常召開的，不過不是革命群眾鬥四類份子，而是讓這些人相互自鬥，“積極的”鬥“落後的”，我因平時不和他們工作生活在一起，雖然必須參加這些批鬥會，但與我無關。可是內蒙古的“挖內人黨”卻把我也捲進去了。

我過去從未聽說有一個叫“內人黨”的黨派，1968年開始在幹部中挖“新內人黨”，我才聽說這個名詞，原來內人黨的全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於1947年，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二年就成立了，是共產黨人烏蘭夫領導下成立的，首府設在烏蘭浩特，區域相當於現在的內蒙古的東部地區。原來在1947年之前的確有一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反蔣但搞內蒙獨立的，這就是所謂“舊內人黨”，內蒙古政府成立後就不存在了。（不知是否被取締？）文革中挖新內人黨是臆想出來的。挖新內人黨運動開始，聲勢兇猛，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殘酷的迫害，我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詳細情況不太清楚。《炎黃春秋》2009年第一期有一篇哈斯格爾勒寫的《“內人黨”冤案親歷記》，作者成為重殘，可見當時的一般情況。我所在的紙廠廠長，被打斷了二根肋骨那是親睹的。這次“挖內人黨”運動，受害最深的是廣大蒙族人士和老幹部，其危害之大，官方公佈的數字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的起訴書所指控：“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6000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而民間統計致死4萬多人，傷殘人數為14萬多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數大約70萬。不管用那一種數字，後果都是很嚴重的。事後把責任推到江青和康生的身上，因為1968年2月4日，內蒙革委會主任滕海清向之彙報準備挖內人黨得到首肯，康生還指示：“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有了江青和康生的首肯和指示，內蒙古的挖內人黨運動，就大張旗鼓地張開了。

因為我是漢人，從來沒有聽說過內人黨，又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階級敵人”，所以對挖內人黨並不關心，自認與己無關，只是冷眼旁觀。但到了1969年3月，正是天天播放“滿懷激情迎九大”的時間，即“九大”召開之前，突然叫我帶行李去參加學習班。全班有就業人員十五、六人，大部分都是原來領導所重用的人，有土木工程、水利、機械、電機等工程技術人員。勞改隊的領導對待使用的就業人員，在政治上無意或者無力改變這些人的身份，但在經濟上給這些人較高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領導被打成走資派，在挖內人黨運動中又被打成內人黨，於是把我們這些被重用而不參加體力勞動且給以高工資待遇的人，視為可能是被發展成內人黨，成為挖肅的對象。學習班設在原來的監房的一間大屋內，兩張大土炕睡十五六個人。開始學習《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接著要我們交待“內人黨”問題。先文鬥後武鬥。挖內人黨運動是由軍管人員領導的，當時已進入中後期，各單位似乎都在比賽挖內人黨的成績，都要儘量多挖以顯成績。我們這些人被鬥得沒有辦法只得承認自己是“內人黨”，因為我們這些人頭上已經有多頂帽子，再加一頂內人黨的帽子也無所謂，可承認後就要交待是誰發展的，又發展了那些人。對於是誰發展的問題，大都說一個已經被打成內人黨的原領導人，當我承認是內人黨後，追問是誰發展，怎樣發展的，我說是原領導蒙古人畢力格圖發展的，方式是他對我說：“好好幹，努力爭取。”荒唐到這樣一句勞改幹部鼓勵犯人的最普通的話，都變成介紹加入內人黨的方式。承認自己是內人黨之後最困難的要交待發展了多少人。我們一起被鬥的一位電氣工程師張君（我們過去在一起工作時都叫他老張，現

在名字想不起了)，廣東人，曾為農場的水電站建設作去很大的貢獻，被鬥得承認自己是內人黨，當天會上掌管的幹部說，張某承認加入內人黨，但不肯交待發展了那些人，嚇唬他晚上好好思想鬥爭，明天繼續交代。第二天早上起床，發現老張不見了，逃跑了嗎？幹部派人去尋找，到下午聽說一個抓魚人在水閘閘門啓閉室發現一個上吊的人，原來正是老張。晚上幹部召開就業人員大會宣佈，張某抗拒坦白，死有餘辜，一口棺材都不給的。（農場沒有火化場，死後都是薄棺土葬。）

過了幾天，批鬥會的緊張程度似乎放鬆了，改批鬥為學習，又過了幾天，宣佈學習班結束，大家回到原工作地方。隨後聽說，中央叫停“挖內人黨”，後來幹部中宣佈給打成內人黨的人一律平反。領導挖內人黨的軍管人員調走了，換了一批軍管人員。但我們十五六個被打成內人黨的刑滿就業人員，而且還死了一個人，始終不給一個說法，當我們一再追問後，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們交待的內人黨問題一律作廢。就這樣，我們被莫名其妙地、糊裡糊塗地當上了“內人黨”，最後還是不給說明白的不了了之。

老張死得真太冤了。

[插曲]本來不想再寫了，可是對後來發生的一件事還想寫上幾句。

多年後，已經是鄧小平掌權的時代，軍管部隊調走了，農場領導也已換了。有一天農場的場長找我們十幾個被挖內人黨而尚在的人，詢問被挖內人黨運動中被逼自殺的張君的遺骨下落，我們說，老張死後我們是“死未見屍”，怎樣知道其下落呢？

事隔那麼多年，為什麼還要追查這件事？原來老張以反革命罪判刑後，妻子迫於形勢與之離婚，但沒有再婚，後來移居加拿大。文革結束後她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得到丈夫的骨灰。此信批轉到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再經層層批轉，最後轉到勞改農場，於是才有場長找我們之事。但我們實在無法知道情況，場長為此發愁，因為鄧辦批轉的信他不敢不辦，後來有人建議他去找當年埋葬的人，找到後一問，也說當年只是用破蓆一卷挖坑埋的，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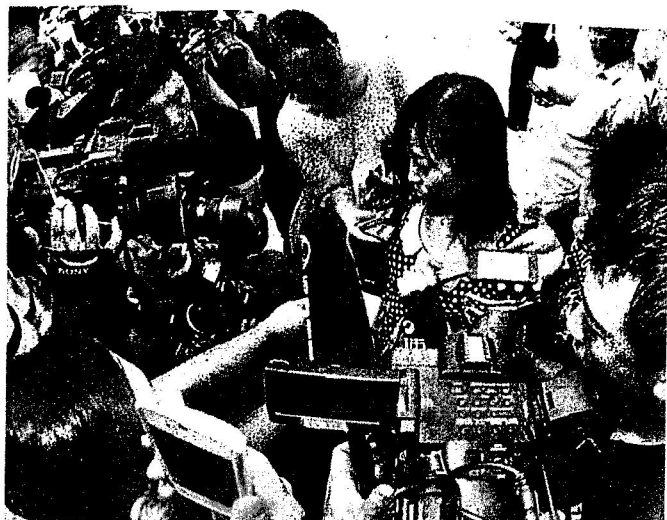
找到了。情急之下，一位高人出了一個“高招”，暗示埋葬人隨便去挖一具屍骨拿去火化，然後寫一份證言。於是他領幾個場部的人到亂墳崗，裝模作樣地一番尋找，居然挖出來“真正的老張遺骨”，用卡車送到七八十里之外有火葬場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火化，買了一個漂亮的骨灰盒裝上，最後連同火化證等寄給加拿大老張的妻子。至於老張妻子收到後如何痛哭，及隨後如何置墓埋葬，我就不清楚了。

由此我想起多年前從一本雜誌上讀過一篇介紹瞿秋白遺骨發現的文章，配有楊之華痛哭和一具排成人形的屍骨的照片，也說是埋葬人找到的，還編了一個埋葬人當年拿一個磚頭給瞿秋白當枕頭的故事。這難道是真的瞿秋白的遺骨嗎？後來火化後在八寶山修了瞿秋白墓，文革中瞿秋白被打成叛徒，瞿墓也被毀了。去年還在一本雜誌上讀到一篇保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國家領導人骨灰的文章，作者記述冒險保存的經過。後來另一人著文說是他保存的，爭功吵起來了。這些褻瀆死人的鬧劇何時休呢？

2011年2月



唐慧為女兒上訪多年，後又被處以勞教。圖為今年4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唐留在法院流淚哭泣。（資料圖片）



唐慧案獲得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圖為7月15日唐慧行政訴訟勝訴，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在法院外被追訪。（資料圖片）

重慶托派組織略記

熊安東

“抗戰爆發後，閻子桂曾把一大批流亡內地的山東學生拉到托派組織。”（唐寶林《中國托派史》214頁）

“四川的托派組織也有相當的發展，復刊了機關報《電光》。”（唐寶林《中國托派史》214頁）

一九八六年，梁貽在香港出版《回顧》一書中，記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西安沿川陝公路步行進四川，走到羅江，“見了閻子桂”，“和子桂盤桓了一天”（當時閻子桂是國立六中四分校的教員），“他在學生中有了信仰，已經謹慎地建立了（托派）組織。”“我倆有同一觀點：學生一定要進工廠，不經過鍛煉是靠不住的。”（梁貽《回顧》62頁）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產生了托派組織，可以說是梁貽和閻子桂兩個人做起來的。閻子桂在國立六中四分校影響發展了五十多名托派思想的學生，梁貽先到重慶進工廠，然後把陸續到重慶的托派學生引進工廠做工，實踐他同閻子桂的“同一觀點”。

梁貽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了重慶，經熟人介紹，到距市區四十多里的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電燈房幹了三個多月後，又考取了金陵大學電機系開辦的電氣訓練班，校址在曾家岩，對面是重慶電力公司。梁貽在製呢廠時結識的青年工人師傅劉振基已轉到了電力公司，兩人朝夕相處，受他影響，劉振基成了托派成員。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十二月，第一批托派學生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尹純德、張聖時、楊承章等先後到了重慶，他們大多數進入工廠當工人。楊壽元先進益世報印刷廠學排字，後進二十一兵工廠技術學校；孟憲章進二十一兵工廠步槍廠學徒工；孫鴻智進二十一兵工廠當鍛工，因不能適應鍛工工人生活，又回到了學校讀書。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後，第二批真理讀書會員到了重慶。他們是劉志超、蘇學常、范文華、任玉璽、康至全、劉廣恩、趙盛文、曹慶華、劉恒新、郭桓參、陳汝霖、牟家義等十多人。

劉志超進南方印書廠排字工；蘇學常南岸織布廠工人；劉恒新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劉廣恩軍政部製呢廠；康至全公共汽車司機；曹慶華公共汽車售票員；趙盛文郭家沱五十兵工廠勤雜工；任玉璽南岸沱精廠。

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後，第三批會員到了重慶，他們是單才、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隗寬、趙風田、王學誠、李廣智、蔣復學、李雨亭等十多人。單才江北鐵廠掄大錘；單松岑江北鐵廠鍛冶工；王香臣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工；張洪仁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工；杜文林南方印刷廠學徒工；王學誠、李廣智、蔣復學三位會員因沒有及時找到工作，流落街頭，夜宿嘉陵江岸邊的廢棄船上，都死於霍亂。

大批托派學生進工廠當工人，梁貽策劃着要成立個核心領導小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重慶兩地通航通郵，經上海托派組織介紹，梁貽與在重慶的張維良取到聯系。張維良在施復亮開的南方書店當伙記，幫施復亮主持南方書店業務。由於張維良的關係，劉志超和杜文林先後進入南方印刷廠。一九四〇年底，梁貽與在部隊上當排長的趙芳舉取得聯系後，趙芳舉脫離部隊，考入重慶電力公司當職員。趙芳舉，山東青州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山東讀師範學校時參加入托派，與梁貽是同一時代的一代托派，他們參加托派時，正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指令下，執行左傾冒險政策時。

一九四〇年九月，梁貽離開金大電訓班到五十兵工廠電氣間當電燈工。五十兵工廠位於長江邊的郭家沱。輪船從朝天門碼頭下行一小時的路程。每逢星期日，梁貽都到重慶與劉振基、張維良及六中學生范文華等聚會。

范文華是受閻子桂影響較早的學生之一，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與同班同學孟憲章發起組織“真理讀書會”。他曾被選為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因向校方交涉解決學生的生活福利問題，他脾氣暴躁，與總務主任發生爭吵，被校方開除，後改為記大過一次。一九四

〇年暑假他離校去了重慶。梁貽在《回顧》中寫到“羅江來了個首座學生，老范(范文華)，長清人，大臉盤，大眼睛，能讀書，能講話，能打架，便由他擔任聯絡安排六中來的學生，他暫不進廠。”（《回顧》72頁），三個“能”字把范文華的特點說齊了。在五十多名真理讀書會員的心目中，他是最信得過的，都敬重他，他熟讀列寧選集(共十二卷，只買到九卷)。他到重慶後，就成了梁貽的副手，專職跑組織聯絡工作。他也是後期重慶托派組織領導人之一，化名艾夫。在重慶托派組織中，只有他一個人始終脫產的，他的生活費用和有限的活動費用，全靠在校的同學支持。

一九四一年初，王振華到了重慶。王振華又名王叔本，據說他崇敬叔本華而取此名，“樹本”是他人誤聽傳訛。東北哈爾濱人，“九一八”事變後到北平，在大學讀書時，參加了陳獨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一九三二年陳獨秀被捕後，上海的托派臨委會屢遭破壞，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的托派大學生王叔本、劉家良、斯朝生、扈文煥到了上海，奪了上海托派臨委會的權，成立托派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們將陳獨秀領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表示托派不再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派，而是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黨。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們被國民黨逮捕，判刑後關押南京軍人監獄。他們定名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卻一直延用了下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他們和其他政治犯同時獲釋，王叔本回到上海，以後又去了香港，一九四〇年，他回到上海，在抗日戰爭的認識問題上、組織原則問題上，他同當時上海托派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的編委們發生意見分歧，爭執過程中，編委們借他犯了組織性的過錯而將其開除(關於他被開除事，在下一節中再談)。他被開除後，回到香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內地廣西，暫住女友黎潔霜家，他的女友在香港做工時受他影響而參加了托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從廣西到了重慶，由他大學同學介紹進入《益世報》社做夜班校對工作。同時與梁貽接上了頭，他們在北平時就相識。梁貽佑道他理論水平高，會寫文章，就讓他主編機關報《工人呼聲》，並讓他負責指導二十一兵

工廠的工作，那裡有十多名托派學生在廠裡做工，是重慶托派組織活動的一個重點。他被上海托派中央革出教門，到了抗日戰爭的首都重慶，意想不到地又被拉進托派組織，主編機關刊物《工人呼聲》，又直接指導一群熱情有餘，政治經驗不足的托派學生，他的興奮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到一九四一年春節為止，在重慶由梁貽聚攏起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老人”有梁貽、張維良、王振華、趙芳舉、閔子桂等人。

梁貽-----是六中托派學生在重慶的組織者。

王振華-----《工人呼聲》的主編和各種傳單的編寫者。

趙芳舉-----《工人呼聲》的刻印和發行。

張維良-----經濟支援和介紹會員進廠。

閔子桂-----是六中托派學生的啓蒙老師。

劉振基-----是梁貽到重慶後首先影響發展的一位工人師傅，負責財務保管工作。

以上這些人都有工作，星期日他們才能有時閒聚會。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前的重慶托派組織最活躍時期。有了組織刊物《工人呼聲》，分散在十多家工廠裡做工的托派學生可以用來擴散托派思想進行宣傳活動。由於米價暴漲，各工廠裡的工人，常為要求增加工資和米貼而舉行罷工，王振華根據各廠反映來的情況，及時印發傳單，為工人寫出心中的訴求。在工廠裡的工人中發展了托派成員，如劉毅原是江北鐵廠工人，他在工人罷工中很積極，他把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思想告訴了在那廠裡的托派學生，然後由王振華整理成宣傳文字寫成傳單散發，劉毅受到了思想影響而成了托派成員。抗戰結束後他到上海參加了彭述之的建黨大會。在電力公司的劉振基影響發展了黎昌堃和劉有綬成為托派成員；孟憲章在二十一兵工廠影響發展了技工白玉璽成為托派。只有二百多工人的磁器口製呢廠的托派學生劉廣恩等領導該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米貼的罷工鬥爭取得勝利，工人們給他披紅綢，戴紅花，共同慶賀。

曾在二十一兵工廠做工的孟憲章，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和二十九日寫給李雨亭的信中回憶說：“王振華定時到二十一兵工廠來，

給我們講革命理論，佈置工作，……多數是在臨江門對面的嘉陵江岸邊的沙灘上，邊走邊談。”“有一次天黑了，王振華就在陳家館街我租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機放在我的住處。”

王振華初到重慶與梁貽接上頭時，梁貽尚不知王振華被上海托派中央開除的事。大概五月前後，梁貽和張維良才得到上海托派中央和香港托派組織的通知，雖沒有言明開除的內情，但他們絕對相信中央的決定。他們已經把王振華拉進組織，主編機關報。“我們正需要一個這樣角色(指王振華理論水平高，能寫文章)只要他講的是革命的語言，就不必信什麼叛徒了。”(《回顧》74頁)這些話表明他們處於兩難的心理矛盾中。

王振華主編《工人呼聲》後，繼續宣傳陳獨秀的十項抗戰主張，又加大了對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力度。在各工廠裡的托派學生們，初出茅廬，工作熱情大，政治經驗差，不知如何掩護自己。梁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他已預感到隱藏着的危機。他向托派學生們提議：“我們的(宣傳)印刷品暫停散發”(《回顧》73頁)，還說：話說冒失了，可以不認賬，白紙黑字落到特務手裡，就要麻煩了！”(《回顧》73頁)這群爲了信仰、追求真理而進入工廠當工人的孟浪青年人，像初生牛犢不懼虎，對梁貽的意見聽不進，還責怪梁貽是“取消主義”。

“面對組織的危機，卻無法喚醒他們的注意，李申(趙盛文，與梁貽同在五十兵工廠的六中托派學生)和我談話的機會最多，卻也難說服他”(《回顧》75頁)。

“記得大概是從六月末起，碰頭會只有梁貽、張維良、劉振基三人在另處召開，不讓王振華和我兩人參加。”(趙芳舉《夕陽憶語》68頁)

“《工人呼聲》第四期記得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這一期王振華的文章，被梁貽和劉振基扣留不予刊登的”(《夕陽憶語》61頁)“這種情況，我向王振華談過，他不願多談，似有難言之隱。”(《夕陽憶語》75頁)“王振華沒有多談這方面的話，但仍然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之間確有一定的分歧，當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夕陽憶語》69頁)。趙芳舉還有一種說法：“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從這時

起，王振華被剝奪了《工人呼聲》的主筆、主編任務，我也同時被免除了對《工人呼聲》的刻印、發行工作。從此，把王振華和我排除在組織之外，成了‘編外人員’。”(《夕陽憶語》114頁)。

從趙芳舉的這些回憶的隻言片語中，可以判斷，一九四一年五月，梁貽和張維良得知上海托派中央開除了王振華的通知後，梁貽開始做了些疏遠王振華的舉措。而王振華明白梁貽只能相信托派中央的，不會聽他的任何辯解，正如趙芳舉回憶的：“他不願多談，似有難言之隱”。

梁貽也明白，王振華的理論水平高，工作經驗和組織能力都比自己強，且已取得了眾多托派學生的信任，而這群學生都是讀了馬恩列托的理論書，信仰了馬恩列托的學說是真理，才走進工廠當工人的，他們都能獨立思考，不會盲目崇信任何個人。

“我得離開這裡，到哪裡去呢？”(《回顧》75頁)，梁貽遇到困難產生這種想法是符合他的性格、脾氣和一貫作風的，他曾多次在一個地方活動一陣子，呆不下去了，挪一個窩，一走了之。立即寫信給在江蘇烏江私立爲群小學的張立民，他們是在山東時相知的老朋友。得到張立民的回信後，梁貽決定離開重慶去烏江。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農曆八月十八日，蔣黨特務先走了一步，梁貽在五十兵工廠被逮捕。

在逮捕梁貽的同時，蔣黨特務對散布在各工廠裡的托派學生進行了大搜捕，楊壽元、張洪仁、任玉璽、杜文林、曹慶華等十多人先後被捕。這些托派學生大都被送到巴縣大興廠集中營——戰時青年訓導團。“皖南事變”被俘的新軍團級以下的部份幹部也送到那裡。

梁貽被捕後，在重慶兵工署督察處關押了一個月，逃出後去了雲南。上世紀90年代看到他寫的《回顧》，才知道了他逃跑的詳細經過。

范文華、蘇學常、王香臣、工人劉毅等人先後逃到貴州遵義。

李雨亭、郭桓參、劉恒新等逃離重慶，去了成都。

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室的老工程師沈正功，大學畢業，機械專家，他同情工人，痛恨

胡作非爲的駐廠特務，知道特務要到工廠捕人，他馬上通知王香臣走人，並脫下自己的西裝給王香臣化裝出走。

孟憲章於一九九四年給李雨亭的信中回憶說：那天他不在工廠裡，沒有捕到他，過了兩天，王振華特地到他租住的地方。約定好於第二天把他送到長江南岸彈子石織布廠，暫時躲避了些日子，以後跟一位工人老師傅去樂山武漢大學校辦工廠做木模工。

一九四二年二月，蔣黨特務又對重慶托派組織進行第二次破壞，逮捕了重慶托派另一主要領導人王振華。他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次搜捕後離開《益世報》社轉移到華岩高等農校教書的。他的女友黎潔霜在江津白沙鎮國立女子師範，同時也被捕。

同一時期被捕的有電力公司工人劉振基和王坤榮，在南川飛機修配廠做雜務工的趙風田（趙金聲），他的被捕是因爲他身邊有兩本《列寧選集》引起駐廠特務注意而發生的。

經過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兩次搜捕破壞後，重慶托派初期組織五個核心人員中的梁貽、王振華、劉振基三人被逮捕，張維良躲藏起來，替梁貽跑組織聯絡工作的范文華也受到通緝而不得不逃到貴州。核心人員中只趙芳舉一人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仍然供職於電力公司。在他寫的《夕陽憶語》中，沒有記敘在兩次大搜捕時期，他做了那些相應的對策活動。

我在重慶時與趙芳舉始終沒有見過面，我是一九四四年春節後到重慶的。遭受蔣黨特務兩次搜捕破壞後，於一九四三年重新組建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領導核心中只有張維良是一位“老人”，其他都是托派學生。范文華和隗寬都曾與趙芳舉聯系過，希望他繼續參與領導工作，他表示不幹了。上世紀80年代，中六四川組織部門公佈被蔣黨特務殺害的王振華一家四口人的悲壯事蹟，並追認王振華夫婦爲革命烈士後，趙芳舉根據當時報紙上公佈的材料，結合他所知道的王振華情況，寫了綜合報導發表在《陳獨秀研究動態》上，我才開始與他通信多年。上世紀90年代初，他看到梁貽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回顧》，梁貽寫到：“文昇（趙芳舉）經由王平一給他辦了投降，保住了職業”（見《回顧》一〇三頁），一九九三年十二

月四日，趙芳舉寫封長信寄我，對梁貽的說法進行分析和辯駁。我曾將趙芳舉的信念給鄭超麟聽，問如何回信。鄭老說：梁貽已經去世了，無法由他本人來更正事實，趙芳舉可以寫一個簡單的說明，附在《回顧》後做爲一個附錄處理。我回信後，趙芳舉始終未按鄭老的要求寫個簡單的說明寄來。二〇〇五年五月，收到他那本在香港出版的《夕陽憶語》，才知道趙芳舉參加重慶托派組織活動，僅僅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事。他寫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夕陽憶語》一七五頁），他就被“傾軋排橋”出重慶托派組織而成了“編外人員”。一九四一年十月蔣黨特務大搜捕前三個月，他就離開重慶托派組織。《工人呼聲》的三個主要負責人，梁貽和王振華先後被捕，趙芳舉不幹了，未被捕。二〇〇四年十月，曹玉林編寫《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夕陽憶語》，還不知道《夕陽憶語》中所說的那麼多勾心鬥角的複雜情況。至於“消極不幹了”和“怕死不幹了”的說法，我還是看了《夕陽憶語》才知道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逃到貴州避難的范文華、蘇學常、劉毅、王香臣和他在貴州新婚的妻子楊大媛等五人回到重慶，找到了未被捕仍然堅持下來的單松岑、隗寬、劉志超、康至全、尹純德以及被捕半年後釋放的劉振基等，他們聯系了托派“老人”張維良和同情者史逸民。范文華和隗寬先後去聯系趙芳舉，希望他參與領導工作，他表示不幹了。

一九四三年恢復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首先打聽、聯系走散人員和被捕人員的下落和情況，繼之，出了內部油印刊物《電光》，由范文華負責刻印。

一九四三年後，在成都也有好幾個人在那裡活動，他們是：考取四川大學的楊承志，在一家教會辦的醫院養肺病的王元勳，一九四一年十月遭蔣黨特務破壞時從重慶逃到成都的李雨亭、郭桓參、劉恒新等，趙風田於一九四三年獲釋後也去了成都。他們幾個人在四川大學貼出牆報，散發傳單等活動。

一九四四年春節過後，我和曹玉林、王春祿、刁長堯等到重慶時，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四川地委會已恢復得初具規模，主要成員是：范文華、隗寬、蘇學常、劉毅、劉振基、劉志超，

“老人”張維良作財務供應，不出面做具體工作，由劉志超與之聯系。一九五四年法院判決書稱張維良是：“渝地托匪最高組織的領導人和幕後指揮者”云云。我在重慶時，對於他們幾個人的具體分工情況是不知道的，也不便多問，經常與我聯系的是范文華和隗寬。

隗寬於一九四一年秋到重慶時，他找到了在濟南讀小學時的美術老師張寧宇，是位會繪畫、會吹笙、會吹笛、會拉胡琴的人，在戰地服務團的巡回演出隊工作。經張寧宇的介紹，隗寬到中法大藥房當職工站櫃台。他與組織還沒正式聯系上，組織遭到破壞，他躲過了十月那次大搜捕。一九四三年組織恢復後，他離開中法大藥房到南岸彈子石軍政部紡織廠的附屬碾米車間當磨工，這個碾米車間一方面碾米供應本廠職工食用還磨面粉主要供應紡織工業用。

另一個主要負責人范文華仍然脫職專門做組織聯絡工作，他住在兩路口到菜園壩的復興街，是一條沿着山坡蓋的貧民區，很多房屋都是吊腳樓式竹木茅棚。范文華住的那間屋子我曾去看過，不遠處就是個大糞坑。

我和曹毓林、刁長堯、王春祿等到重慶後，曹毓林住到范文華那裡，幫助范文華編寫和刻印《電光》。刁長堯由他的一位小同鄉介紹到中華書局做文書，王春祿考取郵電局在南岸郵局工作。我由我父親的好友介紹到較場口社會部工人福利社管理文娛室。這個工人福利社是美國產聯——勞聯兩個工會出錢委托國民黨政府社會部代辦的，表示它們支持中國抗日戰爭，幫助國民黨政府做點社會福利事業。文娛室裡主要有包括《新華日報》在內的重慶全市各報社的報紙各兩份，是附近市民的閱報室，還有象棋、圍棋、撲克牌等，沒有麻將牌，因為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禁止打麻將賭錢。

一九四四年暑假，曹毓林考取了浙江大學，由於重慶組織工作需要，他休學一年，留在重慶協助范文華編寫和刻印《電光》和傳單。我曾陪同曹毓林到離市區二十多里路的沙坪壩散發過一次傳單，那裡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高職、中央劇專、美專等，還有幾所中學。他做事老到，向牆上貼傳單不是把漿糊刷在牆上，而是先把傳單平鋪在我的背上，

用手把漿糊塗在傳單上，讓我後退，背緊靠上牆，趁無人注意，我們迅速離開，傳單就被我用背擠貼在那裡了。我們走進中央大學的學生分信室，他很熟敏地把宣傳品投入有報刊的信箱裡。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節過後，重慶發生了“胡世合事件”。重慶警察局長唐毅的拜把兄弟田凱(田土興)是軍統特務，他們一伙人開的一家餐廳私搭電線偷電被人檢舉，重慶電力公司派用戶股領班劉振基和電工胡世合等人前去查看，索賠罰款，特務恃勢不認賬，電工們按規定要剪斷其供電線路，受到餐廳方面的阻攔，在混亂中，田凱開槍打死胡世合。震怒了電力公司及其三個發電廠的一千多職工，數百工人手持工具到蒼坪街(今邹容路)，把餐廳門窗和廳內的物品統統砸掉。警察局長唐毅包庇田凱，指責工人聚眾鬧事，下令警察捉捕工人。劉振基和電力公司職工把胡世合的遺體安置在餐廳的正堂，從事件發生第二天的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七)至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十)的三天裡，餐廳的牆上掛滿了市民和各工廠送的輓聯。《新華日報》全體職工也送了輓聯：“特務橫行何處去，自由光明幾時來”。艱苦的八年抗戰中，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囤積居奇，米價不斷暴漲，民眾生活苦不堪言，工廠工人要求加工資和米貼，常遭受駐廠特務的鎮壓迫害，特務的橫行霸道，積壓在民眾心頭的不滿和憤怒像一堆乾柴，特務槍殺工人胡世合，又像是一根引火棒，重慶市全市工人醞釀着一場總罷工。市長賀耀組由於職務工作關係，常與中共人士和民主人士接觸，思想不太頑固，頭腦清醒，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二十三日(正月十一)向上滙報請示，蔣介石是個政治老手，立即做出“處決田凱，平息民憤”的決定。二十五日(正月十三)處決田凱後，重慶市政府也送了輓聯。劉振基和電力公司職工在市民的支持下，把胡世合的遺體從餐廳移到通往朝天門的古剎長安寺內，設靈堂公祭三天，有數萬人前往吊唁。

胡世合事件發生時，我正在江津白沙鎮大學先修班復習功課準備考大學。從胡世合被殺害的二月十九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公祭結束的十天裡，重慶的《新民報》、《新華日報》等報紙，對事件的進展情況，都逐日報導。暑假

我回到重慶後，才知道重慶托派組織積極參與了這一事件，范文華和曹毓林多次到現場與劉振基 聯系，瞭解情況，編印隗寬寫的傳單，劉志超及時散發，把反對偷電的鬥爭引向反特鬥爭，起了重要酵母作用。劉振基是重慶托派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他始終處於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上。

爲形勢逼迫，蔣介石不得不處決田凱，特務的拜把兄弟們，兔死狐悲，無可奈何。整整過了四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重慶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監獄裡，特務楊進興(綽號猩猩)槍殺托派王振華一家四口，連一個兩歲和一個一歲不到的兩名幼兒(被難友稱爲“獄中之花”)也不放過，殘忍兇狠，爲其拜把兄弟報仇泄恨！(楊進興於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五八年處決)。

一九四三年恢復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調整了部署，堅持城市產業工人工作之外，爲擴大社會各階層的影響作準備，部份人員考進高等院校。楊承志四川大學，劉恒新武漢大學，張聖時和熊安東中央大學，尹純德和牟家義西南聯大，張洪仁東北大學，曹毓林浙江大學，楊壽元山東大學，杜文林復旦大學，王香臣重慶教育學院。以上九所高等院校，除四川大學和重慶教育學院，其他高校於一九四六年復員，分別遷回到南京、上海、北平、杭州、沈陽和青島。國共兩黨內戰時期，他們分別參加了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手裡都握住槍桿子的國共兩黨和平建國談判開場。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也影響到中央大學的校園裡，我旋進了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中(另一章節講)。寒假我回到市區，見到了范文華、隗寬和蘇學常，從他們那裡知道，張維良已與上海托派中央聯系了，上海托派中央分裂成了兩個派別，先收到少數派意因(鄭超麟)的親筆信，問重慶組織是少數派還是多數派；又收多數派歐伯(彭述之)的親筆信，也是問重慶組織是少數派還是多數派。隗寬執筆回信：四川組織不分派別，希望知道上海中央兩派的政治思想主張。分別收到了上海兩派的機關刊物《新旗》與《青年與婦女》(後改稱《新聲》)，僅從兩份刊物上看不出分裂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成兩個派別的原因。當時，四川的一批托派學生都很敬仰上海的幾位托派老人，希望能得到他們的直接領導。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大學提前停課放假，準備六月復員南京。離開重慶前，我到市區，只見到隗寬一人，蘇學常、范文華和劉毅三個人都已去上海。蘇學常有個比他大二十歲的大哥，上海郵政局工人，蘇學常由大哥撫養長大，他一定要去看望大哥。范文華是想親自瞭解上海托派中央爲啥要分成兩派。劉毅想回徐州老家看看，與范文華同行。他們三人都是四川地委會的主要成員，隗寬不同意他們三個人一齊離開，特別對范文華說：你到上海，只能以個人身份，不能用四川組織的名義。他們三個到上海後，蘇學常與劉毅就被多數派“爭取”，范文華被少數派“爭取”。人容易受宗派觀念支配，參加了多數派的說多數派好，參加少數派的說少數派好，重慶的隗寬還是不能明白上海分裂成兩派的原因。叫我復員南京後，一定要到上海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後寫信告訴他。

與隗寬同在南岸碾米車間的李績接受托派思想影響後，到化龍橋一家工廠當技工，在那裡影響發展了一個姓劉的和一個姓田的技工，姓劉的認識了豫豐紗廠一個姓高的女工，隗寬定時去同他們聯系。姓高的女工是四川人，原來在成都讀中學，初三時與幾個要好的同學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的文藝書，在學生中被視爲新派人物。校長要她們解散讀書會，要她們不要讀進步文藝書，她反駁了幾句，要求校長講明白爲什麼不准成立讀書會，爲什麼不准看進步文藝書？她闖禍了！學生竟敢反駁校長！有損師道尊嚴，勒令退學。她幼年時，父母包辦婚姻，給她與一個糧紳的兒子定了婚約。讀中學後，爲這婚約她常同父母爭吵。父親威脅她，只供她哥哥和弟弟唸書，不再供她唸書。學校不要她了，她決定離家出走。她讀過高爾基的書，她要學高爾基那樣地到社會上去闖。她給《新華日報》社寫信，訴說自己的遭遇，想到延安去學習，她沒有得到《新華日報》社的回信，那時正是第三國際宣佈解散後，國民黨反共喧囂時，在幾個要好的同學資助下，她到了重慶，考進了豫豐紗廠當工人。在廠裡她看到了些支持工人要求增加工

資，呼籲工人組織起來的傳單，知道這些傳單是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散發的，她以為找到共產黨了。她向隗寬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共產黨宣傳要為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呢？隗寬回答她：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能夠說明的。先要懂得馬克思列寧的基本理論，還要知道中國革命史，這個問題就會自然弄明白。她表示願意讀到這些方面的書，隗寬首先介紹她讀的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隗寬認為她對理論問題的理解能力很強。

隗寬告訴我，李績等人都是參加朱學範“勞動協會”的會員，她們大都是知識份子型的青年工人，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傾向共產黨的，李績因第三國際宣佈解散引起懷疑和失望，接受了托派思想影響。朱學範是當時一位有名的社會活動人士，他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制。重慶的“工人之家”是他開辦的，從事工人福利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慘案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王坤榮也是“勞動協會”會員。隗寬沒有向我提到王坤榮的名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新蜀報》上有隗寬以記者身份寫的“王榮坤小傳”，從這小傳的文字中，我推斷王坤榮和李績是同一時期接受托派思想影響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隨校復員南京後，七月到了上海，住蘇學常大哥蘇學志的家中。蘇大哥是位善良敦厚的老郵政工人，基本是文盲，一輩子就是在火車站接送郵件。我們從四川回來的托派學生就把他的家當成了聯絡站。因此，共產黨說他被托派利用了，始終沒有給他升級，他也不在乎。我被關管二十七年後，上世紀80年代初，我去看望他，他說：“你們是托拉機派還是托拉斯派，我也不明白”！他對我們這些人的遭遇不勝嘆息。

蘇學常和劉毅參加了彭述之的多數派，范文華參加了鄭超麟的少數派，他們三人在蘇大哥家常爭論不休。我請他們把一九四一年發生爭論導致分裂的文件要來給我看。冒着酷暑，我在蘇大哥家的閣樓上，整整一個星期看完了《校內生活》。

上海的幾位托派老人——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等，我雖未與三位見過面，但早已讀他們寫的文章和翻譯的書，思想受他們啓蒙，視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他們為老前輩，尊重敬仰。《校內生活》中，他們爭論的是兩個問題：中日戰爭性質問題和組織原則問題。中日戰爭性質問題實際是探討中國革命性質問題。

《校內生活》看完後，感到困惑不解，我總覺得爭論的雙方是在打抽象概念仗，同時夾雜些人身攻擊。作為晚輩，我不好理解。想不到事隔整整四十年後，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幾位老人家還在爭吵打架，我感到無奈！

一九四七年暑假後，范文華回了一趟山東老家，把他妻子和兒子從種的幾畝棉花地裡拾的棉花賣掉當盤纏回到南京，乘民生公司江輪去四川，他想去爭取些人參加少數派。唐寶林《中國托派史》377頁“附錄”《電光》上“艾夫”即范文華，他爭取了那幾個人，我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春節我來上海時，劉毅告訴我，隗寬已表示參加多數派。彭述之召開建黨大會時，劉毅代表隗寬出席，彭述之打算把隗寬調上海工作。建黨會後，割斷了我與隗寬橫的關係，由劉毅代表中央與他聯系，一九五〇年劉毅去香港後，大概一直聯系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為止。

四川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的，解放前後，重慶的托派組織活動情況，劉志超於一九九四年給李雨亭的信中說托派組織與中共地下組織是聯合行動對敵鬥爭的。如何聯合行動？根據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對反革命犯張維良的判決”書中，有一段反說的文字記述：“臨解放時與隗匪寬等積極策謀應變計劃，偽裝積極，爭取群眾，假借護廠為名，欺騙工人，組織工人，暗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如何“策謀應變計劃”的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四川《新蜀報》上有隗寬以記者名義寫的被蔣黨殺害的趙金聲（小傳），其中一段文字；“他曾組織‘勞動者社’，主編‘勞動者’，為擴大工人階級的團結，去年底籌組‘重慶工人聯合會’，創辦‘工聯報’，展開工人如何‘應變’和‘保護工廠’‘保護機器’的宣傳和鼓動，以迄被蔣黨西南公署第二處逮捕為止。”在為被殺害的王坤榮《小傳》中，隗寬寫道：“王君為擴大無產階級的團結，去年冬季組‘重慶三八聯合會’，創辦‘工聯報’，展開討論工人如何

‘應變’和‘保護工廠’‘保護機器’的問題，不幸於六月間第二次被捕……”

隗寬以記者身份只能把托派組織的“應變計劃”寫成個人的主張和行為加以宣傳報導。

人民解放軍攻克重慶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蔣黨特務在歌樂山下，對三百多名中共人士和其他革命人士進行了大屠殺。托派領導人王振華夫婦和兩個幼兒，一家四口慘遭滅門殺害，是蔣黨特務殺害政治犯暴行之最。同時遇害的還有工人王坤榮和托派學生趙金生。

蘇學常於一九四六年離開重慶到上海，參加了彭述之的多數派，一九四八年彭述之建黨後，蘇學常改名蘇濤，奉派去台灣開拓托派組織活動，一九五〇年被蔣黨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范文華於一九四六年離開重慶去上海，參加了鄭超麟的少數派，後回四川又去北方活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網打盡”，在山東被捕，判處無期徒刑，瘋癲於勞改農場。

張維良的判決書上，定性為“渝地托派組織的幕後首領和指揮者”判刑十二年，押送西昌以西某礦山勞改工地，死於工地。四十年後，他的兒子曾去工地查找，檔案材料中只查詢到姓名，遺骨遺物無處尋覓。

隗寬被定性為“渝地托匪首要份子”。與他同時被捕的劉志超和康至全等回憶說，隗寬在看守所裡給其他犯人教唱革命歌曲，由此說明隗寬在獄中的心情和生活態度都達觀，不消沉，曾在松山勞改農場勞改。上世紀90年代，他的侄兒從濟南給我的信中說：一九六二年之前，家人曾知道他關押在重慶，曾寄去衣物，一九六二年後，音信全無。

關於趙芳舉，我還要多講幾句。重慶托派組織從一九三九年底算起，到一九五二年底為止，共存在過十三年整。趙芳舉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組織核心小組中幹過半年，負責《工人呼聲》的刻印工作，他的字跡工整。一九四一年十月，組織遭蔣黨特務第一次破壞前，他不幹了。在蔣黨政權下，他未受逮捕之苦，但在中共政權下，他未躲過“一網打盡”之劫，幸好他有不幹了的歷史，只網了一下，經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年餘的“學習教育”，無罪釋放。一個不幹托派的托派，又不是右派的右派，在無情的歷史浪濤中苦掙扎了二十多年，晚年把“我的托派生涯”寫成《夕陽憶語》一書，文如其人，從《夕陽憶語》看他的為人處世的態度，有幾分像魯迅筆下介紹浙江地方戲中的二丑。

我還要寫一寫閔子桂和梁貽的下落，做為記敘重慶托派組織始末的結束語。

閔子桂是三十多名到重慶進工廠當工人的托派學生的啓蒙老師，一九四一年十月，重慶托派組織遭蔣黨特務破壞後，他離開重慶去西安軍校執教，他的學生們很不理解，認為避難也不應去蔣黨軍校執教，一九四六年，曹玉林隨校復員路經西安時，曾當面向他講述學生們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他考取公費留學，去美國攻讀經濟學，以後流落海外。上世紀80年代初，從梁貽那裡聞知閔子桂晚年困居台灣，受當局監視。

梁貽，是托派學生進工廠當工人的組織者，一九四一年十月被蔣黨特務逮捕，逃脫後遠去雲南西雙版納與老撾交界的勐腊，呆到抗戰結束，回到上海，參加鄭超麟和王凡西的少數派，自稱“做一粒鋪路的石子”，上世紀80年代末，因車禍死於香港。



王振華、黎潔霜夫婦

熊安東

王振華又名王叔本(樹本)，東北哈爾濱人，“九·一八”事變後入關，北京大學讀經濟系，在反日反國民黨的左傾學生運動中，參加了陳獨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被捕後，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陷於散漫分裂狀態，三次組成臨委會又三次遭破壞。一九四六年六月，四個北平激進托派學生到了上海，他們是斯朝生、劉家良、王叔本、扈文章，他們推開“老人”陳其昌、尹寬，組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又將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以示不再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派，而是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黨。三月，斯、劉、王、扈被逮捕，判刑後關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劉七年，其餘三人各五年。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們與其他政治犯同時提前釋放，扈文章去了東北，斯朝生去了武漢，劉家良和王振華回到上海，王振華去了香港，他們分別在滬港兩地從事托派組織活動。一九四零年，滬港兩地因對組織原則發生意見分歧，王振華回滬與《鬥爭》編委(編委代行中共同盟中央職位)彭述之、陳其昌、王文元、劉家良、樓國華、鄭超麟等爭論，一時爭論不出結果。久住，王振華生活無法解決，因為編委們都是靠賣稿維持個人生活。王振華要求組織給他買張船票回香港，編委們沒人答理。因此，他向蔣振東講：特務盯上他，與特務周旋甩不掉。《鬥爭》編委們恐慌起來，命蔣振東速買船票給他送去，他又向蔣振東講了實話。《鬥爭》編委們很氣憤，一致認為王振華嚴重違反了組織紀律，決定開除。上世紀80年代，鄭超麟向我講述這段故事時，曾表示說：當時做出開除的決定是有點過份的。同時也告訴我，當時王振華對抗日戰爭的看法是傾向陳獨秀的觀點，而《鬥爭》編委們沒有人同意陳獨秀的觀點。

王振華回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廣西，暫住女友黎潔霜家。一九四一年初，王振華到了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由大學時的同學介紹到《益世報》做校對工作，解決了生活問題。同

時與已在重慶開展托派組織活動的梁貽接上頭，梁貽為籌劃出宣傳刊物《工人呼聲》，正愁缺一位有理論功底、有寫作水平的人，王振華正是他需要的，在北平時，梁貽就同王振華相識，且知王振華的組織活動能力強，立即命王振華負責主編《工人呼聲》，同時把21兵工廠當工人的十多位托派學生交王振華聯繫。

王振華負責主編《工人呼聲》後，除了宣傳陳獨秀的十項抗戰主張，加大了對蔣黨政府的批評力度，批評蔣黨政府對日消極應戰錯誤政策，反對蔣黨借口抗戰任意剝削工人，使之不能維持最低的悲慘生活。

王振華勤於到各工廠去聯系做工的托派學生們。曾在21兵工廠做工的孟憲章，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寫的信回憶說：“王振華定時到21兵工廠來，給我講革命理論，佈置工作，多數是在臨江門對面嘉陵江的沙灘，邊走邊談。”

“有一次天黑了，王振華就在陳家館街我租的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機放在我的住處。”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重慶地區托派初期組織最活躍時期。從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夏，國立六中托派思想的學生，先後三批到重慶進入工廠當工人，共約三十多人，都是為了信仰，為了真理而走向社會實踐孟浪青年人，活動熱情有餘，政治經驗嚴重不足。王振華被上海托派中央開除來到抗戰的大後方，遇到這群有思想有抱負青年，精神為之一振，何嘗不想好好幹一番事業。

一九四一年初，他剛到重慶時，梁貽尚不知他被上海托派中央開除的事，就把他拉進自己的組織中，而他又無法向梁貽說明被開除的底細。大約五月間，梁貽得到滬港方面的通知，梁貽既要聽托派中央的，又無法一下子把王振華推開去，同時，對這群思想激進的青年學生又失去了掌控信心，從他寫的《回顧》中可知他感到組織危機，打算離開重慶。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農曆八月十八日，蔣黨特務對重慶托派組織進行了第一次大搜捕，在五十兵工廠的梁貽被捕，在二十一兵工

廠和其他工廠的十多名托派學生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廠的孟憲章沒有被捕，一九九四年四月，孟憲章的信上回憶：那天他不在工廠裡，所以沒有拘捕他，過了兩天，王振華特地到他住的地方通知他，次日送他到長江南岸彈子石織布廠暫住，日後跟一位工人老師傅去樂山武漢大學校辦工廠當木模工。

第一次大搜捕後，王振華離開《益世報》社轉到華岩高級農校教書。一九四二年二月，蔣黨特務又對重慶托派組織進行了第二次搜捕，王振華在華岩農校被捕，他的女友黎潔霜在江津白沙鎮國立女子師範被捕。同一時期被捕的有電力公司的劉振基和王坤榮，南川飛機修配廠的趙風田(趙金生)。

一九四三年，王振華和黎潔霜由重慶押到貴州息烽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監禁。當時，張學良、楊虎城和新四軍被俘軍長葉挺等人都關押在息烽集中營。抗戰結束後，息烽集中營撤銷，王振華又被押回重慶關押在磁石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館監獄，在獄中與黎潔霜結婚。

一九四七年黎潔霜生下一子，取名王小華。

一九四九年初又生下第二個兒子，取名王幼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兵臨山城重慶，蔣黨特務在磁石口集中營進行了一場血腥大屠殺，王振華一家四口全被殺害，連兩歲的王小華和一歲的王幼華也不放過！同時遇難的還有王坤榮和趙金生。月底，重慶解放後，托派王振華一家四口悲壯犧牲的事跡，被幸存的難友們紛紛傳遍山城。

重慶托派組織的領導人隗寬和劉志超、李績到磁石口查找王振華等人的遺體，隗寬寫了王振華、黎潔霜、王坤榮和趙金生四烈士的小傳，刊登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新蜀報》上。一九四九年底，重慶地區政府在大同路小學展出王振華、黎潔霜和他們的兩個幼兒一家四口被殺害的事跡，作為對蔣黨殘酷的典型來宣傳、控訴。一九五零年初，隗寬和李績專程到南溫泉訪問在那裡療養的羅廣斌，他與王振華曾同時關押在白公館監獄。羅廣斌詳細談了王振華在獄中的情況，稱讚王振華意志堅定。

《紅岩》有江姐抱起“獄中之花”的一段描寫，說明羅廣斌在創作他的革命典型人物

時，他的意識中沒有忘記王振華、黎潔霜的事跡，反托宣傳使他不能不講出“獄中之花”的父母是誰。

王振華、黎潔霜一家四口人雖被敵人殺害，但在烈士總名錄上卻沒有他的名字。“一一·二七”大屠殺《被害人登記表》註明：“王振華、黎潔霜，托派，不列名”。

他們終因托派而不列名，長眠於歌樂山下。

反托宣傳，或反托運動，不是國產，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進口貨，它影響我國政治生活半世紀之久。因為王振華、黎潔霜是托派，他們犧牲時的英勇悲壯的事跡，被反托的歷史塵埃埋沒了三十多年。

直到上世紀80年初，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搞清這個問題，不僅是對一百多名死難者及其子女負責，也是對現代史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負責”的精神，四川省委組織部複查了“一一·二七”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三百多名政治犯中尚未被承認烈士的九十多名政治犯的事跡，複查結果，這九十多名政治犯中有六十多人被迫認為烈士，其中有王振華、黎潔霜。

其實，王振華、黎潔霜的事跡無須複查，早在三十年前，重慶一解放，那些幸存的難友們就已傳播他們英勇的事跡。王振華一家四口遭滅門殺害的事跡是悲壯感人的，而王振華、黎潔霜夫婦倆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是意志堅定的，更使幸存難友們感動不忘。從“托派，不列名”到迫認為革命烈士，是歷史性的一大進步。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國有四家報紙分頭報導了王振華、黎潔霜的事跡：八月十三日《光明日報》，八月十六日《文匯報》，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日報》，八月三十一日《重慶日報》。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上海《文匯報》《‘獄中之花’的托派父母》一文的摘要如下：

(黎潔霜)“的同獄難友任x x 同志回憶道：‘黎潔霜沒有乳汁就舂米羹，以僅有的一點簡單坎具為獄中受刑的、生病的難友服務。車躍先同志犧牲前管圖書館時補破舊書用的漿糊，也是她夫婦搞的。白公館為抗議十月二十八日在大坪公開槍殺同志，絕食兩天，她夫婦斷了火種，娃娃餓得大哭’。”

“國民黨特務對王振華的經歷是非常清楚的，他們曾要求他配合反共，但是，王振華堅決拒絕了。”

“據韓子棟同志回憶：王振華對我們同志的忠貞不渝表示出敬佩同情。”

“王振華的同獄難友毛xx同志回憶說：王振華知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於十月一日成立，《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他曾跑到窗口悄悄向羅廣斌、陳然他們，告訴了這個喜訊。”

“從難友們的回憶材料和劊子手楊進興(綽號猩猩)的交待材料看，經過是這樣的：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大屠殺開始，白公館樓上的難友被屠殺後，從樓下最先押出的是王振華、黎潔霜夫婦和兩個孩子，夫婦倆都銬上手銬，一人抱一個孩子。王振華身體非常虛弱，但是還是盡量挺起胸，抱好小華向前走，臉上毫無懼色。黎潔霜身體極度虛弱，吃力地抱着不滿週歲的‘獄中之花’幼華，跟在丈夫身後。”

“當他們經過四號、三號牢房時，難友們清楚地看見黎潔霜臉上沒有一滴眼淚，神態異常嚴峻，像一座晶瑩的大理石雕像。”“他們夫婦倆一步一回頭，依依不捨地用目光向擁在鐵窗前的難友告別。”

“兩歲的小華，看見兇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嚇得大哭起來，他尖聲呼叫：媽媽，我怕，我怕！”

“黎潔霜回頭對劊子手楊進興說：你們多打我幾槍，把孩子放了。”

“楊進興瞪着血紅的眼睛，大聲吼道：把孩子一齊打，斬草除根。”

“王振華對黎潔霜喝道：一起就一起，你同這群狗講什麼！”

“槍聲響了，全家四口一齊倒在血泊裡！”

一九八四年，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編寫的《黨沒有忘記他們……紅岩英烈》(上下兩冊)，在上冊中有一篇：《一對寧死不屈的患難夫婦——王振華、黎潔霜》。

摘要如下：[]號內是我寫的按語。

“九·一八事變”後……年青的王振華，眼看着故鄉被敵人佔領，只好流亡到關內。有家不能歸，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十分仇恨，胸中燃燒着抗日救國的怒火”。

“一九三四年，王振華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積極參加了東北流亡學生的抗日宣傳活動。那時的北大學生聯合會中有喊着抗日口號、打着革命招牌、裝得十分激進的托派學生。由於王振華年輕幼稚，思想偏激，不識托派的真面目，被介紹參加了托派，誤入歧途。[一九八四年，寫這番反托套話，不足為奇，是以《毛選》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頁那個對托派定性的注為基調的]……“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抗日有罪，他被北大開除了學籍。……觸怒了反動派，……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逮捕，關押了兩年多”。[他到上海積極參與了托派組織，他參與了陳獨秀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組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了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黨，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七七事變後，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國大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他才被釋放出來，在上海從事托派的組織工作。由於他公開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這就在政治上背離了托派破壞抗戰的反革命綱領，與托派中央發生了嚴重分歧，被勒令離開上海，出走香港。”[這番反托套話，是依據《毛選》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頁那條給托派定性為漢奸反革命的注為基調的]……“不久，他和黎潔霜一道到了廣西梧州，住了一段時間。隨後他……隻身到重慶……參與和領導重慶的托派組織四川地委會的工作，負責編輯油印的內部刊物《工人呼聲》報。這時候雖然他還沒有完全擺脫托派思想體系，但着重宣傳抗日救國，堅決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妥協投降和揭露國民黨的腐化與無能。他的文章，文筆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當時一部份青年工人和學生的歡迎。上海的托派中央對王振華恨之入骨，立即解除了他在重慶托派地委會中的職務”。[最後兩句是反托派謊言加反托囑語]“他再次受到打擊後，寫了《我們組織工作應有的方向》和《我們的任務提綱》兩文，……他在文章中明確指出：‘國民黨隨時都有妥協投降的時候……也只有我們在各工廠內能夠發動改良生活的鬥爭和反對國民黨政治壓迫的鬥爭及暴露國民黨腐化與無能’，並指出我們‘和國民黨統治是不可調和的’‘中國的主要敵人，仍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戰爭中我們要盡一切方法使帝國

主義失敗’。這兩篇文章的主要精神表明，他在思想上基本已脫離了托派的思想體系。”[這一大段文章是以中國共產黨抗日、中國托派破壞抗日為基調，企圖改造王振華的面目。王振華主張抗日，‘在政治上背離了托派破壞抗戰的反革命綱領’，‘因此被托派中央開除，他仍然主張抗日反國民黨’，在思想上基本已脫離了托派的思想體系。因此被托派中央‘恨之入骨’、‘解除他在重慶地委會的職務’‘他再次受到打擊’云云。一九九一年，《毛選》第二版修改了《毛選》第一版對托派的定性。《毛選》第一版的定性是：‘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從事各種有利日本侵略的活動’（《毛選》第一卷一六八頁）。《毛選》第二版的定性是：‘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第三國際……錯誤論斷而造成的’（《毛選》第二版第二卷二七〇頁和第二卷五一六頁）。一九八四年，引用王振華主編的《工人呼聲》上發表的抗戰言論，從一九九一年《毛選》第二版對托派定性看，恰恰說明了重慶托派組織活動真像：‘只有我們在各工廠內能夠發動改良生活的鬥爭和反對國民黨政治壓迫的鬥爭及暴露國民黨腐化與無能’。]

“他辦的《工人呼聲》報公開在一些學校和工廠中散發，鼓動工人罷工，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一九四二年二月，王振華再次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經過嚴酷審訊，認定為重犯，關進‘中美合作所’白公館監獄。”

關於黎潔霜，《一對寧死不屈的夫婦》有如下的記敘：黎潔霜，原名黎琦清，祖籍廣西蒼梧，父親黎慶裕，清末梧州經商，家業富厚。黎潔霜一九二零年五月出生在梧州。父親早死，由母親黃衍文將兄弟姐妹數人撫養長大。”“黎琦清少年時代就同情封建壓迫下的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她對家中婢女不但平等相待，而且很尊重。一九三二年，她從廣西省梧州女中附小升入女中，後轉學到梧州一中讀書。她文靜持重，學習勤奮，語文很好，深得老師喜愛。她從初中起，一直訂閱《中學生》雜誌，從中學習到不少新的知識開闊了眼界。她對舊社會的種種黑暗，深懷不滿，逐步樹立

十月評論 2013年第2/3期

起抗日救國，爭取婦女解放自立的思想。”

“黎潔霜初中畢業後，於一九三六年春到南寧集訓，夏天，她參加了廣西第一屆學生軍。在學生軍中，她追求進步，不倦地閱讀進步書刊，特別是蘇聯文學，擴大了視野。”……“黎琦清從廣西學生軍復員，升入廣西大學附中讀高中，受進步同學影響，參加了廣西大學進步同學組織的讀書會。……她常和一些進步同學一起，熱烈探討抗日救亡，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等問題。”……“七·七事變”爆發後……“她就在學校積極地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一反過去文靜持重的性格，成了廣西大學附中女生中活躍分子之一。雖然她才十七歲，才華出眾，能歌善舞，喜歡演劇。梧州愛國話劇社每次演出，都邀廣西大學學生會出節目，黎琦清常去參加，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黎琦清的胞兄黎超賢是中山大學學生，廣州淪陷後，他與中山大學教授高承元等人先後來到梧州。”“以後，他們去香港籌辦日報，黎琦清隨他們前往。去港後，黎琦清發現高承元等人只是口頭抗日，不作實際抗日工作，就離開了他們，自己停留香港，繼續尋求抗日救國門徑。她在留港期間，與正在香港宣傳抗日的王振華相識。”[沒有記敘黎琦清在留港期間，進工廠做工，參加了托派組織活動的事跡]“她仰慕王振華抗日堅決，學識淵博，才華洋溢，品格純樸，就發生了愛慕之情，和王振華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結伴回到廣西梧州家裡。……不久，王振華赴重慶。爲了大學深造，赴重慶和王振華相會，黎琦清改名黎潔霜，一九四一年秋以廣州私立南京中學文憑考入重慶（白沙鎮）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讀書。”

“王振華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敵人立即搜查其住處，發現了黎潔霜寫信給王振華的信件和照片。這時，黎潔霜也在打聽王振華被捕後的下落，準備去探親。結果，反動派把她也抓起來。她被捕，想盡快與王振華見面，就聲稱她已和王振華結婚。……以後，她同王振華一起被押解貴州息烽集中營，長期監禁。”

“集中營的敵人了解到王振華、黎潔霜有較高文化水平與才幹，妄想軟化拉攏他們……要他跟他們一起幹。這個陰謀被王振華當場揭穿，嚴詞拒絕。”

“敵人用盡了各種威脅和利誘手段，都無法使王振華、黎潔霜屈服，只好無可奈何地以精神折磨來懲罰他們。他倆關在同一監獄，雖然近在幾呎，卻長期不讓他們見面，妄想動搖他們的意志，從精神上拖垮他們。”

“抗日戰爭勝利後……撤銷了(貴州)息烽集中營。但是敵人認為的‘危險人物’和‘重犯’，並沒有被釋放。王振華、黎潔霜等人，被轉押重慶白公館繼續監禁。在王振華、黎潔霜一再抗議和難友們的呼籲下，敵人把他們同關在白公館樓下一間陰暗潮濕的小牢室裡。他們終於在敵人的監獄裡舉行了婚禮。”

“一九四七年，黎潔霜生了第一個兒子取名為王小華。由於獄中生活艱苦，黎潔霜同其他難友們一樣，伙食沒有營養，吃的是有霉味的‘平價米’，菜又沒有油水，常常是白水煮豆芽，生活很淒苦，還要給孩子喂奶。她身體極度虛弱，臉色蒼白。……特務頭子徐遠舉見此情景，覺得有機可乘，假惺惺地表示關心和同情，企圖以寫悔過書為條件，釋放他們。但當場遭到了黎潔霜的拒絕，王振華稱讚妻子有骨氣。”

“他們夫妻倆除了用那簡陋的炊具為生病或受刑的難友服務以外，還參加獄中黨組織領導的為抗議敵人在大坪公開殺害許建業等革命同志的絕食鬥爭。當年的難友，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們參加絕食鬥爭時，全家滅掉火種兩天，孩子餓得哇哇直哭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當解放重慶的隆隆炮聲震撼山城，美蔣反動派即將最後崩潰的時候，盤踞在‘中美合作所’的國民黨的特務們，開始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對(三百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的集體大屠殺。劊子手們從白公館樓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華、黎潔霜夫婦和兩個孩子。夫妻倆在敵人的長期折磨下，身體雖然十分虛弱，還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無懼色地邁着堅定步伐，高呼着口號，向刑場走去。在鐵窗內的難友們，含着淚花為他們送別。難友們看不出他們夫婦倆有絲毫的恐懼與憂傷，而是神態嚴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還不時地回頭依依不捨地向難友們告別。”

“臨刑時，兩歲多的小孩王小華看見押着他們一家的劊子手們一個個兇神惡煞的樣子，嚇得大哭起來，不住地叫喊：‘媽媽，我怕！媽媽，我怕！’黎潔霜看着緊緊伏在他們夫婦倆身上的兩個兒子，聽着兒子淒慘的哭聲和驚叫聲，……她轉過身對押着她的劊子手楊進興說：‘你們多打我幾槍，把孩子放了’。”

楊進興大聲吼：“把孩子一齊打，斬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這群狗講什麼！”王振華高聲喝住妻子。

“劊子手們奪過他們手中的孩子，就在他們的眼前把孩子殘殺了。”

“黎潔霜憤怒地撲向孩子，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

“王振華面對兇殘的敵人，大義凜然地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個人崇拜、造神運動，在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定勢，想像一九四九年的王振華，應該是“大義凜然地高呼”這兩個口號才能算得上是革命烈士。可是，當時幸存的難友們的回憶中沒有提到這兩口號，《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也只是說王振華意志堅定，沒有提到這兩個口號]。

在《光明日報》、《文匯報》、《四川日報》和《重慶日報》，四篇報導文章的煞尾都同樣加上一段喊兩個口號的“特寫”。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重慶日報》的報導中最後的“特寫”是：“他被捕前兩年還是托派思想……尤其最近一年，他已完全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和主張……接受了真正的共產主義……——二七臨刑時，他高呼的是：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信仰馬克思創建的資本掠奪剩餘價值學說和辯証唯物論的王振華，會去接受無何有之鄉的“真正的共產主義”嗎？——二七臨刑時，他也會高呼“家天下”式的口號嗎？

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 ——關於第四國際的歷史和理論根源 托洛茨基著（1936年8月29日） 史丹譯

像我們現在處身期間的反動年代，不僅會令工人階級和她的先鋒隊解體和削解，並且還會把運動的一般理論水準降低，把政治思想拋回到許久以前已經經過的無數階段。在這種條件之下，先鋒隊的首要任務是不能讓倒退的潮流把自己拖到後面，而必須逆流而上。要是不利的力量關係使先鋒隊無法守住他已經取得的陣地，那至少必須堅守他的思想立場；因為就是這些立場表述了過去用高昂的代價換來的經驗。愚人們將會把這種政策看成是“宗派主義”。實際上，這是在行將來臨的歷史潮流中，能夠為新一輪向前突飛猛進的浪潮作出準備的唯一手段。

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反動

重大的政治失敗必然觸發對各種價值的重新思考，而這一般又會朝著兩個方向發生。一方是失敗的經驗所豐富的真正先鋒隊，它會盡其所能保衛革命思想的遺產，並且以此為基礎，嘗試教育新的幹部，以迎接未來的群眾鬥爭。另一方是那些循規守舊者，中派主義者和業餘玩票者；他們為失敗所嚇怕，用盡一切方法來毀壞革命傳統的權威，並且回到過去搜索他們的“新聖經”。

人們可以指出大量思想反動的例子，它們最經常採取的形式就是降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全部文獻，以至還有它們的衛星組織倫敦局，實質上就包含著如此的例子。在它們的文獻裡，並無任何屬於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提示，沒有一次為失敗的原因嘗試作出嚴肅的解釋；關乎未來，也沒有一句新鮮的說話。除了陳詞濫調、遵奉舊套、謊言，以及最首要的，為它們的官僚自保而憂心忡忡的說話之外，別無其它。只消往那些希法亭、奧托·鮑威爾們的數行文字去嗅嗅，就足以知道那種腐敗的程度了。至於共產國際的理論家們就更不消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說起話來就像一個店東摸著啤酒杯閒扯起來那樣的無知

和俗套。那些人的腦袋太過懶惰，以至不會拋棄馬克思主義——他們出賣馬克思主義就是了。但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那些人。讓我們轉而談那些“革新家”吧。

前奧地利共產黨員威裡·施拉姆就莫斯科大審判寫了一本小書，這本小書有著其表現力的書題：《謊言的專政》。施拉姆是個有天資的記者，他主要的興趣在時事方面。他對莫斯科大審判的捏造冤案的批評，及他在揭露“自願悔過”的心理機制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可是他卻不自限於此：他要為社會主義創造一種新理論，以保證我們能在將來對抗失敗和冤案。而由於施拉姆完全不是個理論家，並且他顯然不熟悉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他於是完全走回到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去，尤其是回到從前德國的那一類社會主義去：也就是最為落後，感傷和濫情的那一種。施拉姆把辯證法和階級鬥爭拋棄，更不必提無產階級專政了。對他來說，社會改造的問題刪減為實現某種“永恆的”道德真理的問題；他使人類滿溢著這種真理，甚至在資本主義之下亦然。

威裡·施拉姆用插入一根道德腺來拯救社會主義的嘗試，得到了來自克倫斯基的雜誌《新俄羅斯》的歡欣榮譽的敬禮（這份外省古老雜誌現在於巴黎出版）。這份雜誌的編輯們言之有理地作出結論說：施拉姆得出了俄國式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按這種社會主義在許久以前已經用對於信仰、希望和慈愛的神聖理念來對抗階級鬥爭的嚴厲和苛刻。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的“新”學說的“理論性”的前提，只不過是回復到德國三月前（1848！）的社會主義！不過，要是要求克倫斯基和施拉姆對思想史有更為深切的知識，就會是不公平的。更為重要的事實是，現在聲援施拉姆的克倫斯基，當他擔任政府首腦的時候，正是他唆使把布爾什維克黨人當為是德國總參謀部派來的間諜來迫害；也就是說，施拉姆現在發動起那些形而上的封塵的絕對真理來加以反對

的，正就是這個克倫斯基過去組織過的同一樣的捏造冤案。

施拉姆和他那一類人的思想反動的心理機制完全不複雜。這些人曾經一度加入一場深信階級鬥爭及受到唯物辯證法的吸引---若不是思想上就是言詞上---的政治運動。在奧地利和德國，事情以災難結束。施拉姆下了一個全盤的結論：這是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既然選擇何種啓示是由個人經驗和…個人知識所限，我們這個革新家便轉而到一堆破難中搜尋他的聖經，勇敢地拿它和布爾什維克對立，並且還和馬克思主義對立呢。

驟眼看來，施拉姆那種牌子的思想反動是太過原始了（從馬克思到…克倫斯基！），不值得留步一顧。但它實在是十分有啓發性的：正由於這種思想反動的原始性，使它代表了其他各種反動形式的共同準則，特別是由全盤責難布爾什維克主義來表達的那類反動的形式。

“回到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布爾什維主義內找到了歷史性的最高的表述。無產階級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旗幟下得到了第一次勝利，建立了第一個工人國家。沒有任何事物能從歷史抹去這宗事實。而由於十月革命在現階段導致了官僚的勝利，具有官僚壓迫，掠奪和捏造冤案的制度---用施拉姆大快人心的表述來說，是“謊言的專政”---許多形式主義者和膚淺的頭腦便得到這個歸納性的結論：不拋棄在布爾什維主義便無法進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我們已經知道，施拉姆走得還要遠一些；他說：墮落為斯大林主義的在布爾什維主義是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出來，因此仍然立足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便無法戰鬥斯大林主義。又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沒有那麼貫徹，然而數量更多，則說：‘我們必須從在布爾什維主義返回馬克思主義去。’但怎樣返回去？回到什麼馬克思主義？早在馬克思主義以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形式“破產”之前，它已經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下經歷了破產。“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口號的意思是否表示，躍過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時期…，回到第一國際呢？但第一國際在它那個時代也已經是破產的了。因此，分析到底，問題是

在於返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去。人們可以不必離開書房，甚至不用脫掉拖鞋，便能夠完成這種英雄式的跳躍。但我們怎樣能夠省略數十年來在理論和政治方面的鬥爭---這當中包含從我們那些經典（馬克思在1883年去世，恩格斯在1895年）進而來到我們所在的時代任務呢？提議把布爾什維主義作為歷史上一個“破產”的傾向來拋棄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其他的路向。所以問題就縮減為最簡單的建議：研究《資本論》。我們難以反對這個建議。在布爾什維黨人也同樣研究《資本論》，並且不是閉上雙眼來研究。然而這也無法阻止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和莫斯科大審判的演出。那麼，怎麼辦？

布爾什維主義須對斯大林主義負責嗎？

斯大林主義真的是如所以反對派說的，如斯大林本人所公開宣佈的，又或如孟什維克派，無政府主義者以至某些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教條主義者，是代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合法產品嗎？‘我們向來就預見到了，’他們說，‘從禁制其他社會主義黨派開始，到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在蘇維埃內設立布爾什維克專政，十月革命只能以官僚專政來結束。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延續，同時也是列寧主義的破產。’

這種推理的漏洞產生自不言而喻的把布爾什維主義，十月革命和蘇聯等同起來。敵對力量之間的鬥爭的歷史進程，由在真空中演化的布爾什維主義所替代。然而布爾什維主義只是一個政治傾向，它和工人階級緊密融和，但卻不等同於工人階級。而在蘇聯內部，除了工人階級之外，尚有上百萬、上千萬眾的農民，各類少數民族；並且還有著壓迫，苦楚和無知的遺產。由布爾什維黨人建立起來的國家不僅反映了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和意志，並且同樣也反映了國家的文化水準，人民中的社會組成，野蠻的過去和同等野蠻的世界帝國主義。把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過程呈現為純粹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演化，就是僅僅拿蘇維埃國家內其中之一種元素之名來安頓社會現實，用純粹的邏輯把這種元素孤立出來。人們只須用其名來稱呼這種基本的錯誤，便能把它徹底幹掉，片甲不留。

無論如何，布爾什維主義從來不把自己和十月革命等同起來，也不會和由它頒佈成立的蘇維埃國家等同起來。布爾什維克自視為歷史的各種因素之一種，是其中‘自覺’的因素---這種因素十分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的。我們從不曾犯歷史主觀主義。我們把不僅在一國範疇且也在國際範疇上的階級鬥爭---在既有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視為決定性的因素。

當布爾什維黨人向農民中的私有制傾向讓步，對黨員資格設立嚴格規條，清除黨內異己分子，禁制其他黨派，引進新經濟政策，准予設立企業作為讓步，或是和帝國主義政府達成外交協定的時候，他們便從那個一開始在理論上便顯而易見的基本事實裡得出片面的結論。清楚的基本事實是：不論奪取政權本身是多麼的重要，但它絕不會令黨搖身變為歷史進程的絕對的統治者。黨在奪得國家政權後，不錯是能對社會的進程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但它同時也反過來十倍地承受著來自社會各種元素的更大影響。它能被敵對的力量直接攻擊，擲出政權之外。在尤為趑趄不前的發展下，它能夠從內部墮落而同時又保住權力。那些試圖在斯大林官僚體的腐敗中尋得殲滅布爾什維主義的宗派主義邏輯家，正就是不明白這項歷史發展進程的辯證法。

那些先生們實質上是說：無法保證自身不會墮落的革命黨是壞的。布爾什維主義按照這個先決條件自然是要受到責難---它是沒有護身符的。但這個先決條件本身就錯誤。科學思維要求具體的分析：黨是如何及為何墮落的？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本身之外，迄今還沒有其他人對此作出分析。為了作出分析，並不需要和布爾什維主義決裂。而且相反，他們從本身的火藥庫中找到澄清其命運所必需的一切。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斯大林主義不錯是從布爾什維主義中“生長出來”，但並非是邏輯地，而卻是辯證地從中而生；斯大林主義之生成不是作為革命的確認，而卻是作為特爾米多熱月反動對革命之否定。兩者全無共同之處。

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預測

但是布爾什維黨人毋須等到莫斯科大審判

才能解釋蘇聯執政黨解體的諸種理由。他們在許久以前已經預見到這點，並且說出了這種發展在理論上的可能性。讓我們記憶布爾什維黨人的預測吧；這項預測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作出的，而是在十月革命前許多年便已經作出了。在一國和國際戰場上，力量的特定的整合是能夠有助於落後國家如俄國的無產階級首先奪得政權。可是，正是這同一的力量整合在事先就已證明到，在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相當迅速的勝利下，俄國的工人政府將不能生存。孤立無援的蘇維埃政權必然倒臺，或是變質。更確切的是：它將首先變態而後倒臺。我本人從1905年開始已經不止一次撰述過這個問題。我寫的《俄國革命史》收集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從1917年到1923年就這個問題發表過的全部聲明。他們全都帶出一個結論：沒有西方的革命，布爾什維主義將會被國內發生的反革命，或外來的干預肅清。列寧一再強調，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化不是個技術上的問題或組織問題，而卻是工人國家走向墮落的潛伏開端。

在1922年3月黨第十一次大會上，列寧談到某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尤其是自由派教授烏斯特裡亞洛夫在正值新經濟的時候給予蘇維埃俄國的支援：“雖然烏斯特裡亞洛夫是個立憲民主黨人，資產階級，支持干預，但他說：‘我贊成支持蘇維埃政府’，‘我贊成支持蘇維埃政權，因為它現在走的道路將會把政權帶向一個尋常的資產階級國家。’”比起“共產黨人多愁善感的謊言”，列寧寧取敵人尖酸刻薄的聲音。他對黨發出清醒嚴肅的危險警告：“我們必須坦白說出來：烏斯特裡亞洛夫說到的事是有可能的。歷史知道各種各樣的蛻變。依靠堅定的信念，忠誠和其他顯著的道德素質來對待政治，並不是嚴肅的態度；一些人或許賦有光彩奪目的道德素質，但歷史的課題是由廣大的群眾來決定。要是幾個少數不適用於那些歷史課題，歷史有時是不會對他們太客氣的。”（《列寧全集》英文版第33卷（1937年版）286-287頁）一句話，黨不是發展的唯一因素；而在更大的歷史範疇上來說，更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列寧在同一個大會上繼續說（這是他最後出席的一次大會）：“…

這很簡單，每個人都可以明白。但那些民族的文化會發生什麼事情？事情到此便不那樣簡單了。假如勝利的民族要比被征服的民族較有文化，前者會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後者身上；但假如情況是相反，則被征服的民族會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戰勝者身上。這種事情不是在[俄羅斯共和國]首都上發生過嗎？那4700個共產黨人（接近軍隊整整的一個師，並且他們全都是最優秀的人）有受到異己文化的影響嗎？”（同上，288頁）

上述的一番話是在1922年說的，並且不是第一次說。歷史不是由幾個人造出來的，即使是“最優秀”的幾個人。還不止此呢---那些“最優秀”的幾個人並且能夠墮落到異己的精神去，即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去。不僅蘇維埃國家能夠放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也能喪失自身的布爾什維主義。

從清晰理解到這個危險中，派生了左派反對派；它自1923年確定的組織成立。左派反對派日續一日的紀錄了墮落的症候，試圖運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意志來對抗日漸壯大的特爾米多反動。然而這種主觀因素證明是不足夠的。按照列寧說的決定鬥爭結局的“廣大群眾”，對國內的匱乏和長久等候世界革命感到疲倦了。群眾的情緒消沉了。官僚占了上風。它唬嚇革命的先鋒隊，踐踏馬克思主義，出賣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主義戰勝了。布爾什維主義透過左派反對派這個形式與蘇維埃的官僚層及其共產國際決裂。這就是發展的真實路向。

在形式的意義上，斯大林主義確乎是從布爾什維主義派生出來。即使時到今天，莫斯科的官僚繼續自稱為布爾什維克黨。這簡單是由於動用布爾什維主義舊有的標籤能更好地愚弄群眾。可悲的是那些理論家們會把外殼當作果實，外觀當為現實。藉著把布爾什維主義等同於斯大林主義，他們替特爾米多反動派們提供最佳的服務；而正是這個原則，令他們扮演了一個清楚無誤的反動角色。

鑒於政治戰場上所有其他政黨受到取締，人民各種層分間的對抗性的利益和傾向，便必定或

多或少地從執政黨內找得表述。當政治重心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轉移到官僚體，黨的社會結構和黨的思想亦相應的發生了變化。勢如破竹的發展過程令黨在過去15年來承受墮落的迅速程度，比起社會民主黨在過去半世紀來更甚。[蘇聯]當前進行著的清算，在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不單劃下了一條血淋淋的界限而已；橫跨在兩者之間的，完全是血流成河。布爾什維克整整一個老輩代，參與了內戰的中生代的重要部分，以及對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採取嚴肅態度的年輕人，他們所有人之受到消滅，不僅顯示出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並且還是徹頭徹尾的，在肉身上也水火不相容。這點能夠被視而不見嗎？

斯大林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試圖把斯大林主義看成是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產物，並且更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產物。他們意欲用更為現代化的自由蘇維埃聯盟來代替巴枯寧主張的父權式的“自由公社聯盟”。但是他們和以往一樣，反對集中的國家權利。事實上，“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分支社會民主主義一旦踏上政權之後，便公開成為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其餘分支產生了新生的特權階層。罪惡之源在於國家，這是明白不過的。

從展闊的歷史觀點來看，這種推理含有一定的真實性。國家作為約束性的機器，無疑是政治和道德炎症的一個泉源。而按照經驗所示，這項推理同樣適用到工人國家。以致最後能夠得出這個結論說，斯大林主義是一種社會條件下的產物：這個社會尚無法擺脫國家這件緊身衣。可是這種局面並無包含任何有對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評價的東西，而只是刻劃出人類文化的一般水準，而更主要是刻劃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關係。我們同意了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的，國家---即使是工人國家---是階級野蠻主義的泉源，而人類的真實歷史將由廢除國家後才誕生；然則，以下這個問題仍然以其全部力量擺在我們面前：什麼道路和方法將導致廢除國家？最近的經驗證明了那些道路和方法，確乎不會是無政府主義的方法。

全世界唯一一個重要的無政府主義組織CNT的領袖們，臨到關鍵性的時刻，成為了資產階級的部長。他們用“不尋常的情勢”的壓力來解釋他們之公開叛賣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他們的時代中，難道不也是引用過同一個口實嗎？自然囉，內戰不同于和平常態時期，而是個“不尋常的情勢”。然而每個嚴肅的革命組織正是爲了“不尋常的情勢”而做準備的。西班牙的經驗再一次顯示到，在“正常情勢”下被資產階級國家准予出版的小冊子可以“否定”國家，但在革命的條件下便沒有“否定”國家的餘地了；正要相反，革命的條件要求把國家征服。我們全無意思怪責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揮動筆桿，把國家一筆勾銷。一個革命的黨，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後（而對於這點，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是無能爲力的，儘管無政府主義的工人們英勇非凡），也仍然不是對社會有絕對權利的統治者。但我們十足責難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和平時候來看完全合適，但當革命的“不尋常的情勢”一旦展開，這種理論便得迅速放棄。在昔日（大概現今亦然）有些將軍認爲，對軍隊最爲有害的事物莫過於戰爭。那些革命者和那些將軍處在同一層次，他們聲稱其學說被革命毀壞了。

關於最終目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完全一致：消滅國家。是在人們無法簡單地用不問不問來達到消滅國家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是所謂的“國家主義者”。斯大林主義的經驗並無否斥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卻是從反面確證了這個教導。革命學說教導無產階級在形勢之中正確地擺正方向，積極利用形勢；但學說當然不包括保證自動勝利。然而卻是惟有通過運用這種學說，才有可能勝利。再者，絕對不應把勝利視爲單一的事件；必須從歷史的遠景出發考慮問題。第一個工人國家---這個工人國家處在低下的經濟基礎，備受帝國主義包圍---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憲兵隊。但真正的布爾什維主義向這個憲兵隊發動你死我活的鬥爭。斯大林主義爲了保存自身，現在被迫發起直接的內戰，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在攻擊“托洛茨基主義”的名義下進行，並且不僅在蘇聯，甚至在西班牙。舊有的布爾什維克黨已死，但布爾什維主義到處冒出頭來。

從廣義來說，從布爾什維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就和從革命推論出反革命一樣，全無二致。自由派---保守派，及隨後的改良主義思想，向來就是以這種陳詞濫調爲其特點。由於社會的階級結構使然，革命經常會產生反革命。一些邏輯學家於是乎會問，這難道不是表明革命方法的內部有著某些瑕疵嗎？可是，不論自由派或改良主義者，迄今仍無法成功地發明出一種更爲“節省”的方法。不過，要是不容易合理地說明活生生的歷史進程的話，爲這個歷史進程的潮汐交替作出合理的詮釋卻是不難辦到的；因此，藉著純粹邏輯便能從“國家社會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從馬克思主義推論出法西斯主義，從革命推論出反動。一句話，從命題推論出反命題。一若在其他許多領域，無政府主義思想在這個領域裡是自由派理性主義的囚徒。沒有辯證法，就不可能有實在的革命思想。

布爾什維主義之作爲斯大林主義來源的政治“罪孽”

理性主義者的論據，至少從表面看，有時具有更爲具體的特徵。他們不會在整體上從布爾什維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但卻是從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罪孽推論出之（這類型思想的最爲特出的代表是著有論斯大林一書的法國作家B.蘇瓦裡納。B.蘇瓦裡納本書中的事實和文獻方面，是漫長而認真的材料搜集的成果；可是作者在歷史哲學觀方面的庸俗性卻教人吃驚。他從布爾什維主義內在的弊端來解釋接二連三的歷史不幸事故；對他來說，歷史進程的真實條件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作用是不存在的。就連泰納的“社會環境論”，也比蘇瓦裡納更爲接近馬克思）。按照戈特、潘納卻克，某些德國“斯巴達克斯派”和其他人的說法，布爾什維克人用黨專政取代了無產階級專政，而斯大林則用官僚專政取代了黨專政。布爾什維克毀滅了所有黨派，只餘自己；斯大林則爲了波拿巴小集團的利益而扼殺了布爾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和資產階級作妥協；斯大林成了資產階級的盟友和支持者。布爾什維克宣揚參加到舊有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的必要性，斯大林則和工會官僚和資產階級民主交朋友。人們可以隨意作出諸如此類的對照。這些看來有力的對照，全都空洞無物。

無產階級只能通過他的先鋒隊奪取政權。無產階級本身之所以必需要國家政權，乃是由群眾不充裕的文化水準及他們的蕪雜性而來。組織成爲政黨的革命先鋒隊是群眾熱烈追求自由集結而成的結晶體。先鋒隊若是沒有階級的信任，沒有階級的支持，就無從談到征服政權。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整個階級作出的努力，而只不過是在先鋒隊的領導下而已。蘇維埃只不過是先鋒隊和階級之間的聯繫在組織上的形式。只有黨才能爲這個形式賦予革命的內容。十月革命的正面經驗和其他國家的負面經驗（德國，奧地利，以至西班牙）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沒有人通過實驗來表明或試圖在紙上清晰地說明，無產階級在沒有一個知道它的需要的黨的政治領導之下，如何能奪取政權。這個黨之把蘇維埃在政治上從屬到黨的領袖去，就同保守黨多數的統治之廢除了英國的議會制度一樣，不多不少。

至於在禁止其他蘇聯政黨方面，那並非出自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卻是一個備受敵人包圍的落後、破落的國家爲了保衛專政而實行的一項措施；這項措施隨後更以禁制執政黨之內的派別來完成。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便清楚無誤的知道這項措施巨大的危險。可是危險的根源並非埋伏在專政的學說或戰術之內，而是埋伏在專政物質上的弱勢方面，埋伏在國內及國際形勢的困難之內。假如革命勝利了，比如說，單是在德國一國勝利，那麼禁制蘇聯其他政黨的需要性便會立即消失。一黨統制成爲了斯大林主義的極權制度在法理上的起點，這絕對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可是造成這種發展的理由，既不在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也不在於禁制其他政黨這項臨時性的戰時措施，而卻是在於歐洲和亞洲的無產階級發生了連串的失敗。

這同樣適用在無政府主義的鬥爭方面。在革命的英雄年代，布爾什維克黨人和真正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攜手作戰。他們中有許多人被吸引成爲黨的基層。本文作者曾經不止一次的和列寧討論到，在當地居民的同意之下，把某些地區撥給無政府主義者的可能性，以讓他們可以維持無國家的實驗。然而內政，外國封鎖和饑荒不容這種計畫的空間。至於克朗士達脫的起義嗎？然而革

命政府自然不會由於有少數幾個可疑的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到反動的農民-士兵的起義，就把保衛首都的堡壘“贈送”給起義的兵士去。就關於克朗士達脫，馬哈諾（Makhno）和革命中的其他插曲，對這些事件作出具體的歷史性分析，便會使這些由無知和濫觴大吹特吹而成的傳奇沒有發揮的餘地。

最後只餘一宗事實，即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不僅動用了定罪，並且還動用了強制力量。後來，從革命中生成的官僚壟斷了強制制度以爲己用；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皆是從之前的階段而來，在之前的階段紮根，並且具有之前的階段的某些特點；即使在翻天覆地的發展階段如革命及反革命，也無例外。包括韋伯斯在內的自由派，經常強調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只不過是沙皇專政統治的新版本。他們對以下這些“細節”閉眼不顧：廢除君主制和貴族，把土地交給農民，褫奪資本，引進計劃經濟，推行無神論教育，等等。無政府主義自由派同樣地閉眼不顧這項事實，即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縱有著壓迫，但它是在群眾的利益下顛覆了各種社會關係；而斯大林派的特爾米多反動的顛覆，是在特權少數的利益下連帶令蘇維埃的社會發生轉變。把斯大林主義等同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此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準則，這是清楚不過的。

理論問題

布爾什維克主義其中最爲出眾的特點，是它對待學說的問題有著嚴厲，準確乃至於是愛爭吵的態度。列寧全集的27卷著作永遠都會是理論的最高覺悟的例證。布爾什維克主義要是沒有這個最基要的素質，便永遠無從完成它的歷史作用。在這一點上，粗糙，無知及全然的經驗主義性的斯大林主義處在截然相反的另一端。

左派反對派在超過10年之前在綱領上宣佈：“自從列寧死後，一整系列的新理論被創造出來；這些理論的唯一一個目的，是爲斯大林主義者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上往後退作辯解。”還在數日之前，曾經參加過西班牙革命的美國作家列斯頓·M·奧克寫道：“斯大林主義者實際上是當前首屈一指的馬克思和列寧的修正主

義者——在修正馬克思方面，伯恩斯坦是難望斯大林的項背，沒有他的一半膽量。”這個說法絕對正確，人們只須補充一點，即伯恩斯坦實際上頗為感到有理論的需要：他認真地試圖把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實踐與其政綱拉上關係。至於斯大林主義官僚，則不僅和馬克思主義全無共同之處，並且是與任何學說和體系迥然陌生的。它的“意識形態”從頭到腳滲透著員警的主觀主義，它的實踐是暴戾的經驗主義。它對任何理論的敵意態度與篡權者階層的根本利益完全吻合：它不能為自身的社會作用作出交代，也無法向任何人作交代。斯大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筆桿子修改馬克思和列寧；他用的是格柏烏的鐵蹄。

關於道德問題

被布爾什維克主義撕破他們的廉價面具的那些自吹自擂的無足輕重的人，尤多抱怨布爾什維克主義“不道德”。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文人，議會，及其他圈子裡，傳統的價值觀大行其道，又或者用傳統的語言來掩飾他們之缺乏價值觀。這個龐大，混雜，互相保護的社會——“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敏感的皮層，無法忍受馬克思主義的手術刀的觸碰。在兩個陣營之間猶豫不定的理論家，作家，道德家，他們在過去和現在仍然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惡意地把分歧誇大，沒有能力和其他人“忠誠”合作，並且“陰謀”工人運動的團結。還有，那些易於大動肝火，神經過敏的中派主義者，經常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惡意中傷”他——只簡單地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人把他那些半吊子的思想推行到底，而他本人卻從來辦不到。但事實是只有這種寶貴的素質即用毫不妥協的態度來對待所有遁詞和逃避，才能教育一個革命的黨不會對“不尋常的情勢”視而不見。

分析到底，每個政黨的道德素質皆來自於它所代表的歷史利益。布爾什維克主義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不偏和，勇猛，蔑視各種虛飾和謬誤；這些道德情操——人類天性的最高素質！——來自於為被壓迫者的利益服務的革命的不妥協性。斯大林主義官僚在這個領域裡仿效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言詞和姿態。可是當員警機器應用上“不妥協性”和“沒有彈性”來為特權少數效勞的時

候，這些素質也就成了道德淪喪和作惡多端的泉源。對於那些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英雄主義等同於特爾米多分子的官僚犬儒主義的先生們，我們只能嗤之以鼻。

時至今天，儘管發生過近期許多充滿戲劇性的事件，那些凡夫俗子仍是寧可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一場關乎個人野心的勾心鬥角，或至好也不過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兩種“形式”之間的衝突。持這種意見的人當中，美國社會黨的領袖羅曼·湯馬士有著最拙劣的表述；他寫道：“沒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勝利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便會結束俄國的陰謀，密謀和恐怖統治。”（《美國社會主義者評論》1973年9月號第6頁）這個人竟自視為……馬克思主義者。人們也可以有權利說：“沒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是羅曼一世佔據全知聖潔的皇座而不是皮烏斯十一世，天主教教會便會變為社會主義的堡壘。”

湯馬士無法理解，問題不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角力，而卻是官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水火不容。即使時到今天，蘇聯的統治階層誠然還是被迫去適應仍未消除殆盡的革命遺產，同時又一面通過直接的內戰（血腥的“清算”——大量剷除不滿者）來為社會政權的轉變作準備；但在西班牙，斯大林主義集團已經公開地擔任資產階級秩序的堡壘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波拿巴主義官僚的鬥爭就在我們的眼前變成了一場階級鬥爭：是兩個世界，兩種綱領，兩種道德之間的鬥爭。要是湯馬士認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不名譽的壓迫者的勝利，不會令蘇維埃政權從政治和道德上恢復朝氣，那他只會證明哪怕他有多麼的保留，支吾其詞和虛偽的歎息，他是遠為接近斯大林主義官僚而並非工人。湯馬士就和其他揭露布爾什維克的“不道德”的人一樣，乾脆就不會長進而成為有革命道德的人。

布爾什維克主義傳統和第四國際

那些企圖越過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返回”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一般都自限在各種孤立的萬應靈藥：杯葛舊有工會，杯葛議會，創立“真

正的”蘇維埃。在戰役的第一輪熱潮之際，所有那些萬應靈藥看起來還會是極端有深度；但時到今天，經過最近的經驗之後，這樣的一種“幼稚病”已經喚不起哪怕是人們的好奇心了。荷蘭的霍爾特和潘納卻克，德國的“斯巴達克派”和意大利的博爾迪蓋派人士，只不過是藉著人為地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其中的一個特點大吹特吹，並且反對其餘各點，藉以來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分立開來。但所有這些“左”派傾向，無論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已經蕩然無存。這便是一項間接的，但重要的證據，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代唯一可能的形式。

布爾什維克黨在行動中表現出最高度的大無畏的革命勇氣和政治現實主義兩者的相結合。它首次在先鋒隊和其階級之間確立起能保證勝利的唯一關係。它用經驗來證明，只有通過傳統小資產階級黨派的政治失敗，無產階級和農村被壓迫的群眾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才有可能結成同盟。布爾什維克黨向全世界作出示範，怎樣進行武裝鬥爭和奪取政權。那些拿抽象的蘇維埃和黨的專政對立的人應該明白，只是多虧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才使蘇維埃能從改良主義的泥沼中脫穎而出，竣至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布爾什維克黨在內戰裡達至把軍事藝術和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地相互結合。假如斯大林主義官僚真的會成功地破壞了新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計劃經濟的經驗也將永遠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教導之一載入歷史。只有那些背對歷史的進程，受到挫敗，受到冒犯的宗派主義者才會對此不顧。

但那還不是全部。只因布爾什維克黨用理論照亮它的每一個步伐，所以它才能推行它那無與倫比的“實際”工作。這套理論不是由布爾什維克主義創造的：它是由馬克思主義裝備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運動的理論，而非停滯不前的理論。只有規模浩大的歷史事件才能豐富這套理論本身。布爾什維克主義對帝國主義時代作為戰爭和革命的時代的分析，對資本主義腐朽時代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分析，對罷工和起義之間的互相關係的分析，對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下黨，蘇維埃和工會的作用的分析，對蘇維埃國家的理論，對經濟的過渡時期的分析，對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



法西斯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分析，及最後對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和蘇維埃國家的墮落的分析，俱為馬克思主義帶來無比珍貴的貢獻。有哪些其他傾向曾經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結論和歸納作出本質性的補充，且舉出這些傾向的名稱吧。范德費爾德，德布魯凱爾-希法亭，奧托·鮑爾，萊昂·勃盧姆，濟羅姆斯基，以至更不消提到梅傑·阿特利和羅曼·湯馬士這兩個人了；所有這些人不論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依靠過去的破爛殘餘來討生活。共產國際之在理論上淪落到第二國際的水準這個事實，是其墮落的最為赤裸的表述。至於其餘所有種種中間性的團體（英國的獨立工黨，西班牙的POUM之類），每隔不久便摘取馬克思和列寧的片言隻字來應付它們的當時需要。他們無法教育工人什麼。

唯有把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套傳統的第四國際的建立者，才是持著嚴肅的態度對待理論。凡夫俗子或會取笑道，繼十月革命勝利後的20年，革命者們又再一次投身到謹小慎微的宣傳準備工作去。在這個問題上，一如對待其他問題一般，大資本家們比起那些自視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更有洞察力。有關於第四國際這個題目，經常見於世界報章上的專欄，決不是出於偶然的。歷史對於革命領導的危急需要，向第四國際承諾了特別迅速的發展速度。第四國際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有機的產物而非歷史大道之外的旁枝這個事實，是第四國際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就的最大保證。

（譯自《托洛茨基全集1936-37年》）

Comment on CPC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Zhang Kai

Economically Rightist Orient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was approved. It states that China will stick to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while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non-public sector, enhancing its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It promotes a basic economic system which allows more private capital into the market to develop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fiscal system. Moreover, the market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oil, natural gas,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 among others. It also opens many sectors such as financial market, education, commercial logistics, and electronic trading for foreign capital. China will lower the investment threshold, step up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and increase opening-up of inland, coastal and border areas. This further prov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capitalist country, but not socialist country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tate-owned property and planned economy.

Politically More Rigid

The Decision repeats the jargons of CPC that people is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 In reality, CPC is authoritative. People do not have the rights of democracy. Grassroots self-governance is not yet well established. Local elections are controlled by bureaucracy (except the case of Wukan Villag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Decision claims to develop local democracy and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As it threatens the interested blocs, it will not be implemented.

The Decision also promises to better supervise administrative law-enforcement activities, regulate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law-enforcement bodies and ensure fair and civilized law enforcement.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yet carried out.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peasants are discriminated and marginalized. Now the Decision changes the dual rural-urban economic structure. It grants peasants' rights to possess, use, benefit from and transfer their contracted land,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use their land ownership as collateral. It promotes the equitable exchang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nd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Moreover, peasant workers in the city can enjoy social benefits same as urban citizens. Actually, it all depends on peasants'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For the past 30 years, CPC authority forced women who violate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have abortion and to pay fines. Up to 2012, 24 provinces have received the fines (in the name of social adoption fees) nearly RMB 20 billion. Under public pressure, CPC will loosen its decades-long one-child population policy, allowing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if one of them is an only child. In addition,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ystem, commonly known as "Laojiao," began in the 1950s. China will abolish the Laojiao system, but introduced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s which started in 2003. This measure still fundamentally violates human rights even though it makes some changes.

The Decision basically reinforces political oppression. One, it will establish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to improve systems and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at means it oppresses people to defend its authoritative regime. Two, the Decision acknowledges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examination system. It controls strictly journalist qualification. An expert remarks that there are 250 thousands of journalists with certificates, but 100 thousands among of which are required to retake an examination of certification. It implies that journalists who have consciences and can truthfully reflect the reality will be expelled. They will lose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Currently CPC strictly controls press freedom. Wu Fei, profess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Zhu Xuedong, the chief-editor of China Newsweek respectively disclose in Weibo that, due to the weakening Marxist perception, 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of CPC decide to re-organize top ten institutes of mass media i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Fudan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Jia Xij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roves that the top ten universities receive the notice, stating that they should learn from "Fudan Model" that the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Mass Media is assign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e *Apple Daily*, dated 19 December). This regulation is not only applied to the press, but also to speech, publication and internet.

Judicial System Does Not Protect Human Rights

The Decision claims to build a fair, efficient and authoritative socialist judicial system and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China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crimes subject to death penalty "step by step". However, it is well known that China authority does not pay respects to human rights. They shoul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the dissents in prisons and human rights lawyers, such as Liu Xiaobo and his wife who are under illegal home detention, and Xu Zhiyong, a famous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has been in detention for seven months and then be sent to People's Procuratorate, out of the 'crime of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turb order at public places'. But according to Xu's defense counsel, Xu urges the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property, as well as fights for the equal rights of education. What the authority does is exactly violating the Decision. Nowadays, the existing law and jury mainly serve the privileged ruling class, the change of juridical system depends on how lawyers and people fight together.

Behind the Beautiful Rhetoric

I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develops so well in China, it undoubtedly leads to serious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Decision claims to establish a fair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improve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and to balanc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But it will be private sector which pays social expenditures. As private sector only aims to extract surplus value so it will not carry out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proposes to set up sustain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social accounts to personal accounts. This basic insurance system needs official financia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has tremendous revenues but it spends more money on keep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defense, than on public health, social welfare and education.

There are official statistics about major expenditures. So people are so angry about government decision of expending money. If the Decision cannot be carried out, people will become more discontented. It will become the source of social unrest. This is exactly what CPC worries. The Decision offers some small favors, but in nature it constricts people's freedom and suppresses people's struggles. This is what the Decision wants to do.

9/12/2013

Why to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Now?

Junx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cides to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ince 1949, China has set up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PS), which i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Why to set up a new security commission now? This means the MPS is no longer capable of deal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Xi Jinping needs a new institute directly under his control in order to reinforce his power.

CPC implements capitalist economy which brings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a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234 times. Officials are corrupted. Social unrest is everywher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ndangers public health. Inflation is serious and living costs increase sharply. People suffer from the difficulties of livelihood, housing, health care,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financial surplus of RMB 16 trillions. It spends RMB 700 billion on keeping social security, meanwhile, the budget for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is merely RMB 50 billion. This arouses people's grievances and resistances, such as bombings. From June to November 2013, there were four cases of bombings by Eastern Turks who fought for independence. They intrigued a bomb near Tiananmen Square befor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started. This shows political uncertainty.

We object terrorist behaviors which endanger innocent people. We should adopt the strategy of mass mobilization to change social injustice.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USSR that during Lenin's ruling perio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ce. There was ethnic harmony.

Now China economy is ranked after the US which makes surrounding countries uncomfortable. Japanese accusation of "China's Threat", particularly refers to the disputes at the South Sea. This needs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to handle th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China concentrates on making friendship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but does not support the working class and working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overthrow their capitalist regimes. If so, they could help China in return. Only the path to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 can help China avoid from isolation.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want to choose this path. Thus, it will be exactly the roots of social instability.

2013-12-6

Hong Kong

- "Consultation" of CY Leung's Political Reform.....Zhong Ming
 Fight for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and Reject False Universal Suffrage.....Zheng Yan
 We Should be Determined! (Reprint).....Leung Kwok Hung
 CY Leung and Chan Mo Po Should be Overthrown (Reprint).....Leung Kwok Hung
 My Egging is Out of My Careful Reflection (Reprint).....Chan Tak Cheng
 It Should Carry Out the Effective Anti-Poverty Tasks in Different Aspects.....Juan Di

China

- Comment on CPC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Zhang Kai
 Why to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Now?.....Junxing
 The Most Serious Disaster of China.....Po Mi
 The Crises of Local Debts of China.....Qing Yan
 Reflections on the Visit to Chen Duxiu's Old House.....Zhao Jing
 To Unknown Friends (Reprint).....Xie Shan
 I am a Tiny Drop of Water (Reprint).....Xie Shan
 Christmas in the Angry Wind (Commentary).....Chan Chung Hai

International

- Haiyan/Yolanda: Inside each new-born violent storm is the DNA of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and
 capitalism.....Alexandre A. Costa
 Three discourses on Political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Farooq Sulehria
 Syria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Gilbert Achcar, Terry Conway
 Recent decision in favour of "vulture funds": A new page in the story of illegal and illegitimate
 debt.....CADTM
 Bankocracy: from the Venetian Republic to Mario Draghi and Goldman
 Sachs.....Eric Toussaint

Profile

- Che Guevara in Search of a New Socialism.....Michael Löwy
 Rosa Luxemburg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Ernest Mandel

Book Review

- How I Write the Book "Xie Shan, The Poet, and His Trotskyist Friends".....Hu Luoqing

Memory

- My Memoirs of Beyond the Great Wall (reprint).....Zhou Luqiang
 Organization of the Trotskyists in Chongqing.....Xiong Andong
 The Couple: Wang Zhenhua and Li Jieshuang.....Xiong Andong

Theory

- Stalinism and Bolshevism.....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Comment on CPC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Zhang Kai
 Why to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Now?.....Junxing

香港 2	梁振英的政改「諮詢」.....	仲明
4	力爭真普選，排拒假普選.....	振言
5	應斷當斷、釜底抽薪！(轉載).....	長毛(梁國雄)
6	倒梁倒波，豈有他哉？(轉載).....	長毛(梁國雄)
8	我掙蛋 因我慎思篤行(轉載).....	陳德章
9	必須多方面落實有效扶貧工作.....	涓滴
中國 10	評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	張開
13	為何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軍行
14	中國最大的劫難.....	破謎
16	中國地方債務危機.....	青岩
19	訪陳獨秀舊居隨感.....	趙京
20	給不相識的朋友們(轉載).....	謝山
21	我是一顆渺小的水滴(轉載).....	謝山
22	怒風下的聖誕(來論).....	陳中禧
國際 23	颱風海燕/約蘭達.....	亞歷山大·A·科斯塔
27	關於中東政治伊斯蘭的三種說法.....	法魯克·蘇勒利亞
36	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敘利亞.....	吉伯特·阿查卡，特理·康威
41	美國對阿根廷的裁決偏袒“禿鷲基金”：違法和非法債務故事的新一頁.....	CADTM
42	銀行暴政：從威尼斯共和國到馬里奧·德拉基和高盛.....	埃里克·杜桑
人物 44	探索新社會主義的切·格瓦拉.....	邁克爾·洛伊
49	羅莎·盧森堡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尼斯特·曼德爾
書評 59	我是怎樣寫〈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的(轉載).....	胡洛卿
歷史回憶		
61	塞外散記——我的三十多年勞改生涯(轉載).....	周履鏘
68	重慶托派組織略記.....	熊安東
76	王振華、黎潔霜夫婦.....	熊安東
理論 81	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關於第四國際的歷史和理論根源.....	托洛茨基
英譯 89	Comment on CPC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Zhang Kai
	Why to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Now?.....	Junxing